香港教育大零落

小思 序

李　葦　梁麗娟
馮偉才　盧浩元
陳志宏　劉思航
張炳良　林本利
戚本盛　潘國森
黎明海　陶　囍
施安娜　張文光
黃英琦　梁德寶
岑判文　史亦書
陳　雲　許寶強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11786911 5

次文化堂

本書作者

小思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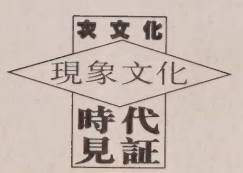
李　葦
梁麗娟
馮偉才
盧浩元
陳志宏
劉思航
張炳良
林本利
戚本盛
潘國森
黎明海
陶　囍
施安娜
張文光
黃英琦
梁德賢
岑判文
史亦書
陳　雲
許寶強

彭志銘 編

次文化堂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堂


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
圖書館系統
11 OCT 2012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次文化現象文化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八十三

香港教育大零落

彭志銘⊙編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㊸

香港教育大零落

編　　者：彭志銘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助理編輯：劉思航
美術編輯：李家欣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2年7月初版
書　　號：SCB569
I S B N：978-962-992-295-5
定　　價：HK$108

©二〇一二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序

「教育的信仰」

小　思

我借用了八十八年前朱自清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只因我們面對的難題、我們需要反省的，都盡在他那文章中了。不過，讀後還是真為今天的香港教育情況慶幸，我們儘管對香港教育諸多不滿，對比起八十多年前的中國，今天已經極大開明和進步了。可是，進步了仍有許多困局有待解決，我們今天需要的，仍然是「教育的信仰」！

讀着1924年以温柔敦厚見稱的朱自清文章，不禁驚訝他筆下對當時的教育官僚、校長竟如此不留情面。從關心學生教育出發，他無法忍受教育行政官僚與校長的權勢勾結，甚至連教師也墮落至不堪的情況——他舉了一些實例，簡直令人吃驚。他對腐敗、劣行的教育界，痛恨極了。歸根究柢，他認為「都因一般教育者將教育看做一種手段，而不看做目的，所以一糟至此！校長教師們既將教育看做權勢和金錢的階梯，學生們自然也將教育看做取得資格的階梯；於是彼此都披了『教育』的皮，在變自己的戲法！戲法變得無論巧妙與笨拙，教育的價值卻已絲毫不存在！教育的價值是在培養健全的人格，這已成了老生常談了。」

面對當時不健康的教育政策缺失，他提出「為學」與「做人」是教育

應當並重的。由於為了滿足功利、要求效率，迷信數字，太重視學業成績，教育者只能用「課功、任法、尚嚴」三道關卡來控制學生，不再在培養健全人格方面下功夫，這便成了「跛的教育」，學生無法成為堂堂正正的人。堂正的人，「是要逐漸培養的，不是可以按鐘點教授的。」而教育者先須有堅貞的教育信仰。

甚麼是教育信仰？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我想這些人應包括了教育官僚、教育決策者、教育理論家、校長、教師，都不能偏於一己之見，不考慮全局而重功利，信任權威法則，如此極易偏枯。朱自清說：「權威是冷的，權威所寓的法則也是冷」，「教育者必須與學生共在一個『情之流』中」。

「教育者須對於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對於他的上帝一樣；教育者須有健全的人格，尤須有深廣的愛。」也許，在許多人心中這真是老生常談，但與空氣、營養一樣，不能因它們老已存在，而不需要再談。

我深信香港教育界仍存在無數不以一己之私，為下一代全身奉獻的工作者，否則也不會寫出這本書來。

2012年7月

附錄

教育的信仰

朱自清

教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一般人所想的。一般人以為教育只是技能的事。有了辦事才能，便可以做校長，有了教授才能，便可以做教師；至其為人到底如何，卻以為無關得失，可以存而不論。在這種情形之下，做校長的至多是辦事嚴明，會計不亂，再請幾位長於講解的教師，便可邀譽一時了。做教師的呢，只要多少有相當的根柢，加以辯論的口才，也便可邀譽一時了。這還是上等教育人才。等而下之，那些蠅營狗苟、諂媚官紳者流，也未嘗不可以做校長！那些憑藉官紳勢力、不學無術的鄙夫，也未嘗不可以做教師！——這班人在五四運動以後，迎受「新潮」，又加添了一副逢迎學生的手段。於是上下其手，倒也可以固位，以達他們「有飯大家吃」的目的！讀者或者覺得我說的太過，其實決不會的；就以文明的浙江而論，內地裏盡多這種情形呢！

至於教育行政人員，那就連技能和才幹都在可有可無之列了。只要有援引的親朋，應酬的工夫，乃至鑽營的伎倆，那就廳長也行，科長也行，科員也行；懂得教育——更不用說有研究了——與否，原是不必論的！至於提倡士氣，以身作則，那更非所論於這班征逐酒食的群公了！他

們只知道趨炎附勢、送舊迎新罷了！如此而言教育，怎樣會有進步？

但教育行政人員多少總是官僚；官僚原是又圓滑又懶惰的東西，我們本不能屬望太奢的。教育的責任，十有八九究竟應該由校長教師們擔負的。但現在的校長教師們究竟怎樣盡他們的責任呢？讓我就浙江說罷，讓我就浙江的內地說罷。

那校長一職，實在是一個缺！得了這個缺時，親戚朋友的致賀、餞行，正和送一個新官上任一般。這是我在杭州常常目睹的。一般人看校長確和教師不同。我有一次偶然做了一個中學的教務主任，家裏人寫信給我說，你升了級了。照這樣算來，校長竟比教員升了兩級了；無怪乎一般校長都將校長當「三等縣知事」做了！無怪校長公司（是杭州某團體的雅號）諸公千方百計的去謀校長做了！這樣的校長，受命之後，先務之急是「串門子」；凡是學校所在地的議員、紳士，在省裏的，必得去登門拜訪一番，以表示他的敬意，然後才敢上任。上任後第一是安插幾個必要的私人和上峰、紳士所薦的人；第二是向甚麼大學裏請一、兩個畢業生，裝裝門面，新新耳目；第三是算帳，看看出入如何——一般的校長特別注意這件事；第四才是例行公事，所謂教育了！這是經始的時候如此，至於平常日子，校長除了「教育」以外，也還有他的重大的事，便是應酬官紳和迎送客人！有一個地方的校長，因該地紳士有甲、乙兩派，互相水火，校長決不能有畸輕畸重之嫌；於是費盡心機，想出一條妙計，每星期請一次客，甲、乙派輪流着。這樣，兩派都不得罪了。這就是他的教育宗旨了！這層

辦妥帖了，校裏的事自然便能為所欲為了！名利雙收，全靠這種應酬的本領呢。但「五四」以後，學生也常會蹈瑕抵隙的和校長搗亂；這也很厲害的！校長卻也有他的妙法，便是籠絡各個首領，優加禮遇，以種種手段誘惑他們，使為己用！也有假手於教師的。各樣情形，不實不盡！總之，教育是到「獸之國」裏去了！

至於教師們盡他們責任的方法，第一是在於植黨。植了黨便可把持、操縱了。這種教師大約總有靠山——地方勢力；憑了靠山，便可援引同類；有了同類，一面便可挾制校長，一面便可招徠學生；而招徠學生，更為他們的切要之圖！他們的手段，說來令人驚歎！在招考的時候，他們便多方請托，多取自己同鄉（同縣），乃至親戚故舊之子弟，俾將來可以調動裕如。至於平日呢，或誘學生以酒食，或誘學生以金錢，或誘學生以分數，尤其是無微不至！我知道有一個學校的教師，他每星期必請學生吃一次，香煙、瓜子而外，還有一桌一元錢的和菜，這種惠而不費的辦法，竟可收着指揮如意的效果呢！可憐一班心胸坦白的青年只因見識短淺，定力缺乏，遂致為人犬馬而不自知，真是悵惋了！金錢誘惑，比較少些，因為究竟太明顯了，不敢明目張膽的做去。有用此法的，也只借借貸為名。分數的誘惑行之最易，因為這是教師們高下隨心的，而且是不必破費一錢的。但太容易了，誘惑的力量反倒少了。——用了這種種手段，教師們植黨的目的完全達到了；他們正如軍閥一般，也可擁「學生軍」以自衛了！於是威嚇校長，排除異己，皆可如意而行；甚至掀起驚人的學潮，給予重

大的犧牲於學校與學生！——而他們仍揚揚無恙。他們的教育的全過程，如是如是！

在這種教育現狀裏，在實施這種教育的學校裏，校長與教師間、教職員與學生間，一般的關係又如何呢？這可以一言蔽之，就是「待遇異等」！有操縱的實力的教師與有教授的實力的教師，校長前程有關欲相倚重，自然特別看待；其餘卻就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了！雖是可有可無，在校長卻也不無有用。別人送十二月薪俸，這類人不妨和他們說明，少送一個月或兩個月；別人照關約所定數目送薪，這類人有時不妨打個扣頭——若反抗時，下學期可以請他走路！這些油，不用說都是校長來揩了；豈不是「有用」麼？至於教師與教師之間，當然也無善狀可言。他們決不讀書，更無研究，課餘之暇，中有嫖嫖、賭賭、吃吃，以遣時日，在內地裏，教師們的嫖賭，是沒有甚麼的，他們更可倡狂無忌了。此外還有討小老婆，也是近來教師們常有的事。再說教師之於學生，往往依年級為寬嚴，視勢力為厚薄。四年級學生，相待最是客氣，三年級就差了，二年級一年級更差了！一班之中，會搗亂的、會說話的，常能得教師的青睞，遇事總讓他三分！這種種情形，我想可以稱為「階級教育」罷！

以上所述的現象，都因一般教育者將教育看做一種手段，而不看做目的，所以一糟至此！校長教師們既將教育看做權勢和金錢的階梯，學生們自然也將教育看做取得資格的階梯；於是彼此都披了「教育」的皮，在變自己的戲法！戲法變得無論巧妙與笨拙，教育的價值卻已絲毫不存在！教育的價值是在培養健全的人格，這已成了老生常談了。但要認真培養起

來，那卻談何容易！第一教育者先須有「培養」的心，坦白的、正直的、溫熱的、忠於後一代的心！有了「培養」的心，才說得到「培養」的方法。像以上所說的校長教師們，他們口頭上雖也有健全的人格，但心裏絕沒有健全的人格的影子！他們所有的，只是政客的縱橫捭闔的心！如何利用別人，如何愚弄別人，是他們根本的態度！他們以教育為手段，同時也以別人為手段。以「人」為手段，實在最可惡！無論當做殺人的長刀，無論當做護身的藤牌，總之只是一件「東西」而已！這樣，根本上取消了別人與自己對等的人格！而自己的人格，因此也受了損傷，看別人是東西，他的人格便已不健全了！再進一步說，他自己的人格也只作為權勢與金錢的手段罷了！所以就「人格」而論，就「健全的人格」而論，利用者與被利用者，結果是兩敗俱傷！康德說得好，人總須彼此以「目的」相待，不可相視作「手段」；他希望將來的社會是一個「目的國」。我想至少學校是「目的國」，才有真教育可言！

不足與言教育的，我們內地裏有些校長與教師，我們真也不能與言，不必與言了。但前文所謂上等教育人才的，又如何呢？我意現在有許多號稱賢明的校長教師，都可列在這一等內。他們心目中的教育，可以三語括之：課功、任法、尚嚴。課功是指注重事功而言。如設備求其完善，學業成績求其優良，畢業生願升學與能升學（能考入大學專門）的，求其多，體育成績於求優良之外，更求其能勝人，都是所謂課功。事功昭著於社會，教育者之責便已盡了。因為要課功，便須講效率，便不得不有種種法則以督促之。法則本身是沒有力量的，於是必假之以權威。權威有鞭策

之功，於是愈用愈愛用，而法則便成了迷信了！在任權信法的環境中，尚嚴是當然的。因為尚嚴，所以要求整齊劃一；無論求學行事，無論大小，差不多都有一個定格，讓學生們鑽了進去。江蘇有一個學校，乃至連學生剪髮的事都加規定，他們只許剪平頂，不許剪他種樣子，以表示樸實的校風。抱以上這三種見解而從事於教育的人，我也遇過幾個。他們有熱心與毅力，的確將教育看做一件正正經經的事去辦，的確將教育看做一種目的。他們的功績，的確也不錯。我們鄰省的教育者，有許多是這種人。但我總覺他們太重功利了，教育被壓在沉重的功利下面，不免有了偏枯的顏色。我總覺得「為學」與「做人」，應當並重，如人的兩足應當一樣長一般。現在一般號稱賢明的教育者，卻因為求功利的緣故，太重視學業這一面了，便忽略了那一面；於是便成了跛的教育了。跛的教育是不能行遠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行遠一樣。功利是好的，但是我們總該還有超乎功利以上的事，這便是要做一個堂堂的人！

學生們入學校，一面固是「求學」，一面也是學做人。一般人似未知此義，他們只曉得學生應該「求學」罷了！這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誤會，而在教育者，尤其如是。一般教育者都承認學生的知識是不完足的，但很少的人知道學生的品格也是不完足的。其實「完人」是沒有的，所謂「不完足」，指學生尚在「塑造期」(Plastic)，無一定品格而言——只是比較的說法。他們說到學生品性不好的時候，總是特別搖頭歎氣，彷彿這是不應有的事，而且是無法想的事。其實這與學業上的低能一樣，正是教育的題中常有的文章；若低能可以設法輔導，這也可以設法輔導的，何用特別搖頭

歎氣呢？要曉得不完足才需來學，若完足了，又何必來受教育呢？學生們既要學做人，你卻單給以知識，變成了「教」而不「育」，這自然覺得偏枯了。為學生個人的與眼前浮面的功利計，這原未嘗不可，但為我們後一代的發榮滋長計，這卻不行了。機械的得着知識，又機械的運用知識的人，人格上沒有深厚的根基，只隨着機會和環境的支使的人，他們的人生的理想是很模糊的，他們的努力是盲目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們只能亂轉一回，不能向前進行；發榮滋長，如何說得到呢？「做人」是要逐漸培養的，不是可以按鐘點教授的。所謂「不言之教」「無聲之誨」，便是說的這種培養的功夫。要從事於此，教育者先須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對於教育，須有堅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的理想，不用說，也應該超乎功利以上。

所謂超乎功利以上，就是說，不但要做一個能幹的、有用的人，並且要做一個正直的、坦白的、敢作敢為的人！——教育者有了這樣的信仰，有了這樣的人格，自然便能夠潛移默化，「如時雨化之」了；這其間也並無奧妙，只在日常言動間注意。但這個注意卻不容易！比辦事嚴明、講解詳晰要難得許多許多，第一先須有溫熱的心，能夠愛人！須能愛具體的這個那個的人，不是說能愛抽象的「人」。能愛學生，才能真的注意學生，才能得學生的信仰；得了學生的信仰，就是為學生所愛。那時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沒有說不通的事；感化於是乎可言。但這樣的愛是須有大力量、大氣度的。正如母親撫育子女一般，無論怎樣瑣屑，都要不辭勞苦的去做，無論怎樣哭鬧，都要能夠原諒，這樣，才有堅韌的愛。教育者

也要能夠如此任勞任怨才行！這時教育者與學生共在一個「情之流」中，自然用不着任法與尚嚴了。法是力量小的人用的，他們不能以全身奉獻於教育，所以不能愛——於是乎只能尋着權威，暫資憑藉。但權威是冷的，權威所寓的法則也是冷的；它們最容易造成虛偽與呆木的人！操行甲等而常行偷竊的學生，是各校常見的。循規蹈矩，而庸碌無用，但能做好好先生的學生，也是各校常見的。這都是任法尚嚴的流弊了。更有一件，權威最易造成或增加誤會，它不但不能使人相親相愛，反將使人相忌相恨！我曾見過江蘇一個校長，他的熱心毅力，我至今仍是佩服。但他任法尚嚴，卻使他的熱心毅力一概都埋沒了！同事們說他太專，學生們說他太嚴，沒有說他好處的！他於是成了一個孤獨的人。後來還起了一次風潮，要驅逐他去職！這就是權威的破壞力！我以為權威絕對用不得，法則若變成自由的契約，依共同的意志而行，那還可存；總之，最要緊的還是人，是人的心！我對於那些號稱賢明的教育者所持的功利見解，不以為不好，而以為不夠，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我的意思，再簡單的說一說：教育者須對於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對於他的上帝一樣；教育者須有健全的人格，尤須有深廣的愛；教育者須能犧牲自己，任勞任怨。

我斥責那班以教育為手段的人！我勸勉那班以教育為功利的人！我願我們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為信仰的人！

（原載於1924年10月16日，《春暉》第34期）

目錄

序——「教育的信仰」（小思）

附錄——教育的信仰（朱自清）

痛心 3

女兒，你還是到外國讀書好了（李華） 5

香港中學教育的課程問題（梁麗娟） 12

副學士——失敗教育政策下的「零餘者」（馮偉才） 19

教育的貧富懸殊（盧浩元） 28

誰的大學？（陳志宏） 38

非名校的悲劇（劉思航） 46

凝思 53

大學之道——反思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張炳良） 55

學生問卷評分　無助教學質素（林本利） 63

培育順民的四種思考（戚本盛） 68

香港「通識」——幾多式？如何適？（潘國森） 86

香港新高中視覺藝術科課程發展及考評的謬誤（黎明海） 98

名校傳說（陶藩） 110

另類洗腦——從通識科的經驗看德育與國民教育（許寶強） 117

疾首 123
我要做好呢份工（□□） 125
不容思考的教育（盧浩元） 132
不可思議的廿一年——遙遙無期的教學專業議會（施安娜） 142
通識教育之真與偽（陳志宏） 155
大學的生招牌與搖錢樹（張文光） 164
跨境學童是教育的未來炸彈（黃英琦） 169
戰叫 177
香港教育大亂局——由教改到新高中（梁德賢） 179
摧傷教育風俗數例（上）：官篇（岑判文） 190
摧傷教育風俗數例（下）：民篇（岑判文） 199
香港教育如何解除教科書的束縛？（黃英琦） 209
教育大零落——看庸官如何治港辦學（史亦書） 218
教育改革詞彙（陳雲） 225
附錄 243
香港特區教育凋零事件簿 245

香港教育大零落

痛心

女兒，你還是到外國讀書好了

李葦（退役教育工作者，現半職家長）

我的女兒在 2009 年出世，今年（2012）兩歲半，是一頭夏天的牛。做爸爸媽媽的，只希望小牛女可以過一個無憂無慮的愉快童年。但眼前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這只是天真的一廂情願，皆因擺在小朋友面前的，將是一場又一場永無休止的戰鬥。

戰鬥的序幕，由女兒要上學開始。本來還有一場「前哨戰」，叫做「學前班」，即是在入讀幼稚園前讓年滿兩歲的小朋友參加的幼兒課程，一些學前班是全日制，小朋友可在學校用午膳和午睡，其實是變相托兒。有些家長為了讓子女及早裝備自己，以便「贏在起跑線上」，在小朋友滿一歲便開始物色優質學前班，讓他們早一點上課。我認為假如父母都要上班，讓子女上學前班至少可以「一舉兩得」，但我只是「小半職」，可以大部份時間照顧女兒，也覺得女兒沒有必要太早跟其他小朋友賽跑，所以沒有給她上學前班，反而盡量從日常生活中讓她學習：一起看兒童圖書教她認顏色圖形；帶她到超級市場買菜，讓她接觸各類水果和蔬菜；帶她外出搭車，讓她學會常見的交通工具等等，讓她享受在家中「寓娛樂於學習」的樂趣。

當然，避得一時，避不了一世，快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為女

兒慶祝了兩歲生日後，我就開始投入「備戰階段」——上網搜集幼稚園資料。香港所有幼稚園都是私立的，並沒有派位，即是說若要入讀心儀的學校，必須經過面試。大家要知道，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與女兒同年出世的本港兒童就有八萬二千多名，雖然當中有近三萬名兒童父母是「雙非人」（父親和母親均不是本港居民），但仍有過半數會在香港成長，兩年多後參與這場爭奪幼稚園學位的戰役，焉能不嚴陣以待？為怕女兒「冇書讀」，我一口氣幫她報了五間幼稚園（不算多，有家長報了十多間！），三間在住所附近，兩間則是座落在九龍區、較有名氣的幼稚園，但求至少有一間願意取錄小女。

2011年10月中開始，連串新生面試正式展開，每次都要幫女兒「執好個look」，準時到場，心情緊張得就像自己見工一樣，因為至少同時有幾百個家長帶同小朋友來「應戰」，表面友善微笑，但隱約能嗅到點點火藥味，劍拔弩張。最難忘的一次，是我們早上帶女兒到何文田區一間逾百年歷史、有中小學做後盾的「一條龍」幼稚園面試，只是一個上午，極目所見已有超過五百名小朋友等候「比試」，校方要按面試時間闢出不同「等候區」，熱鬧有如趁墟。這間幼稚園共有兩天面試日，網上傳聞共有六千名小朋友報名，看來一點不假！

正在為女兒四出奔走之時，心裏總會湧起這個疑問：既然中四至中六至今已可獲得政府資助，為何政府始終不肯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

究竟香港政府為學前教育做過甚麼呢？在政府網頁上輸入「學前教育」，我們只會看到一些極為「行貨」的資訊，例如教育制度概述（人盡皆知）、全港幼稚園選校指南及「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之類，至於實際針對學前教育的政策？除了學券資助外，近乎零。多年以來，不少幼稚園校長、老師及教育團體均敦促財政儲備實力雄厚的政府盡快全面資助幼稚園，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

從家長角度看，全面資助幼稚園實在是德政一樁，因為這能大大減輕我們的子女教育支出負擔。現時所有幼稚園都是私人開辦，每月學費動輒幾千元，還未計其他校服費及書簿雜費等等，莫說是正在申領綜援的家長，即使月入數萬以上、表面富饒的中產家庭也感到吃力。別說其他先進國家，就算跟我們只有一海之隔的澳門，幾年前已開始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為適齡澳門居民提供全面教育資助，即三年幼稚園、六年小學、三年初中及三年高中。同樣是「特別行政區」，相比之下，究竟哪個政府更珍視基礎教育、更愛惜我們未來社會的棟樑呢？

十五年免費教育不但能為家長「慳荷包」，對整體基礎教育的質素

也有一定提升作用。全面資助幼兒教育意味着教師薪酬獲得政府支援，就可與小學和中學老師一樣，必須透過薪級表適當調整薪酬，並非像現時教育局只是隨便「建議」一個只有「幼兒中心主管」及「幼兒工作員」兩個類別、簡陋得可以的薪酬指標。如此一來，幼稚園老師有了薪級表保障得到應有尊重，得以提升工作士氣，就能更專注於教學及積極進修，獲益的始終是學生。

幼稚園業界及教師團體多年來一直爭取落實這個「十五年的夢」，師生與家長一起大規模遊行 2011 年也試過兩次，然而我們政府始終採「拖」字訣，不肯表態何時執行。等到 2011 年下旬，教育局長孫明揚明確表示只要能解決幼稚園租金資助，以及收生機制等技術問題，全面免費教育就可隨時上馬。當然，秉承政府一貫態度，究竟何時正式推行呢？又是一個猜不透的謎。

乍聽以為有起色，其實又在耍官腔，叫大家一場歡喜一場空。並不是所有幼稚園都如此幸運，有教會或慈善團體作後盾，可以在租金較相宜的場地辦學，原來全港約七百多間非牟利幼稚園中，仍有約百多間學校的租金支出佔其總開支兩成以上，即使接受學券資助，大部份都用來交租，填滿大業主的荷包去了。當本港通脹持續上升時，租金自然跟

着水漲船高，難以預測，做準確評估只會益發困難。由於沒有設定時間表，政府到時又可以「未做好資助評估」之類藉口，繼續拖拖拖，十五年免費教育又淪為空口白話。在可見的將來，政府將持續把學前教育這枚「人球」拋給幼稚園，最終要「接波」的，正是我們這班重視子女教育、願意傾囊付出的家長。這個坐擁數以千億港元計儲備的富裕政府，對資助基礎教育竟如此小器，還可以寄望它會為我們和下一代付出更多嗎？

也許其他家長會覺得，政府至少願意推出學券，也算是顧及家長需要吧？但不說不知，這個經過政府修訂、隔靴搔癢的學券制度，無論對家長抑或幼稚園本身，都只是弊大於利。

「學券」這套概念不是甚麼新發明，早在 1955 年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提倡，將自由市場運作模式帶入教育，政府向所有家中有適齡入學子女的家長發出學券，其金額相當於政府向個別發出學費津貼的金額，可在任何達到政府設定最低要求的公立或私立學校使用。有了學券支持，家長可自由為子女選擇心儀的學校。此舉原意在於鼓勵學校之間互相競爭，提高教育質素。

在香港，學券制是在幼稚園教育推行。從 2007 年開始，政府向每位適齡入讀本港非牟利幼稚園的學童，每年發放一定數額學券資助，直

至完成三年幼稚園課程為止。只要取錄學童的幼稚園接受學券，家長就只需支付小部份學費，甚至可以全免。

本來學券制對我們家長而言，應該是喜訊，但可惜經由政府推出的學券制，卻變相縮窄了家長的選擇範圍。根據當局規定，合資格接受學券資助的幼稚園既要是非牟利性質，而且提供的都必須是本地化課程，那些標榜提供國際化課程的幼稚園，就給學券制拒諸門外。換言之，家長要享受學券，就只能選擇提供本地化課程幼稚園；為子女選讀國際幼稚園，每月就要負擔數以千元計的昂貴學費。父母致力為子女揀選好學校無可厚非，惟學券制的出現，其實並沒有提高我們選擇較優質幼稚園的機會。

至於各幼稚園對於政府推行學券制，也是諷多於譽，皆因學界面對經營成本不斷上漲，卻受到學券制的規限，不能調整學費，以致五年來持續有幼稚園「跳船」，拒絕再玩。2011 年底，又有幾間港島區及九龍塘區名牌幼稚園宣告退出學券制，部份更隨即宣佈加學費，家長負擔更形沉重。有「跳船」幼稚園解釋，原來政府推出學券計劃時，不設支援或發還校舍租金機制，多年來一直由幼稚園補貼大量開支，為免難以平衡成本，逼不得已退出計劃。

參與學券制的幼稚園，由當初滿懷希望到如今意興闌珊，源於政府始終對學券制限制多多，加上政策檢討速度緩慢，根本跟不上社會步伐，尤其是通脹，不論對幼稚園抑或家長都不是雙贏。站在家長角度看，學券制只要繼續因循下去，對幼稚園業界的吸引力愈來愈小，只會有更多幼稚園退出，屆時繼續「貧富懸殊」——富裕的家長當然擁有較多優質選擇，但「東不成西不就」的中產以至草根父母只能找尋「木門對木門」。

大家可當以上言論是對香港學前教育政策的批評，但更多的是身為家長的怨懟和無奈。看着面前蹦蹦跳的女兒，暗自下了決定：小牛女，無論爸爸媽媽怎樣節衣縮食，也要把你帶到外國讀書，不要留在比火星還要危險的香港了。

香港中學教育的課程問題

梁麗娟（大學講師）

我一直支持香港的教育制度，畢竟這個世界沒有一種制度是完美的，每一種都有它的好處及壞處，我讓三個孩子在本地學校唸書，是希望他們學好中文，而本地學校亦令他們對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多一份歸屬感，他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或對香港引以為傲，教育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我這份對本地教育的支持到孩子升讀中學便面對嚴峻考驗。

我的女兒就讀一間中文小學，她成績一般，我們的信念是自由主義，讀書是小朋友的責任，況且在終身學習的年代，犯不着自小學就要催谷她。她小六時屬於第二組別學生，我們也覺得沒有問題，後來她進入了一間以收第一組別為主的直資英中唸中一，這間新校亦略有名氣，很重視學生的品格，我女兒在這裏唸了兩年，她後來表示，自己最好的同學都來自這間學校，反而不是唸了六年的小學。

她雖然很喜歡這間學校，但最後仍是轉了校，主要原因是課程的問題。這間學校的課程十分全面，中一的時候，她要唸的科目有：中、英、數、中史、西史、英國文學、地理、綜合科學、視覺藝術、法文、資訊科技、體育、聖經和音樂，還必須要學一種弦樂，女兒選擇了中提琴。

十四種科目中除了體育以外，十三科要考試，而且大部份是筆試，音樂則要練琴，資訊科技除了筆試還有操作試，視覺藝術要考美術發展史，要一個來自中文小學剛畢業的學生背一大堆印象主義、現實主義、抽象主義等等的英文，還有不同時期的畫家名稱及作品，如米高安哲羅、凡高、米勒、畢加索等等。我不是說這些知識沒有用，讓小孩有藝術修養是好，但用不着很認真的考試吧！學校真想打造十項全能的天才？結果要照顧這十三學科或術科都佔據了她所有時間，她平時早上七時出門上學，下午四時半放學，回到家都已經五時多，有活動的話要到六時半以後才回來，返學每天差不多要十二小時，比成人返工時間還要長，回家以後就是做功課或補習，很晚才能上牀睡覺。還有學琴、游泳班及周末的童軍等，基本上已沒有甚麼空餘時間，她每天起牀都喊

累，幸而她還喜歡返學，極少借故缺席。

其實十二科是否太多，問題是如何教，教得有幾深入。我記得當年中一的地理是教自然環境為主、認識雲，或者是石頭的分類等，但今時今日中一的地理已經牽涉到城市規劃，有土地用途、環境污染等課題，可以看到社會環境的轉變，但對一個六年小學都是用中文學習的女孩來說，一下子全都是 industrialization、land zoning、conglomerates、pollution 等等一大堆的生詞確實令她十分頭痛，最要命的不單是量多、內容較複雜，而且考試更要求分析能力，即是對概念的掌握要很清晰。地理考試有選擇題，但那些選擇不單是 A、B、C、D，而是 A 是 1 + 2 + 3、B 是以上各項、C 是只有 1 及 3、而 D 是全都沒有。我印象中這類型的考核方式是中五會考時才有，為何當時中一已出現？這種考試方式要求學生不但有記憶力、還要有很強的分析能力，可惜我的女兒仍在背誦一大堆生字中掙扎，要她勉強合格已不容易，能夠分析概念更是不可能。難怪成績好的同學很早已經溫習，女兒告訴我其中一個同學早上四時起牀溫習，又有同學暑期已經開始讀下一年的課程，才能保持好成績，這真是要了孩子的命，才剛升上中一，不用如此誇張吧？那學習還有甚麼樂趣呢！

除了學科以外，語文科亦有很大的適應問題。現時教育局准許各校因應學生的程度發展自己的語文教材，女兒的中文科教材全是學校老師編寫的，由於很多學校都棄用教科書，學校挑選的文章都是以做功課的方式學習，其中一年級上學期已經有幾課《論語》的選輯，大概是「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思而不學」吧！女兒不懂解釋，結果又是阿媽幫她做功課。我不敢說不應選《論語》，但是否應該在一年級上學期學？《論語》是高度濃縮的文言文，是否應該中一開始讀呢？中文科學習的另一個問題，是有太多的目標要課文配合，例如學抒情文、描寫文、議論文，便要為了這些主題分別節錄幾篇相關的文章，作為示範，但是節錄的文章像拼貼一樣，怎能留下印象呢？結果讀完一年，也沒有幾篇文章認真讀過，更遑論留下印象了。我記得中一時背過不少有意思的古文：如《木蘭辭》、《燕詩》、《岳飛》、《為學與做人》等，到如今仍然可以琅琅上口，但女兒讀了兩年中文，都沒有背過幾篇像樣的文章，那學完中文又得到甚麼呢？

最諷刺的，是讀了六年中文小學的女兒，升上中學以後中文極少合格，因為考試只考閱讀理解，而閱讀理解所選的文章是要他們根據課程要求的特色去理解文章，例如抒情文有甚麼特色，考試便要應用相關的

特色分析去評價考核的文章。可見中文的考試亦要懂得應用及分析，而這方面根本是無從準備的，因為不知老師出哪一篇文章，語文學習已經完全脫離語文欣賞及對閱讀文章培養的感應能力，更與語文使用無關，變成抽象的結構分析。每次考試她考三篇閱讀理解，我在圖書館借了不少中學教科書的文章讓她預先溫習，但都是徒勞無功，文言文她沒法解得明白，白話文太長，她又不懂得用教過的概念分析，因此難得合格。

我記得女兒讀中二時教議論文，其中有教文章內的論點、論據及論證，而後二者又分為不同的類別，例如歷史論據、科學論據等等洋洋十多項，考試就是要懂得指出文章用甚麼類型的論據及論證，而其中一份功課是找一篇社論來分析作者使用甚麼論據及論證。平時較少接觸公共事務的她連社評也看不明白，試問又如何了解中間使用的論點論據？我不明白學議論文何需學得這麼邏輯性，我記得漢語邏輯學是大學的課程，但我女兒中二已經要接觸了，但這樣教不表示他們懂得寫出色的議論文。我明白老師們的苦心，希望語文變得實用，又與生活多些聯繫，但這些綜合及分析能力是建立在多方面的基礎上的，不能單靠孩子們自己摸索，可以學習得到。

在她學習過程中，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老師們要求學生達到某一標

準，而所定的標準又很高，但學校的教授沒法裝備他們到達那兒，結果是靠父母操刀或找補習老師，很勉強都未能抬他們到一個較高的水平。我不諱言有些能力較高，或者平時訓練有素的學生可以做得很好，但這絕對是操出來而不是由學生在同樣的歲數可以自然發展出來的。

結果女兒讀了兩年，儘管她如何努力，用盡所有時間在學習上，兩年都是試升。她的成績在班內是中等，可見半班以上都達不到升班的要求，不知是學校要求太高抑或是學生水平真的不濟。後來她轉了到英式國際學校，課程要求便合理得多，至少家長不用再落場作教練，除了英文要追之外，她的功課基本自己有能力完成，過去她的數學經常不合格，但在英式制度下中三程度的數學她竟然拿到一個 A。而她對自己的要求因此也提高了很多，過去她不是不希望自己做好，只是目標太高她自覺力有不逮，但當她做到時，自然有更強的動機希望自己進步。一年之後，她在新學校看到自己的學習逐漸進步，但她一個仍留在舊校與她成績差不多的好同學，卻因為成績跟不上而要留班。若女兒繼續留在該校，很可能會有同一命運。

問題是留班並不能解決學習的問題，學生不是未盡力，有時是要求太高，留班不等於他們會突然做得更好。例如他們中二的 ict 是學用

flash 做動畫，對部份電腦應用能力較差的學生，這絕對是費時失事、吃力不討好的，喜歡玩電腦的學生，也許不須教亦會用，但對一些電腦白癡如我的女兒，就只有不停打擊她的自信，覺得自己樣樣都不如人，每項功課也要找人幫忙。這就是香港中學學制殘忍之處，犧牲了很多慢熱的學生，亦沒有時間讓他們循序漸進掌握學習的技巧，正如沒有受過幾堂足球訓練就要他們打學校代表隊，似乎學校將訓練的責任都放在家長身上。我們一家有學術背景，加上在中學教英文的退休姑媽幫忙，仍不得要領，若沒有甚麼資源的學生，不知怎麼辦？學術上，有些人是 late bloomers，即是較遲才開竅的人，目前的課程要求，便會很早淘汰這一班人。

如果我的女兒有能力，我當然希望她在香港的本地中學完成課程，但似乎香港的中學，變得只有強者才能生存，結果我們將升中的老二亦轉到國際學校，只有幼子留在傳統教育制度，而他好像適應得不錯。三個子女只有一個讀到，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

副學士——失敗教育政策下的「零餘者」

馮偉才（嶺南大學社區學院講師）

打開香港教育局的網頁，在政策大綱一欄有「專上教育政策綱領」一項，裏面這樣形容副學士學位課程：

「（課程宗旨）概括而言，副學士學位課程應提供內容更深更廣的專上程度教育，為學生日後工作、進修、善用餘暇、行使公民權利及履行公民責任做好準備。課程亦應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精神及幫助學生學會學習。

「具體來說，學生修畢副學士學位課程後，除應能掌握一般技能外，亦應具備擔任輔助專業工作、升讀大學或專業進修所需的專門知識／技巧。

「（學習成果）修畢副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應——

「具備穩健的一般技能基礎，這些技能包括語言、資訊科技、人際關係、溝通、定量和分析技巧，以及自學能力。

「對所選修學科的理論及其應用有廣泛認識。

「有良好的理論基礎，可繼續進修所選學科的學位或專業課程。

「對其他學科／學習領域有基本認識和理解，這些學科包括博雅／

通識教育及科學。

「更加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及取向。

「對本地、國內、區內及國際層面的主要社會政治、文化及經濟事務有基本的認識和理解。

「富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充滿創意，敢於創新；並有終身學習精神。（如修讀職業主導的課程）

「學生應掌握所修學科的專門知識，及具備重其輔助專業程度的實用技能。

「（質素保證）具備自行評審資格的大學開辦副學士學位課程，須如正規學位課程一樣，通過校內質素保證機制的評審。

「至於未具備自行評審資格的院校，則須由認可質素保證機構（例如香港學術評審局）評審擬開辦的副學士學位課程。

「（結業資格）副學士學位是一個獨立而有價值的結業資格，具備這個資格的人士可投身基層管理及有關專業的助理崗位。」

這是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教育改革目標內，對新設副學士學位課程的願景。董建華說，為了急起直追發達國家和亞洲的一些大城市及「配合知識型經濟」，十年內把香港高等教育的

普及率推升到 60%，專上教育學額將年增二萬八千個——以專業文憑（diploma / high diploma）及副學士學位為主，並預期香港將年產五萬五千個大專生。

十年過去了，社會和大學自身都沒有接受政府的願景，而政府對副學位課程投放的資源則是日益減少。隨着董建華下台，副學士學位課程不但成了曾蔭權政府的燙手山芋，也成了香港政府一個尾大不掉的孤兒——政府的態度是等同讓它自生自滅。根據香港集思會 2011 年 4 月發表的報告，十年來，修讀副學士畢業的人數已接近六萬人，同期就讀人數大約二萬九千人，每年仍以一萬五千收生人數上升。可是，副學士畢業生在升學和就業方面，卻看不到教育局所描繪的美麗圖景。那幅美麗的圖畫，是董建華就任特首之後向升不上大學的高級程度會考畢業生開出的期票。然而，這張期票不但隨着董建華下台而沒有兑現，即使他在位期間，也成了盤繞在莘莘學子頭上，被稱為「教育八萬五」的夢魘。

這群被政府稱為「配合知識型經濟」而造就的副學士畢業生，到了今天，竟被政府棄如敝屣，變成自生自滅，背負沉重學費借貸的「零餘者」。而曾蔭權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也沒有從教育政策中幫助副學士畢業生面對目前的困境，例如社會認受性和學位不足等問題。

教協屬下「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在 2008 年就「第二階段專上教育界別檢討報告」提交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副學位政策是主權移交十年以來最失敗的教育政策之一，無論是學生、教職員、議會，甚至是整個社會無不對副學位政策作出尖銳批評」。他們要求政府「提供直接按額資助，全面提升課程質素」。例如教育局應加強對課程質素的規管，進一步鞏固副學位課程的質素保證及資歷認可，教育局應向大專院校提供不少於二萬元的按額直接資助，並建議政府應開放更多職系予副學位畢業生，和帶頭聘用更多副學位畢業生。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還建議應該豁免院校的建校貸款，以減輕院校財務負擔。因為目前一些開辦副學位課程的院校，是以貸款方式興建校舍的，而豁免大專院校的建校貸款，讓大專院校可以停止償還建校貸款，減輕負擔，並將全數學費直接用在學生和教學上，提升課程質素。（目前有些院校已申請有條件延遲還款，但沒有獲得豁免。）

另外，解決副學士升學瓶頸問題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開放更多副學士升大學學位，是解決目前副學士畢業生苦無出路的重要一環。以政府目前的儲備和資源，每年多撥十億元，就有多五千個副學士畢業生獲

得升上大學的機會，讓他們真正地過大學生生活。

香港政府對副學士學位課程的取態，最為人詬病的，是帶頭歧視副學士。雖然教育局把副學士放進認可資歷架構中，但無寧說副學士的資歷其實和中六或中七畢業生差不多，多讀兩年的副學士畢業生，並沒有被政府和社會視作大專生，但他們畢業出來後，就得上十多萬的學費債。聽信政府美麗神話的副學士畢業生，到頭來一方面因學位不足而升不上大學，另一方面只被社會視為中學畢業生，這樣，一部份辛辛苦苦交足學費讀完副學士課程的年輕人，既升不上大學，也找不到滿意的工作，成為社會的另類邊緣人。

特區政府的理財哲學是「自負盈虧」，即使辦教育，也是斤斤計較地緊抓着大學學位的命脈。2010 年符合升讀大學資格的有一萬四千五百人，2011 年更有接近一萬九千人，但政府資助學額只有六成，其餘四成高考生要升學，如果不能到外國留學，便只有求助於副學位課程。本來最佳的解決辦法，就是政府增加學位，讓其餘的四成符合資格的高考生都能升讀大學，但我們這個守財奴政府卻沒有這麼做。

歸根究柢，香港副學位課程教育失敗，皆因特區政府短視而功利，並且對一手造成的副學士問題不聞不問，即使庫房儲備年年大增，政府

只是想到用派錢來收買民心，卻從沒有為這群升不上大學的莘莘學子着想。2010 年，政府《施政報告》提出，將副學士升大學銜接學額由二千個加至四千個，但是對每年三萬個副學士畢業生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

副學士在社會上一向被標籤為董建華的教育八萬五，前嶺大校長就曾經指出過，這是教育「大躍進」。當年董建華政府為減輕社會上的失業數字，用副學士作為誘餌，把剛出校門又升不到大學的一群高考生拉回學校，以減少雙失青年的數字。本來政府初期撥出資源，資助城大、理大和職訓局開辦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的，但幾年後就收起了資助，讓他們自負盈虧，可見政府如何看待副學士學位課程。

造成副學士同學對自我身份的貶抑，除了跟上述社會和大學的歧視有莫大關係外，香港政府的副學士教育政策也使他們成為無能政府下的犧牲者。政府讓副學位課程畢業生自生自滅，他們在社會上的認受性越來越低，甚至連大學本身也歧視副學士。我曾經參加過一次副學士素質監控的視察答問會，一群大學教授搖頭擺腦地質詢着副學士的質素，其中來自某著名大學的教授竟然說出，他們學校不會收副學士畢業生！對於這種歧視眼光，我是十分不恥的。在會上我用了幾分鐘的時間向這名

教授解釋，一些副學士升上大學之後，平均成績不會比一般大學生差。個別副學士畢業生水準較差，從比例上看，跟大學生沒有多大分別，都是有小部份表現出色，大部份表現中庸，另有小部份表現差勁。

這種歧視眼光在大學出現，固然窒礙了副學士升上心儀大學的機會，同時也可反映出社會人士如何用一種另類的眼光看待副學士。

目前社會上當然有一些不重視教學質量的學店，也有讀不成書的副學士畢業生，但在我的經驗中，副學士的資質起碼超過七成是不錯的，他們之不能升上大學，我想是運氣和個人不是考試材料有關，而絕不是因為他們低人一等，或者資質比同齡人較差。

我在 2008 年進了嶺南大學社區學院當講師，在我的「中文傳媒寫作科」的班上，每年都有三、四十人畢業。每到畢業關頭，同學們大都十分緊張，分數高的雖然滿有信心升上大學，但也是戰戰兢兢地過暑假；成績在邊沿的，則是徬徨和焦慮；而那些知道自己可能升學無望的，也在盡最後的努力，想找一處能夠收留他們繼續讀書的地方。

在這幾年的教學生涯中，我眼中的副學士學生和大多數讀大學的年輕人沒有兩樣——害怕讀書、尋找考試答問題捷徑、做每樣事都以分數為衡量標準……。由中學上來的這一群年輕人，習慣了填鴨式的教育，

缺乏批判思考的訓練，來到副學士的大專課程，仍然像在中學似的，只求老師給他們一個標準答案，以應付考試。

我前面說「副學士學生和大多數讀大學的年輕人沒有兩樣」，是因為在進嶺大社區學院之前，我也教過嶺大中文系的課，除了少數天資聰穎和早在中學養成閱讀習慣的同學，大部份都和我在社區學院面對的學生差不多。因此，在我眼中，大部份副學士同學的資質都不一定比大學同學差，而兩者都要重新教導他們思考方法和讀書方法——教他們從批判思考的角度去理解社會、人生，甚至他們拿在手上的教科書。

在我眼中，副學士畢業生的程度應該和大學一年級是一致的——從填鴨式的中小學上來，會考和高級程度會考兩個難關把他們折磨得失去了讀書的樂趣。我們這些教育工作者，本應該本着有教無類的精神，一視同仁地看待副學士畢業生，可是，現實社會卻不是這樣。

近年來，不少學者和調查研究機構在總結香港副學士教育制度時，都指出其中主要的弊端：副學士課程以低成本及具收生保證的學科為主，畢業生在就業市場認受性不足，甚至被僱主形容為「A 貨學士」；副學士課程的開辦條件不統一，收生制度亦欠清晰，院校資源不足，教學質素缺乏保證。

上述情況也許符合事實，可是，我所在的嶺南社區學院在資源和師資方面，都不會比大學差（雖然大部份老師都沒有博士學位，但他們的教學熱情和學問素養，我不覺得比一些大學教授差）。撇開那些無興趣讀書、無意上大學的一群副學士學生，大部份副學士的平均水平還是符合一個初級大學生的情況。副學士畢業生良莠不齊，正如大學畢業生的分佈比例一樣，大概是2、5、3之間——20%優良，50%中庸，30%差劣，沒有理由要把副學士看成低人一等。

造成社會和大學對副學士歧視的原因，固然是跟副學士畢業生沒有社會的認受性有關。然而，正是因為沒有社會認受性，一些由副學士升讀大學之後學有所成的，也會隱瞞自己曾經有過的副學士身份。社會上對副學士畢業生往往帶着歧視的眼光，連帶影響到副學士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的這個身份，有些升上了大學的副學士畢業生，也不希望大學同學知道他們那段副學士的經歷。

他們的這種心理我是理解的，但我並不贊成。在我五年的副學士教學生涯中，我為自己班上的同學總共排演了五個畢業短劇，都是以副學士身份認同為主題，目的就是要他們先肯定自己——只有抬起頭來做人，才會看到前路。

教育的貧富懸殊

盧浩元（社區工作者）

坊間常有幾句話：「知識改變命運」、「教育能脫貧」、「窮甚麼也不能窮教育」、「不讀好書就沒有好將來」……似乎「讀好書有出頭天」真的是很多人的希望。但希望終歸是希望，現實中又能否做到？機會又是否真的公平地分配給莘莘學子？教育的起跑線、當中的跑道和跑鞋又是否公平？又有一個顛覆性的問題，教育是否需要有助人脫貧的功能？脫貧又是否只能靠教育？

從一開始便不公平的起跑線

以下數個小故事，主角都是筆者真實遇過的人，每次想起他們的生命故事都總會感到傷感和憤慨，憤慨在社會這般的不公平。

一位小朋友告訴我，她在上格牀做功課，書桌是衣櫃頂，我問她會否很辛苦，她說不會，而且因為可以從上格牀偷看電視而感到很愉快。

一位小朋友曾告訴我，他不能留在家中溫習和做功課，因為家住在板間房，實在熱得不能專心。

一位小朋友曾告訴我他要收集柴枝，目的是儲起作寒冬保暖之用，原來他是住在一間木屋中。

一位小朋友告訴我，他的夢想是和父母一家人可以愉快生活，只要能愉快，金錢不是重要的問題。

這些小故事，讓人感動也讓人憤慨。感動在於他們處身極困難的環境下仍然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堅持；憤慨在於社會的極端不公平，我真不敢相信，「柴枝的故事」仍然真實存在於今天的香港社會。

貧窮學生所面對的處境和每天面對的生活就是如此，是艱苦的，也是社會不應容忍的狀況。還幸的是，近年社會對這些孩子的處境認知的確多了不少，社福機構資訊、傳媒報道等均令大眾多了一份認知。可是，認知卻不等於了解，悲天憫人一番後，普遍香港人仍是很快便回到日常的生活，那些貧窮人的生命故事彷彿就是看不見和不存在，更遑論有人會採取任何行動去關心或是尋求改變。

當貧窮兒童的處境是如此困難時，如何談得上能夠有適切的環境學習？別說課外活動、補習班、遊學團，他們就連最基本的每天生活和學習也面對着很大的挑戰。那些口號式的「知識改變命運」對這種社會狀況，簡直是最諷刺的說話。當生長於富有或中產家庭的孩子享有各種各樣的資源和特權、參與各種各樣的活動、入讀「富貴」的直資學校或私立學校、有各種各樣的營養食品，「讓他們腦部良好發展」的同時，原

來在另一邊廂貧窮孩子面對的是每天生活和生存的問題，連溫暖和溫飽也成問題，這個教育競賽公平嗎？這條起跑線，是否太殘忍了？沒錯，在逆境中仍然努力堅持的貧窮孩子大有人在，到底我們該繼續去歌頌努力奮鬥的故事，還是應當對他們的處境提出控訴？

在 2006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中，共有約二十五萬兒童，生長於低收入家庭，約佔總兒童人口超過四分一，相信此數字於幾年間有增無減。不論是數字或故事，貧窮兒童的處境都是不能容忍的，他們脫離貧窮處境的希望大多寄托在教育之上，可是種種障礙卻令他們的希望幻滅。

市場化的教育？

近年來，教育界和不少應當是公營、公共的事務，逐漸被私有化、市場化和商品化。當我們集中討論教育時，最主要的是見到越來越多「直資學校」和「補習社」等以金錢換取的教育，但筆者相信教育不能夠是商品，而應當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每個人可以獲取的機會和資源也應大致平等，不能有極大的差別。

直資學校所象徵的，是香港特色的中產信念，此信念是講求精英教育，除了培訓「精英」，更遠離了原本教育應有的價值。當政府開支不

斷緊縮，公營學校面對資源不足下，就只有向轉營為直資入手，將良好的教育化為商品，在自由市場中讓有能者購買。近年不少傳統名校紛紛轉為直資，原因正是為此，後果除表面上的基層及貧窮學生將更難入讀好學校外，更是教育本質被扭曲。帶出的問題是政府沒有承擔，投放資源不足。學校出售教育理念，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有關。

好學校不是完全沒有的，鮮魚行學校可算是其中一間有心辦學的學校。鮮魚行沒有提供高大空的東西，而是給予貧窮孩子每天所需要的學習要素，如每天的營養需要、電腦、上網支援、朋輩補習支援等。當然不是說這些補足能完全彌補制度不公平，但至少能夠拉近少許差距。然而，當重新分析整個系統，會發現對貧窮學生的支援是十分不足的，當僅存的基層學校沒有方法及本錢爭取更多學生及資源，好學校只會越來越少，造成惡性循環。

大專教育也越趨商品化和貧富懸殊，專業學系、商業等，均是「富貴」的學院，而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理科及工科等則變成「無權勢」的學院。這個變成價值單一化的社會，在金錢掛帥的前提下，使得教育變成了工具和商品，學生和資源也只會流向值錢的商品，令教育在不同層面上也變質，而所謂教育可以脫貧，也變成沒有深層意義的「脫貧工

具」。真正的教育理應去除商品化，而若用以脱離貧窮，亦不應讓某些學科佔盡優勢，應是各種各樣的學科和學習也能達至此脱貧目標。

星巴克和教育價值

筆者在中文大學畢業，坊間不少想法，覺得中大是較「基層」的大學，港大則是較「高級」、「專業」的大學。筆者對此沒有特別意見，反而中大有一點令筆者引以自豪，就是多年來一直沒有引入如「星巴克」類的咖啡店及連鎖店。雖然這看似與教育和貧富懸殊無關，但容我以少許篇幅拆解。

星巴克所造成的社會壟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不公平貿易等，盡顯其缺陷。假若星巴克坐落大學校園，更會使大學失卻多元性，與外界社會不同的多元性。當香港每個大型商場也有如星巴克等的咖啡店、一式一樣的連鎖店鋪，而大學能與此保持距離，同時抗拒壟斷、剝削，這便是很重要的多元性，提供與自由市場不同的另類選擇。而且當中大校園內還有女工合作社的社區經濟和基層民主實踐，實在應該支持基層婦女而不是星巴克大集團，中大的人文精神也因此而來。教育的實踐也在這裏一步步抗衡資本主義。

我很失望的是最近聽說某「專業」學系的教授投訴中大一直沒有星巴克和享受咖啡的地方，此教授認為飲着咖啡欣賞美景才是值得享受的大學價值。筆者對此完全不敢苟同。這是一種怎樣的價值？正如上述所論，飲咖啡、享受生活、中環價值、中產價值等，實不應是堂堂學者放在首位關注的事情。這位教授所持的觀點，正正強化着教育和貧富懸殊的問題。當既得利益者繼續獲取資源而享受生活，沒有去處理社會問題；當大學教授仍盲目地享受星巴克透過掠奪農民得來的咖啡；當大學教授沒有思考此等中產價值如何蠶食社會，貧者與富者的價值觀會越拉越遠，而機會、資源的分配也會變得越不公平。

社會流動的迷思

提起「中產」，自然想起社會流動。社會流動是近年流行的概念，不少人均慨歎現時香港的社會流動機會比以往低。以往香港的發展較為多元，現時則只剩下金融和服務業領頭，青年發展機會越來越少，也越來越窄，彷彿完全看不見前景。跨代貧窮也是相關的概念，當孩子生長於貧窮家庭，便有很大機會跌入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教育也未能提升整體的社會流動。

不少研究均指出，父母身處的階級，有很大機會延續至下一代。父母所處身的收入階層，很多時其子女都不能突破向上提升，只能維持相約的社會經濟地位，貧窮子女不能提升收入階層，富有子女自然能維持其高收入群組的身份。筆者會稱此為階級再造或遺傳（class reproduction）。

本來教育可以有能力打破這種階級遺傳，就是透過知識、技能和機會的分配，然而當教育和社會發展脱軌，以及上文所討論的存在機會不公平，教育根本不能發揮其重新分配的功能。再者，香港社會由上世紀 80、90 年代發展到現在 2012 年，社會流動的變化着實十分大。以往中五畢業考得會計文憑，便可以擔任會計文員，並有穩定的晉升階梯，到現時就連大學會計畢業也難保有良好的前景；以往的秘書可算是一個輔助專業，打字及速記於當時是高層次的技巧，到現時熟悉電腦運作只是最基本的入場條件。當中技巧要求不斷提升，但同時間機械化、自動化等讓很多原先必須由人擔任的工作，已變成可有可無。技術下降（deskilling）及等級下降（degrading）的步伐遠比教育發展來得快。當知識逐漸變成機器，教育更是變得沒有議價的能力。另一方面，對「多重技術」（multi-tasking）的員工要求越來越高，一個人要懂得不同工作的

處理，美其名是「通才」，實質是大大提升了員工的可替代性，十分容易便可以找到別人取代。企業不斷的「偷取人性」，管理其實是一種控制及壓迫，導致所謂的社會流動只是一少撮人玩弄的把戲。

當大學生也不是甚麼時，在香港教育體制下的「輸者」，要面對更大的困難。在這樣的教育和社會環境下，社會是不斷向下流的，大學生任中七要求的職業，中七則任中五要求的職業，餘此類推，在最劣勢的青年將面對越來越多困難。

教育是一種理想，而不是工具

從上文所看，教育的種種問題好像不能解決，貧窮的問題亦只會越加嚴重，但筆者在此希望提出一個顛覆性的思考：教育其實應該藉以創造更公平的社會，而不是簡化為讓人爬上「社會階梯」。

教育不應只是培訓精英，繼而讓這些精英享有高高在上的社會地位、特權；教育應是培育有人文精神和社會關懷的人，也應帶領社會進步和向前。理想中的社會應是更公平更公義的，不論是資源分配、機會分配、權力分配等。教育和社會的接軌，社會對多元發展的定位等，均與教育息息相關。社會不應傾向金融作單一發展，同樣教育也不應只着

重商科。強調多元和平等，是教育的一條出路。不論商業、創意工業、人文學科、社科等都應有發揮所長的平等機會，這才能挑戰現今資本主義的單一化和貧富懸殊的問題。

我們在談貧窮時，其實我們需要的不單是要「生存」，更是要「生活」。筆者認為，教育不應再「創造」更多的階梯，不應再「創造」更多的不公平。與其要貧窮人向上流「才能改善生活」，倒不如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公平，讓貧窮人不再如此貧窮，不再要為「生存」而掙扎，而是每位貧窮人也能活得有尊嚴，生活質素提升。社會的分層也可以減少，矛盾也應減少，正如筆者相信一點，作家和醫生的待遇不應相距這般遠，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也不是這般容易去量化。減少差距，才是共融的社會。

「窮人總是與我們相隨，但是怎樣才算貧窮，卻取決於和『他們』所相隨的『我們』是何種人物。」（Zygmunt Bauman〔2002〕，《工作、消費與新貧》）教育的理想，在於不讓人們脫離現實，在於讓人們去用心思考理想的社會應是怎樣。同樣地，教育也不是停留於書本和理論中，社會實況，是實實在在的於我們身邊。理解到貧富懸殊，也對貧窮人有真正的關懷，是教育必須處理的課題。

筆者希望提出一個概念：「知識再分配」。公平的社會除了資源和機會的分配，教育和知識的分配也是重要的。處於弱勢的貧窮人可能因為種種原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筆者認為，透過取得社會資源去不斷接受教育的人，應該用知識貢獻社會，也與基層和貧窮人共享知識，我們要相信貧窮人也能深層思考，也有能力帶動社會向前；我們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站在高處，我們是社會的整體。當然着實一點，為貧窮孩子提供免費補習，也讓他們參與社會已是一個很大的實踐。

願景

當思考到着實的世界觀，階級流動不是個人或家庭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的流動。如何讓社會走向更公平、更公義的狀況，是能夠打破以往對社會流動的迷思。貧富懸殊的解決，不能單靠教育，也不能沒有教育。教育和社會怎樣定位才是值得思考的課題。

誰的大學？

陳志宏（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導師）

若有留意的話，在世界絕大多數大學的網站內，尤其是新生入學資料的頁面，都不難找到一些有着各個不同族群學生的照片，標榜着多元文化濟濟一堂，香港的大學也不例外。我們大概也會同意，在一個大學校園裏，不同族群的年輕人在共同學習、相互交流，是理想大學教育的一部份。而近年我們看到的走向也大致如此，國際學生增多的同時，來自中國內地的學生也隨各個大學內地招生計劃的開動而增加，以中大為例，2011 年度就招收了約一成多的國際學生。同學們無論在校內或出外，都比上一代更容易得到文化交流的機會了，我們能不說我們的大學已跟理想更接近了嗎？

對於前面這問題，我們都願意去說「是」，只是多多少少欠缺一些堅定。不管是否能夠真正做到，至少我們認為開放、自由與多元都是我們追求的共同價值。可是如今我們面對的是，開放過後，出現了一些不知從何說起的變化，讓人無法掌握。

內地學生佔國際學生之中的最大份額，也最觸碰香港人的神經。雖然內地學生只佔約一成左右的人數，我們會很容易留意到：校園裏越來越多人在說普通話。明知是沒有多少關聯，聯想的能力已把我們帶到：

內地人在香港已是無孔不入。聽到內地人來港產子導致醫療資源緊張，我們甚至可以上綱到內地學生也是來香港佔用了教育的資源。而當知道城大學生會選舉有着共產黨籍的學生參與的時候，那可更不得了，認定就是政治滲透。縱然我們不斷說服自己的聯想並無事實根據，但到底我們猶豫、抗拒、甚至反彈的態度還是洩露了出來，讓人看起來，口中說着一套開放多元的價值，現實的表現卻很不一致。

這些疑問與聯想，無論合理與否都要得到回應。內地生真的搶佔了香港的教育及研究資源？政治滲透是否存在？又或者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搶佔教育資源？

任何一所開放型的國際學府，招收國際學生起來是從不作蝕本生意。內地學生投考香港的大學，競爭是越來越激烈，二、三十人之中錄取一人已是常態，能夠脫穎而出者稱為國之精華也絕不為過。學費方面內地學生一般都付出比本地學生高出一倍的學費，除了獎助學金惠及其中數十人之外，談不上有多少金錢補貼在內地學生上。學額方面，本地學生的學額並沒有因為多招收國際學生而下跌，至少數據是如是說。

還有，即是世上排名最頂級的學府，招收起國際學生來也從不是中門大開，總會把握着以本地人為主流的態勢，這樣，才可以在校園內體現出當地主流文化之餘，亦不失與國際學生交流的機會。只要收生的權力、制訂收生標準的權力，以及立校的精神理念仍牢牢把握在大學手中的話，就極少可能見到國際學生比本地學生還要多的情形，更談不上會出現像雙非嬰兒在香港誕生導致本地婦產醫療資源短缺的情況。

較少人注意到的是大學研究院的情況，當中的國際學生比例更高，尤其出現在博士學位課程，國際學生比例超出了本地人。那就意味外人搶奪了本地人的研究生學額嗎？當然不。出現這種情況，只能怪香港的學術研究以及畢業出路對本地人並不吸引。研究生本身已經是學術研究之中的廉價勞動力了，有志投身的人多是為了理想與興趣，能夠負笈海外固然首選。我們要感謝外來的研究生，為本地艱苦經營的學術研究貢獻青春，沒有他們，香港七、八成的研究項目就無法開展。

何謂搶佔？那是以破壞公平的手段來獲得更多。內地生遵守了香港的大學訂立的規則投考，同時香港學生也不必在投考過程中跟他們直面競爭，再加上來自國內外的研究生又是我們不可多得的助力，填補我們學術研究的空虛，用上「搶佔」這字眼來對待內地生的話，實是理屈詞窮之舉。

政治滲透？

政治滲透是讓人談虎色變的詞彙，它的確存在，而且就在我們身邊。不錯，帶有中國共產黨籍，或是已加入共青團的來港內地生大有人在。只是我們的認知未免落後，應對的方式也未免有點失禮。在城大學生會的事件中，香港人的反應是「匪諜就在我們身邊」式的驚慌，繼而立即舉報並大肆撻伐。是的，我們真的害怕共產黨入主大學，我們羞恥於我們的大學會出現黨委書記一職。但是若果將這種恐懼不對稱的反彈到國內的學子身上，那大可不必，這對事情沒有幫助。

相信我們不難看出，將所有擁有共產黨聯繫的學生都看成是特務是多麼愚昧的事，至少連今日的台灣也不會有如此態度。在近期中港矛盾之中，香港人將對中國的平均印象強加於每一個內地人之謬誤，已不用筆者再多言。只要能夠多從別人的教訓之中反思，要找出正確對待問題的方法也不難。筆者曾於美國認識的一位中國籍同學，在語文課中輕鬆的承認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而那位美籍的語文老師，則常常以麥卡錫時代所發生的事為恥。他們的舉重若輕，與香港的煞有介事就有天壤之別。這種舉重若輕的背後，是對自身所堅持的價值的無比信心，這正是我們所缺，也是筆者在以後多要着墨的。

請拒絕錯置問題

之所以要在前面花不少篇幅回應香港人對內地生的聯想，皆因近年內地人全面進入香港的原有生活，令不少人誤以為內地生進入香港的大學就必然造成教育問題。筆者要指出，將問題指向內地生身上絕對是一種問題錯置。此時此刻香港的大學面對中港融合時所出現的問題，是不能透過趕走內地生就能解決。

那麼，問題該放置在哪裏？先從我們的恐懼開始，再跟別人的無畏無懼作比較，再重新辨認出更根源的問題。

首先，是我們對國內年輕一代的無知。不只是我們，其實國內對年輕新一代多姿多采也是瞎子摸象，至少我們可以明白的是，國內由互聯網伴隨長大的一代，所能夠接觸到的多元思想，絕不亞於改革開放初期至 89「六四」前高唱着《一無所有》的一代。他們之中能夠脫穎而出考取最高學府及到香港留學的，都可說是熱切期待接受新衝擊、可塑性極高的一代，值得我們的大學去傾囊相授。而我們只管跟世界各國的大學一樣，成全學子的人格完整，讓他們無悔自己到來留學的選擇，已是做對了事。

第二，是對自身大學教育內涵空虛的恐懼。就算願意傾囊相授，也

要問我們的大學所相授的，又是否照顧到人的全面，若果大學只是一個產業化的職業訓練場所，生產打工機器的話，那麼我們上一代共同認定的一些價值，在沒有繼承者的局面下，不消幾年就可以完全變樣。一個對自身主流價值沒有捍衛的社會，等同任由他人的靈魂附身，就注定只能是一個跟隨者。我們真的需要恐懼金錢掛帥式的大學經辦模式，它會讓靈魂的培育放在次要地位，這明顯不是一個急需捍衛自身價值的地方所想要的。就趁內地生對香港社會的印象，仍然是自由、開放與法治的時刻，讓我們從自身開始繼續保留它捍衛它，否則到內地同學們再找不到香港可以為他們帶來甚麼新經驗的時候，一切就為時已晚。

第三，是對中港價值觀差異的恐懼。別人的大學、別人的社會之所以能做到無所畏懼，是因為平等、多元、開放等價值，早已植入他們文化的根裏面，可以從每一個個人身上找到。而在香港這一個中國地圖上的點，面對大陸一個處於強勢而又有着截然不同價值觀，我們又有何憑恃去別樹一幟？我們早已不再幻想香港可以改變大陸，但我們很清楚，如果連自己的社會、自己的大學也守不住這一套價值的話，我們就再也不能以國際城市的身份生存下去。

上述三個恐懼，一個比一個更嚴重。因為香港的大學到底還是不是

香港的大學，並不是取決於裏面有多少比例的香港人學生，而是這所大學內還有多少香港由歷史之中繼承過來的共同價值；其存亡更取決於又有何人何法來帶領香港的大學繼續在面對中國大陸時作一個中流砥柱。如果大家同意這才是問題所在的話，那麼，我們該繼續追問，還有甚麼方法可讓我們從普世價值的所學，繼續在我們的大學教育之中傳承下去，並發揚出去。

請別要亂

要克服對內地學生的不了解，唯一就只有敞開心胸去了解之途。對此筆者是樂觀的，因為對方已準備好跟我們坦誠的交流，同時我們年輕的一代，也作了我們的榜樣，率先走出交流的一步。期望有一天，內地的學子能在香港建立自己的成功故事，多了一重本地人身份認同，那就是我們的成功。

而對於大學教育內涵的缺環，尤其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還是要借助外力，讓香港的大學像以往一樣擔當文化交流平台的角色。當開放多元已成為不同文化學生的共同價值，不論本地生或內地生也樂意持守的時候，香港的大學文化，才有更深刻持久的內涵。

回想民初時期的中國，大學發展得以興盛，有賴一批對普世價值、人文精神敢於堅持的教育家。當時之難，更多在於開啟民智。可是在名利錢權之間關係千絲萬縷的今日香港，所面對的又是另一種困難，一種面對着自信的當權者而同時要持守自己之難。我們已再不能奢望有蔡元培再世，在今天我們只是卑微的要求社會在人文精神上，支持大學對理念有所執着，好讓我們在面對國家領導人來臨時，能夠不至於卑躬屈膝。作為政經貴胄的，停止消費我們大學的金漆招牌；而作為一校之長的，在面對官員對學術自由的無理踐踏時，敢於捍衛，敢於說不。

最後，從所謂內地生湧港這個偽問題中，至少可讓我們反省到，閉起心鎖只會讓香港的大學消失得更快，只要堅守開放多元的價值不放，並活出它，與更多人分享它，最後反而更可能讓我們存留下去。被掛在東方文化邊陲的香港，需要早日醒覺到，再沒有可以仰仗的人替我們守住自身價值，唯一的方法只有自救。讓我們從內地生議題的反思中得到多一點啟示，再一次肯定舊日持守的開放多元價值，去解決更多社會中的族群矛盾。那樣，不單是香港的大學還可以繼續是香港的大學，香港仍還可以是香港的香港。

非名校的悲劇

劉思航（教育工作者）

幸福的家庭大都相似，不幸的卻各有各的故事——托爾斯泰

香港教育失敗之處，從芸芸中小學外牆上的宣傳橫額可見，那些橫額大剌剌的老遠便能看到，上面那些硬銷文宣，令人反胃的多，欣賞的少。有民間學者如是說。好端端一間學校本來春風化雨、作育英才，卻為何劃破臉皮，把自己當成樓盤推銷？

全港各中小學除了傳統名校以外，事實上無不受着沉重壓力。名校的品牌力量驚人，深受全港家長青睞，從未擔心收生不足，可是「非名校」既沒有悠久歷史、沒有知名的校友、沒有豪華校舍、沒有可觀捐贈，它們為得學生家長垂青，只有用盡方法宣傳自己，務求跨過「一刀切殺校」的收生人數門檻。非名校條件乏善足陳，它們又以甚麼宣傳呢？原來普遍方法是令大眾知道其校政及教學方針，緊貼教育政策。

其中最早也最經典的例子在 1998 年，當時教統局發表《與時並進善用資訊科技學習五年策略》，政策列明「學生應能夠掌握並迅速處理資訊的能力」，當局隨即向學校提供大量資訊科技設施，並指示學校在編訂課程及教學也需要作出配合。於是，不論是否有意發展電腦課的學校，都忽然多了一堆新電腦。然而，「機」不可失，從天而降的資訊科

技，頓時成為宣傳重點，可以引以為傲的東西。因此，從那些校牆上的宣傳橫額可看到，不少學校無端趕上潮流，跟上時代，突然重點發展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又整整齊齊的列明了學校新增了多少間電腦室，學生與電腦的比例為多少。

轉眼十數載，電腦比當年普遍，新一代學生比他們的學長，甚至老師可能更懂得運作電腦與網絡。但我們仍可看到不少學校的文宣廣告以「一人一電腦」或「電腦繪圖興趣班」為亮點。電腦與提升教學質素的關係，事實上一直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證明，可是十多年來，數以千萬計的公帑卻花得落力。以宣傳角度而言，如果一間學校出色的地方是擁有很多電腦，真的可以吸引學生家長報讀嗎？那不正正宣告自己「窮得只有電腦」？

這種學校自我推銷的風氣，主要出現在 2000 年教改正式出台後，特別是「殺校縮班潮」出現後。每年初夏，坊間有不少團體會推出選校指南，裏面詳列了老師的學歷數據，例如 70% 學士、20% 碩士。因為普遍學校的教師學歷及資歷沒有太大分野，因此，有財力的學校（多為直資學校或私立學校）更會多出一兩篇廣告宣傳。它們有些列明自己邀請了某教授為教學顧問，有些更指自己與某外地／內地學校已聯為「姊

妹學校」。這種宣傳確實能夠增加家長學生的信心，吸引學生報讀。每種社會運作通常都隱含着一種「信任制度」，正如我們不會在上巴士之前，要求司機先駕駛十分鐘測試其技巧才安心上車。那麼沒有這雄厚班底的學校又有何奇招取勝呢？

公開試成績平庸的學校，倚着「一生一體藝」及「全人發展」等改革名目，刻意傾斜發展課外活動，吸引那些抗拒課本的學生報讀。這也是為何香港愈來愈多「另類名校」，所謂「另類」，不帶貶義，只是指出其優勢不在考試，而是校際比賽成績。當然，着重體育發展不會叫悲到哪裏去，最失敗的是學校沒有為學生好好打算，明知道香港九成以上的體育運動，還未發展到職業級數，眼看學生一天到晚都在練習和比賽，到頭來花了寶貴時光只為學校打拚，掙來一堆獎杯，公開考試過後便無以為繼，捧着一張形同廢紙的成績單。這時候還有誰可以幫到這些運動菁英呢？有多少個會獲得推薦，到適合的地方升學或工作呢？學校除了送一張「毅進計劃」的入學申請表以外，可以怎樣？更可恨的是某些學校，絲毫不為學生考試失敗負責內疚，繼續用狹隘目光緊盯獎杯，一副深表同情遺憾厚顏地鼓勵學生重讀幾年，繼續為校爭光。這類「名校」的課程發展孰好孰壞，家長學生應自有判斷。

有類學校更不幸，它們不論是公開試成績還是課外活動成績，也屬於中游部隊，校名不見經傳不受報載，被遺忘於千里之外。但教改也沒有忽視這類「雙非學校」。改革有「愉快學習」、「全方位學習」及「其他學習經歷」可供它們引為賣點。非名校怕跟不上教育潮流，一手是教育政策小冊子，一手執筆，依樣畫葫蘆。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學校的文宣看上去都差不多。彷彿大家只是照着教改口號，再機械式地，在口號後面加上「計劃」兩字，便成功搭上教改快車。甚麼「學生為本」計劃、「全方位學習」計劃、「全人發展」計劃，僅僅是對教改的空洞的反射動作。

教改強調在課室以外的學習方式，不少學校於是紛紛把握機會舉辦課外活動，更將原來的本地考察團、領袖營等行動升級，變成海外遊學團。時至今天，每逢學校長假期，也有不少遊學團出發，近至澳門、廣州，遠至北京，甚至歐美。不少旅行社瞄準商機，為學校設計好不同主題的遊學團，而學校亦好見如此貼心的服務，所以學校每年的預算中，總有一大筆花費在遊學團外判服務上。

遊學團的名堂當然多不勝數，譬如「文化歷史考察」、「地道語文沉浸」，甚至「小小太空人」。期間學生要完成老師一早預備好的工作紙，返港後亦要寫下個人感受和分組做匯報。學生出門學習，回來交功

課是合情合理，可憐的是隨團老師長假變公幹，在行程中奔走協調，照顧學生外，還要充當學校公關，為遊學團記下點滴，拍下一大籮活動照，留待晚上與同儕默默設計之後的公開展覽。在疲憊的回途上，老師也未能休息，因為要就每個學生的表現，寫份學習成果報告，而最重要的還是在剩下的一兩天假期中，想想如何把那篇鱔稿寫得有笑有淚，好分享自己的教學喜悅，務使廣大家長學生有「求學不是求分數」，甚至是「毋須學習經歷」的美麗誤會。

事實上，「全方位學習」及「其他學習經歷」理論上可為學生提供更多親身體驗，使學習方式更多元更切身，有效改善學習條件及平衡香港考試選拔制度，可惜政策推行前沒有仔細評核芸芸學校當中，到底多少有足夠條件落實執行呢？何況，不少學校主事者已無欲無求，天天機械式工作，上班下班。要動員他們理解新的教學法，犧牲私人時間準備，那又是否符合現實呢？如果學校教師都粗淺地理解和應用新教學，或是懶得改變，甚至只抱着「交數」的心態，如何應付得了排山倒海的改變與新工作？

學校不思進取也好，有心無力也罷，簡單如「其他學習經歷」，也眼看不少只盲目地增加課室以外的學習活動，每學期到地質公園考察火

成岩及地殼運動，或者到歷史博物館學習香港歷史等，沒有真正從課程設計上，考慮如何讓學生多元有效地學習，最後參觀外出的時間花了，課室教學時間壓縮了，效果不彰便是雙重浪費，大家又要趕書、補課。奈何，沒有亮麗的歷史傳統、沒有 10A 學生的非名校，要掙扎求存，只剩下「大海航行靠舵手」，落力表現其不落伍，充滿活力，時刻上進的「健康」形象。

筆者有不少來自這類非名校的學生，2012 年夏天他們成為第一屆中學文憑試考生，試後他們對我說：「阿 sir，凶多吉少啊！」於是再問他們如何面對茫茫前路，其中有人答曰：「演藝學院收咗我啦！下星期先去歐洲旅行學藝，之後才返學。」其他學生則說：「明日愁來明日當，反正那麼多的副學士、文憑課程，大不了便去讀新毅進。」知道他們清楚自己的出路，對未來有打算，總算放下心頭大石。但回想那位「成功學生」完全是在整個教育制度以外，單靠個人多年來努力爭取的成果。這位學生的成功不就證明非名校教育的失敗嗎？為何這麼多的學生之中就只有一個能突圍？為何我們要一個訓練出大多數失敗者的教育制度？為何政府只會跟紅頂白關顧名校？難道只有拔尖才重要？這些關乎大多數學生人生前程的問題，希望在位的大小官員都要深思。

如斯一個顯眼仿襲美國「自由女神像」造型的醜陋山寨版，只不過被命名為「民主女神」，就要「永久」擺放在大學當眼處，這麼庸碌的事，彰顯出校方的失語無能、校長的失責無權、學生的失落無知。若果，要繼承六四民主精神的象徵，為何不是八九民運北京天安門廣場被坦克車推倒那白色純潔的民女像？

我們應否反思一下，香港的整個教育環境，撞了甚麼鬼？

——彭志銘

凝思

大學之道——反思高等教育辦學理念

張炳良（前香港教育學院校長）

2011 年 8 月 2 日《南華早報》一篇專欄評論的標題引來我高教界一些朋友不少反響：「The last thing Hong Kong needs is more education」（「香港最不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為何「更多教育」變成不好的東西？評論似乎反映兩種懷疑論點：（一）教育花錢，而學者及教育界只懂不斷向政府要錢；（二）教育與現實世界脫節，不能為社會及企業「增值」（「學非所用」？）。

誠然，金錢不是萬能——常言道：「能夠用錢解決的就不是真正的問題。」不過，金錢的確是解決不少問題的必需成份。沒有錢和相關資源，貧困國家及落後的農村山區根本談不上推行基礎教育以消除文盲及提升生活技能，更遑論教育質素。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提出「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願景，要求各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齊心合力，投資教育，促進公平，消除貧窮。

教育不應看成只是一門投資生意

但是，教育也不應看成只是一門投資的生意，處處以金錢量化指標

去評估教育成效——例如投放了多少錢去培養一名法律學位學生，便問他畢業後能掙多少錢，儼然公義（justice）乃可用收入去量度。近年本地的大學往往為勢所迫，要向社會和媒體交代，究竟每年畢業生的就業率和薪酬水平如何，好像能掙多少便反映了教學的質素和教育的價值，大學變成了「搵工」預備所而已。

長久以來，我們的學校教育制度太受考試文化所支配，連通識教育也是。學校表現往往以其學生在公開試考獲多少「A」，及有多少學生能考進大學去量度，而後者也進一步以大學的排名去決定成績。我並非認為這些指標毫不重要，也不否定績效評估有其必要性，可是教育的目的和表現應不止於此。

社會上關注教育的人很多，不過若決策者、教育界、僱主和家長們只是關心公開試成績、教育能否帶來財政和經濟效益，又或是視教育投資就只等於要求政府多加撥款，則我們實難怪責下一代學生們只以消費者或功利主義的眼光去看教育（教育為了「搵一份高薪職位」、求學要「物有所值」、值回在學費和相關開支上的個人「投資」等）。

高等教育漸被視為「學歷工廠」

在全球翻起教育商品化的洪流下，高等教育逐漸被視為「學歷工廠」，求學只為求職加薪，如此會滋生一個追求證書與物質回報的惡性循環，教育的「明德」、「誠明」、「求學為智慧」等核心價值皆淪為紙上談兵。如前哈佛學院院長 Harry Lewis 所嘆，今天不少大學所追求的「卓越」已變成「空洞的卓越」（hollow excellence）和「失去靈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學府並不是靠硬件建設得來，而是繫於學者老師們的素質、操守與精神——即「軟件」和「心件」（heartware）。上世紀 50 年代錢穆與其他南下知識分子在香港創立新亞書院，物質及財政條件可謂惡劣至極，卻因其學問與人文理想（所謂「新亞精神」），培養出不少優秀人才。50、60 年代香港的大台學校，也造就了不少來自貧困家境的社會精英的成長。看今天，無論中小學或大學，物質條件充裕，大學課程的推廣甚至強調向學生提供不少福利與好處——獎學金、資助金、海外交流、宿舍、職業輔導、就業前途、收入等等，但會否因而造成年輕一代學子只問物質、忘記精神，只問取、不問施？

應反思大學的時代使命

現代的大學固然在人才資本構成和領引新知識以利生產力方面，負起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也應反思大學之為大學的時代使命和應有之人文精神面貌。一些所謂「世界級大學」的國際排名，基本上對此不聞不問。

大學之道，是否只由國際排名所支配和定義，是否只追求量化指標和數字遊戲（甚麼研究項目成績表、甚麼論文發表的引用指數），而變成捨本逐末？還是應回歸基本，講究學養：如何培育新一代成為積極而負責任的公民、勇於求真、學為人之道、不受傳統智慧和主流思想所限而活出想像和創意？

當香港已完成普及教育的粗放性（extensive）發展階段而進入深化（intensive）發展階段時，我們就不能迴避上述的根本性和價值取向的思考。

普及化還是精英化

我曾在《明報》專欄討論「大學求甚麼？」（2010 年 12 月 1 日），提出在此香港銳意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之際，我們應反思大學之道及

大學所追求的應是哪樣子的卓越。

2011 年 12 月 18 日香港大學為慶祝百周年，舉辦國際大學校長高峰會，探討大學發展的前景。在我作為主席的「普及教育 vs. 精英教育」分組討論上，來自東西方的大學校長及代表們，均非常關注當前大學所面對的兩難困局。

究竟今天的大學教育是屬於「普及化」還是「精英化」性質？從國際趨勢而言，肯定是走向較多普及化和較少精英化的開放狀態，能夠進入大學的年輕人增多。在亞洲地區，韓國入學率為八成以上，台灣更呈現學位供多於求，至於香港，儘管公費資助本科學位仍少（屬精英化），但是特區政府所訂定的六成專上教育入學率（包括副學士）則早已達標。

大學之道成為追逐名位之道

高等教育普及化成為趨勢，皆因社會面對知識型經濟的挑戰，並須回應社會流動和培育受教育的新一代公民的要求。入讀大學亦已成為年輕人的「合理期望」，甚至被視為基本權利。就算在傳統精英制的英澳等國，過去二十年間不斷有新大學成立。至於香港，政府仍限制得很嚴，

公費高校只有八所，但就期望依靠私立大學及院校去滿足副學位畢業生的「銜接」學位教育的需求。

一方面高等教育學位數量迅速增加，但另方面政府、僱主及家長們仍期望繼續維持高等教育的「精英」性質。近年全球高等教育「國際化」，造就「世界大學評級」排名，各國大學均捲入以「至優」的研究型大學為標準的競爭裏；它們備受壓力須成為「精英型」大學，並要在國際排名上爭得前列位置。逐漸大學之道成為追逐名位之道。

在資源經費有限之下，對大部份大學來說，這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務，期望與現實的落差不斷製造矛盾和張力，追求學問之地逐漸變得斤斤計較。

人們似乎期望高等教育「普及化」與「精英型」大學可同時兼得，但現實卻是：資源分配日益不均、學費低但成本高（特別是大學之間高薪爭聘研究型學者，及國際化推高教授薪酬），而角逐國際排名之壓力日增。弔詭的現象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同時，資源卻日趨集中於少量的精英性綜合型大學和研究型大學。經費不足的私立大學和學院，容易淪為二流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應珍惜多元

高成本和公費削減也驅使不少大學走向商界募捐和開發牟利課程與顧問研究活動，但卻引來社會上批評為商品化、以教研搖錢等。這是當今大學教育陷入的最大悖論（paradox），其傳統的神聖光環正逐漸褪色。簡單的傳統智慧會主張：一是像美國般實行分級制——即把高等教育分為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及社區學院各級，並將資源傾斜於研究型大學；一是採取歐陸的一些做法，在維持開放普及（甚至免費低費）的高等教育之餘，卻高度限制入讀精英型的「學院」，如法國的 grandesécoles。

情況是複雜的。值得根本反思的是，究竟每一個國家或城市的高

等教育系統應發展怎樣的一系列大學出來？不同的大學，不用跟同一模型，不用以單一的所謂全球化研究型大學標準去運作和評核；反之，應各自精彩，保持歷史傳承、特色和專有使命，如中國的師範大學與農業大學，及一些國家的文化與藝術大學等，各自精於所長，同樣貢獻國家世界、造福社會人類，不必斤斤計較甚麼排名。

高等教育應珍惜多元。「精英」教育的實質，應在於學習成果所反映的質素——即如何培育全人（包括品格、思維與能力）、如何賦予學生做人之智慧、如何養成具有創意的「社會分子」。「精英」質素，並不局限於時下世界級大學排名所採用的狹義準則所界定的內涵。事實上，愈是由此等排名去主宰高等教育之未來，則大學之道會變得愈來愈同質化和貧乏化。

（原載於《明報》「大學教育：普及化還是精英化」（2012 年 1 月 11 日）及「香港不需更多的教育？」（2011 年 9 月 21 日），今改寫。）

學生問卷評分　無助教學質素

林本利（教育中心創辦人、前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

筆者在理大任教時，大學在 1995 年開始進行學生意見問卷調查，藉此評估教員的教學表現。過去十多年，筆者所得分數十分平穩，若以五分為滿分，任教科目平均分逾四分。最高有四點七分，最低分一次是三點四分，因有幾個學生（可能同一組）給予一分。

由於過往學生問卷調查評分穩定，故此對問卷調查不覺得有甚麼壓力。事實上，大學管理層評核教員的教學表現，不應單看學生評分，還應參考其他資料，包括教學內容、教學材料、試卷及批卷水平等。個別院系會定期邀請校外人士觀課，評核教員上課表現及向學生代表收集意見，方便教員改善教學質素。只可惜個別大學管理層竟將學生問卷調查評分作唯一指標，評核教員教學表現。筆者曾遇上有學系高層，把全系教員評分由最高排至最低，以決定教員升遷和是否獲續約。

最離譜是這些學生評分龍虎榜全無考慮教員任教課程、科目、修讀學生人數和教學方式等差別。教員若負責授課式碩士課程科目，平均得分較高。教授十多人的導修課（tutorial）平均得分亦較負責數百人的講座（lecture）高。在內地教學的教員得分更不尋常，絕大部份學生給老師打滿分！

有一次筆者發覺任教經濟學同事分數偏低，向負責評分同事求問排名方法。原來計算是「加權」的，即將平均分乘以修讀學生人數。因修讀大學一年級經濟學每班人數達數百人，較低平均分乘大幾百倍，自然拉低分數！這對任教大班的同事不公平，我即指該方法錯誤。

後來同事告知，負責學生評分龍虎榜的同事，一般只負責授課式碩上課程，修讀學生人數不多，自然會採用對自己較為有利的評核方法。結果令一些負責任教大班的同事，成為這個制度下的犧牲品，他們可能因為評分較低而失去續約機會。

大學倚賴學生意見問卷調查的評分，作為評估教員教學表現的重要指標，自然會促使教員運用各種方法去推高評分。最常用方法，自己向學生「放水」，批改平日習作或測驗時手鬆一點，甚至給予過多學生A級成績，希望學生知恩圖報，在問卷評分時回贈高分。據聞有同事曾做過調查，發現學生平日習作或測驗獲較高分數，給老師的評分亦較高，兩者出現顯著的正相關。

問題是學生平日習作或測驗獲高分，甚至取得A級成績，但考試時則原形畢露，成績大幅倒退，甚至「肥佬」，自然深深不忿。結果考

試成績公布後，大量學生以成績與平日測驗成績相差太遠而上訴，要求校方重新批改試卷。

大學為減少學生上訴量，容許學生未上訴前可和老師一起查閱試卷，齊齊討論評分標準。老師為避免和學生爭拗，批改試卷時情願手鬆點，最後結果大家可想而見。

一些院系容許教員選擇學生問卷評分的班別，而非所有任教班別都要做學生問卷調查。這自然鼓勵教員「悉心栽培」某班學生盡可能投其所好，對學習態度欠佳的學生視而不見，這對提升教學質素完全沒有幫助。

在大學教學，一般要求學生成立小組研究某一課題，並提交小組報告。學生若發覺成績不符合預期，可能全組一起給予老師極低評分，令老師所得的平均分數大跌。倘若院系以學生問卷評分作為教員升遷和續約的主要指標，又如何確保教員維持學術尊嚴，不會因受壓而給予學生高分呢？

最令人氣憤的，是一些無心向學、常遲到和缺課的學生，竟還可在最後一課填寫問卷，憑其個人喜好為教員打分。為免出現這情況，筆者

近年在最後一堂上課後（而非下課前）先行填寫問卷調查隨即收回，令一些例牌遲到的學生無機會填寫問卷。

眾所周知，近年本地大學畢業生的質素每下愈況，工作態度和語文能力欠佳，不少僱主情願聘用那些在海外升學，回流香港工作的大學畢業生。

筆者以為本地大學畢業生質素下降，與大學走商業化路線，視學生為「顧客」有關。加上一些大學院系過於着重學生對教員的評分，令教員不斷遷就學生，教學內容和方法投其所好，把大學變成像中小學，甚至補習社般。學生的興趣是教員任教的科目是否易合格，功課是否容易，筆記內容是否足夠應付考試和測驗，及教員有否要求學生簽到的習慣。

二、三十年前，當筆者仍在大學學習時，資訊科技和教學設施遠不及現在。那時班房沒有電腦和上網設施，沒有 powerpoint 等軟件，大學教員（不論是教授抑或講師）沒有派發詳盡教學筆記，最多在黑板寫幾隻字或拿幾片膠片（transparency）放上投影機講解一番。但學生能吸收到的知識、學習到的思想方法，和鍛煉到的分析能力，肯定較現在的大

學生優勝得多。幾位對筆者影響較大的大學教授和講師，他們上課時往往只提供幾頁課程大綱，及參考書籍和期刊文章，完全沒有具體教學內容和筆記。學生上課時，總要一面聽一面抄筆記，要經過思考和消化才能稍為明白老師想帶出的訊息。若要更全面掌握教學內容，下課後便要多閱讀參考書和期刊文章。

這個學習過程，相對於教師提供全面的教學內容和筆記，學生當然較辛苦吃力，但當學生日積月累，不斷聽、寫、思考和提問，肯定有所得着，明白到求學應有的態度，絕不能希望一步登天，一蹴而就。

然而，這種教學方法若應用到今日的大學生身上，恐怕學生問卷評分十分低，老師遲早被「叮走」。

（原載於《AM730》「經濟人看世界」，2012 年 1 月 13、20、27 日）

培育順民的四種思考

戚本盛（教育工作者）

本文要談的是四種常用以培育順民的思考方式，並由此提出國民教育必須具備的一條準則。

且由 2011 年夏天的國民教育課程論爭說起。這次論爭中的一個焦點是，究竟國民教育會否淪為政治灌輸或所謂「洗腦」。這其實也在問：按照該課程培養出來的是怎樣的國民？甚至，是能知辨善惡，對國家政權是其是、非其非的國民，還是只知服從、善惡對錯以權威定奪的順民？

說好了的批判思維

培養順民其實反教育得很，起碼與當前政府倡導的教育改革背道而馳。1999 年開始的教育改革，其開宗明義的目標說得漂亮：

「讓每個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能夠一生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有充分的自信和合群的精神，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民主不斷努力，為國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頁 27）

無論當時的討論，或是今天看到的文本，都沒有提到，在這目標之上其實橫亙着一個國家政權的權威，可取代學生自己的思考，來決定各種是非對錯。反之，同一份政策文件更明言，高中教育的目標包括了「培養學生好學的精神、獨立思考及批判和創造能力，對家庭、社會及國家有承擔和具國際視野。」（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頁28）落實到課程時，其中的批判能力更成為九種共通能力之一，《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是給「批判思考能力」解說為「協助學生從所得的數據或報告中找出含意、立論和評估論據，以及自行作出判斷。」（課程發展議會，2001，頁22）

分析資料、評估論據、自行判斷，大抵就是理性思維的ABC，這已儼如常識，沒甚麼好議論的空間。問題是，如果涉及國家政權的行為，這些ABC是否仍然管用？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借助2011年香港引入國民教育科課程時的一個廣為傳播的例子。2011年6月4日，香港無線電視翡翠台播出以《國民教育》為題的專題節目《新聞透視》，有以下一節訪問兩個高中學生的內容：

[1]（旁白）：國民教育應該討論正面，抑或負面的訊息呢？

[2] 學生甲：看問題重要的是我們的立足點在哪裏，譬如說中國最近最熱門的新聞，艾未未（被拘留的事件 (1)，民主那一類，西方國家，或內地異見人士批評中國無民主，無人權……（經剪接）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要多方面思考這一個問題，我覺得……

[3] 記者：但現在他的拘留期超過了法例的要求……

[4] 學生甲：這個我想中國政府，他們可能有自己的思考……

[5] 記者：但這樣不合法的……

[6] 學生甲：不合法？（輕聲）不知道。

[7]（經剪接）學生乙：可能是一次對中國來說，一個特大的挑戰，所以才覺得拘留他是較好的方法。

（《新聞透視》，2011 年 6 月 4 日）

若就一個簡短且經剪接的訪問對兩位學生作出任何批評，或由此歸因至該兩位學生所接受的教育，均是不夠嚴謹的。引述上面的對答，只是作為示例，說明背離批判思考，在認識國家時，在涉及政權行為時的兩個常見培育順民思維的方式。

順民教育第一式：不過是對挑戰的回應

第一種如第 [2] 句那樣，把問題看成是中國面對西方國家的回應，訪問裏那位學生的說法，其實並不罕見。例如，比訪問早約十天發表的一篇報道，就提到一位持有博士學位的課程發展官員張永雄，在一次教師諮詢會上，也指民主、人權等其實是「西方價值」，是「向中國施壓的方法」（《通識教師》2011 年 5 月 26 日）。比訪問遲一天的一間中學畢業典禮上，歷史專業一級榮譽畢業的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給學生的訓勉中，就有這樣的一句：

「現在我們還受到很多國家的圍攻，如果你們看看歷史，在每一個時候，歐美都會有一個假想敵的，上世紀 80 年代是日本，現在是中國，所以香港現在的政治亂糟糟的，輿論很混雜，價值觀很混亂的。」（戚本盛，2011）

這種思考模式，可歸屬於「衝擊與回應」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衝擊與回應」的模式，可以追溯至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論述文明盛衰的著作 *A Study of History*（1962）；在中國對外關係史上的研究，則以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48/1971）的論說影響最深遠。以西方衝擊和中國回應的模式

分析中國的問題，肇始於上世紀 50、60 年代費正清等「中國通」，這個模式之出問題，在於過份概括，既忽略了中國內部差異和歷史積漸的各種因素，也生硬地假設了西方為主動（active）、中國為回應（reactive）的一種「蹺蹺板」關係。這些錯誤，其實早已在中國研究的領域有所糾正（柯文，1984/2002；汪熙，1993；Cohen，2003），可是，即使到了 2011 年，如上所示，堅持這種思考模式的仍然大有人在，何況上述訪問中的學生？而更重要的問題是，這種思考模式是如何有利於培育順民？這一點，下文將會有所分析。

順民教育第二式：判斷是非乃唯權是問

第二種模式，屬於一種「差序格局」或權位層級（Hierarchy of Power）的思維，即權力越大或權位越高者，可以擁有較大的甚至壟斷是非判斷的權力，如上述訪問中的第 [4] 及 [7] 句那樣，把是非判斷絕對依賴國家政權的判斷。這種仗賴權威代替自己作出獨立判斷的態度，明顯和上述提到過的教育改革中鼓勵學生批判思考的目標背道而馳。

要了解中國社會，差序格局是一個很有解釋力的概念工具，它由費孝通於 1948 年在其名著《鄉土中國》裏提出，所指的是：

「中國人的社會格局不是一捆一捆紮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費孝通，1999，頁334）

這個以「己」為中心、一圈圈外推的關係，就是儒家所謂的「人倫」，也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徵（費孝通，1999，頁335-336）。所謂「親疏有別」，判定某件事的首要因素在於關係，在於持份者在這個關係網上的相對位置，事件本身的是與非，反成次要。或者，在上述訪問裏的學生答案中，即使拘留艾未未已超越了法例的期限，但國家政權或有其思考，或有其面對特大挑戰的原因，簡言之，事件本身只屬次要，重要的是差序格局中較高權位者的判斷。

這種思路所表現的，正是一種「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因着要了解上世紀30年代以後的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得以興起，以致猶太大屠殺（The Holocaust）的心理學成因，「權威性人格」一直是政治心理學者的一個反覆論辯的概念，但本文想借助的，是金耀基在《中國的傳統社會》（1966/1999）裏「決定對錯是非的是階層的身

份而不是事情的本身」（頁 40）的說法。金耀基這篇文章，在 1993 至 2012 年間收入中六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課程中作為指定讀物，換言之，在這二十年間升讀中六的學生，估計超過五十萬人讀過上述的說法 (2)。

更值得一提的是，輯錄這篇文章發表的《從傳統到現代》一書，初版時正值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該書出版的用心是「中國的現代化，而文化大革命則是一個反現代化運動」（頁 1）。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關鍵成因，正是領導發動、人民響應的一種國家政權和人民的關係，這種關係，和現代民主體制裏的國家和人民的授權、問責關係大相逕庭，其主要差異正是「權威性人格」和「獨立人格」，結果教育所培育出來的，不過是把是非對錯交給國家政權的順民，而決不可能是以「成為國家的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 序言》）而自豪的人民共和國國民。

順民教育第三式：今天是歷史上最好的

上述兩種模式，都屬於「相對主義」的觀點，常見的相對主義觀點還有第三類，可稱為「回顧比較式」（Retrospective Comparison），是相

對於過去而言的，即當下的權利狀況，例如人權問題，是以是否比過去有所改善來考量的。例如，2009 年發表《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 年）》時，國務院發言人王晨回答「怎樣評價我們目前的人權狀況」的提問時，指「中國人權事業也實現了歷史性發展」、「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得到了巨大改善」等語（《中國的人權》，2009 年 4 月 20 日），2010 年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記者會上提到：「當前，中國人民享有歷史上最好的人權狀況，也擁有廣泛的政治權利。」（外交部，2011 年 6 月 2 日）

同樣以這種回顧比較來代替是非判斷的，是親近中央政權的人士對「認識中國」的看法。2009 年 6 月 15 日，一篇題為《香港再出發宣言》中以下「認識中國」的一段：

「儘管中國政府在過去的六十年，在發展的過程中犯了不少重大的錯誤；但是，尤其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雖然仍面對不少急須解決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她帶領中華民族再次站起來，擺脫百多年來的民族恥辱，進入小康，復興在望。作為參與其事的中國人一分子，亦深受鼓舞，深感自豪。」（《香港再出發宣言》，

2009 年 6 月 15 日）

這段宣言，和上述國務院及外交部的發言人所說的，可謂基本思路一致，就是迴避當前的議題，包括中國當時的人權狀況、艾未未被拘禁、以及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各種問題，簡言之，其實就是把對當前議題的是非判斷，偷換成與過去歷史的比較。

這當然經不起邏輯的推敲，比方說，如果把年滿十八歲界定為成人，則即使一名今年兩歲幼兒，在年齡上已比去年取得了一倍的增長，儘管我們承認，比起去年十七歲今年十八歲的青年的增長（十七分之一），其幅度要大得多，但我們還是決不會稱一名兩歲幼兒為成人的。

順民教育第四式：事情總不是那麼簡明

回顧比較，就是偷換概念，顧左右而言他，實在經不起起碼的思辯，難容於基本的理性思維。於此，要作最根本的迴避，大抵非一種訴諸無知的詭辯莫屬，因為，假如建立了不能肯定事實的前提，則大可安然得出不能肯定的結論，不能肯定，也就無須負上判斷的責任，無須承擔判斷的後果。

2011年10月7日，曾任立法會主席的范徐麗泰出席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座談會時，有學生要求她說出對「六四事件」的看法，她回答說：「其實整件事是怎樣的，我要很老實的告訴你，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所以我不覺得自己有權說要平反六四。」（《范徐麗泰》，2011年10月7日）其實，類似說法，當2009年5月27日立法會動議辯論「毋忘六四事件，平反八九民運」時，時任議員的詹培忠已這樣說過：「他們（傷者）究竟是怎樣受傷的呢？我當時是真的看不到，只是看到有人受傷，大家看到軍人衝入場內，但當時真的是漆黑一片……我是說事實派，我身為一位議員，應該說我所見我聞的事實……」（《會議過程正式紀錄》，2009年5月27日）

所說出的事實，是真的看不到甚麼，表面上這好像一個「知識論」上的悖論，即已知的是不知，事實是沒有事實，或起碼是模糊的事實，但所謂「不知道」只是為了迴避判斷，而非真的一貫要求對事物有嚴謹意義的認知才作出判斷。舉例說，2011年末正進行行政長官選舉工程的唐英年，在公開活動時被問及對劉曉波被判囚兩年的評價，卻以「不熟悉內地法例」為由拒絕評論（《唐梁》，2011年12月26日），然而，

劉曉波被判囚一事，按已公開的判決書指稱，他是因發表文章「造謠及誹謗中國政府」，在《零八憲章》中提出多項主張「試圖煽動顛覆政府」（《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 刑事判決書》，2009 年 12 月 25 日）。

在這裏，首先要思考的，並不是「內地法例」，而是兩個基本的問題：作為一個具備強大國力的政權，即使真的被一個公民以「造謠」文章「誹謗」了，為甚麼不可以澄清反駁，而非要使用控訴、囚禁的手段不可？只是在《零八憲章》中提出了取消一黨專政的主張，並沒有任何籌措武力的行為，即變成煽動顛覆政府，則甚麼才算是憲法允許的言論自由？這兩方面的思考，其實不必就法例字斟句酌，只是欲迴避思考者，仍然可以像「無所知地對每一概念甚至每一事實逐一細問，這樣做，就像所說的，「讓良知處於糊塗狀態」，這種糊塗狀態是出於迴避的選擇，以免讓自己去「思考那些容易惹麻煩的現實問題」。（胡平，2005，頁 24）

讓出空白　放棄思辯

綜觀上述四種順民教育的方式，可以表列如下：

	簡稱	解說	對國家政權行為的看法
1	衝擊回應	國家政權的行為，是為了回應外來衝擊而作出的。	同意
2	唯權是問	是非由國家政權決定，國家政權的行為總是合理的。	同意
3	歷史回顧	今天國家的發展，已是歷史上最好的，由此足證國家政權的行為是合理的。	同意
4	並不了解	不了解國家行為的事實情節或相關資料，所以無從判斷。	迴避表態

上述四種方式的共通之處，在於其判斷標準的相對性，判斷並不觸及事件本身，而是相對於其他標準而言，包括權位的高低、權威的定奪、過去的歷史以及不必要的細節要求，簡言之，就是不作判斷。理性思維的教育要求學生不罔下判斷，但決不是不下判斷，更決不是面對不公不義時，還極力保持所謂「多角度思考」或「客觀中立」，像上引的學生接受訪問時所說的，「要多方面思考」，南非大主教杜圖（Desmond Tutu）說過，在不公義的情境中仍保持中立，已形同選擇站到壓迫者的

一面（Quigley，2003）。被壓迫者是不會欣賞這碼子的中立，也不會欣賞這碼子的多角度思考。

對事情的是非對錯迴避判斷，如此便留出一個空白。在國家政權與人民的關係上來看，若從國家能力的一個方面來說，這種空白，實際上是讓位予全能主義（Totalism）政權介入（鄒讜，1994/2000，頁 204-265），自然與民主的價值相違，是專制獨裁的政權所喜聞樂見的；從人民能力的另一個方面來說，也就是判斷的匱乏，如同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一種「沒有思辯的狀態」（Thoughtlessness），在這種狀態裏，人沒有獨立的區分對與錯、美與醜的判斷力，而只服從於他者，簡言之，沒有思辯不是沒有最後的立場或決定，唯其立場或決定，是遠離事實和真相，並不獨立，而且假手於他人的（Arendt, 1963/1964；D'entrèves, 2000）。個人的這種「沒有思辯的狀態」，正和極權主義大有關係。鄂蘭在其名著《極權主義的起源》（1948/1995）裏，便有如下的說法：

「極權主義運動最顯著的外部特徵是個體成員必須完全地、無限制地、無條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誠。……這種忠誠只能產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們沒有其他的社會聯繫，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

忠誠使他們感覺到，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他在政黨中是一個成員，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個位置。」（頁 456-457）

在我們的文化裏，在學校的德育課程中，忠誠似乎一直是作為一項美德來教授的，但在鄂蘭這裏，卻可看到，單一的忠誠、沒有思辯的忠誠，只會有利於極權的操弄。更重要及比忠誠更根本的，是對是非的判斷。特別是對國家政權種種行為缺乏或迴避是非判斷的教育，充其量是以培育順民為目標，既然要培育的是順民，則決不會真的以為學生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並培育其為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的。由此可見，是否教導學生從事件的是非對錯判斷國家政權的行為，可以視為國民或順民教育的一條區分標準。

註釋：

(1) 艾未未，中國當代藝術家，除從事藝術創作外，也關注及參與維權活動。2011 年 4 月 3 日被北京政府拘留，至 6 月 22 日以「取保候審」名義獲釋。可以肯定的是，即以 5 月 10 日「刑事拘留」期限屆滿起計，艾未未被拘留已超過法例規定的上限逾四十天。（《艾未未》，2011 年 5 月 9 日。）

(2) 按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0）《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歷年報考情況及成績統計》推算。

參考書目：

（中文，按漢語拼音序）

(1) 《艾未未刑事拘留明屆滿》（2011 年 5 月 9 日，《明報》）。

(2) Arendt, H.（鄂蘭）（1948/1995）《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時報文化，中譯版，林驤華譯。

(3)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 刑事判決書》（2009 年 12 月 25 日）。http://zh.wikisource.org/wiki/%E5%88%98%E6%99%93%E6%B3%A2%E4%B8%80%E5%AE%A1%E5%88%A4%E5%86%B3%E4%B9%A6，2011 年 12 月 20 日閱覽。

(4) 《范徐麗泰：不知詳情　不談六四》（2011 年 10 月 7 日，《NOW 新聞》）。http://www.youtube.com/watch?v=a_hvpNl2qRI，2011 年 12 月 20 日閱覽。

(5) 費孝通（1999）《費孝通文集第五卷 1947-1948》。北京：群言。

(6) 胡平（2005）《犬儒病：當代中國精神危機》。紐約：博大。

(7)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2009 年 5 月 27 日）。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27-translate-c.pdf，2011 年 12 月 20 日閱覽。

(8) 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終身學習　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

(9) 金耀基（1966/1999）《從傳統到現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0) 課程發展議會（2001）《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

(11) Cohen, P. A.（柯文）（1984/2002）《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林同奇譯。

(12) 戚本盛（2011）《謝凌演辭教材之一：身份認同》。http://www.inmediahk.net/%E8%AC%9D%E5%87%8C%E6%BC%94%E8%BE%AD%E6%95%99%E6%9D%90%E4%B9%8B%E4%B8%80%EF%BC%9A%E8%BA%AB%E4%BB%BD%E8%AA%8D%E5%90%8C，2011 年 12 月 20 日閱覽。

(13) 《唐梁拒評論劉曉波案》（2011 年 12 月 26 日，《明報》）。

(14) 《通識教師批新國民教育假諮詢》（2011 年 5 月 26 日，《明報》）。

(15) 《外交部評艾未未獲獎》（2011 年 6 月 2 日）。http://rthk.hk/rthk/

news/greaterchina/news.htm?greaterchina&20110602&55&759576，2011 年 7 月 30 日閱覽。

(16) 汪熙（1993）《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取向問題：外因、內因或內外因結合》，《歷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頁 61-73。

(17)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0）《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歷年報考情況及成績統計》。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ALE/Release_of_Results/Exam_Report/Examination_Statistics/alexamstat10_7.pdf，2011 年 12 月 15 日閱覽。

(18)《香港再出發宣言》（2009 年 6 月 15 日，《明報》）。

(19)《新聞透視：國民教育》（2011 年 6 月 4 日）。http://mytv.tvb.com/news/newsmagazine/119157#page-1，2011 年 7 月 27 日閱覽。

(20)《中國的人權事業必將得到更大的發展》（2009 年 4 月 20 日）。http://www.humanrights.cn/cn/zt/tbbd/zt016/3/t20090420_441943.htm，2011 年 7 月 30 日閱覽。

(2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 序言》（1982/2004）

(22) 鄒讜（1994/2000）《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英文）

(1) Arendt, H.（1963/1964）.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2) Cohen, P. A.（2003）.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 on the Chinese p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3) D'entrēves, M. P.（2000）. *"Arendt's theory of judgement"*, In Villa, D.（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of Hannah Arendt.* Cambridge: Cambridge UP, pp.145-160.

(4) Fairbank, J. K.（1948/197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5) Quigley, W. P.（2003）. *Ending poverty as we know it: Guaranteeing a right to a job at a living wa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6) Toynbee, A. J.（1962）.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P.

香港「通識」——幾多式？如何適？

潘國森（文化評論員）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論語 • 子路）

「通識教育」是 21 世紀香港教育改革、教育發展的一大課題，影響範圍甚廣闊。今天各大學、中學都講「通識教育」，這個新生事物讓社會大眾、學生和家長都感陌生和難以捉摸，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

香港有一百五十年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回歸中國只有十多年。社會各界許多精英都受「前朝」的主流教育影響，喜歡用英語作為思考語言、以英文作為主要讀寫媒介，所以向來重英輕中。

雖然許多重要文件都有中英文兩個版本，但是「中英文版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為準」，這個範式名句，我們香港人在各種合約、通告之類的文件見過無數次。

為香港式的「通識教育」正名，當然要先從英文入手。大學有「通識」、中學也有「通識」，可是「大學通」和「中學通」是兩種「動物」！

老派「通識」共「七藝」

現時大中華地區（包括中台港澳）實行的學制，基本上依西方的傳統設計，可以追溯到中古時代歐洲的大學（university）。西方「通識教育」的「老祖宗」叫「Liberal Arts」（下文簡稱 LA），分為「Trivium」和「Quadrivium」，譯為「三學、四術」或「三藝、四藝」，合為「七藝」。

「三學」是「文法」（grammar，包括文學）、「修辭」（rhetoric，包括詩歌和歷史）和「邏輯」（logic）；「四術」是「天文學」（astronomy，包含運動學）、算術（arithmatic）、幾何學（geometry，包含地理）、「音樂」（music）。學過 LA 之後，就可以深造專門的學科，例如醫學、法學、神學等等。拿「七藝」來跟香港中學學科比較，就是語文、數學、文學、史地、科學、藝術等等都齊全。

香港過往照搬英國的大學學制，英國人在這方面講求效率，盡量減少年青人在大學唸書的年期，所以大學新生可以直接報讀醫學、法律、工程等等「專業」（professional）課程。美國學制比較貼近歐洲舊傳統，醫學院、法學院、商學院都不收中學畢業生，只收已讀完大學本科的學士。結果是香港醫學生一般二十四、五歲就成為醫生，美國醫科生大多接近三十才取得醫生資格。

幾十年前香港學額嚴重不足，只有少數成績出眾的年青人才可以上大學，這些精英大多能夠自學，不論文科理科，都能夠掌握比較全面的知識。上世紀 90 年代以後學額大增，不少較為平庸的學生都跨得進大學門檻，於是陸續有學生追不上專業課程的進度。這就是香港要推行「通識教育」的遠因，是為了越來越多文科生不識理，理科生不知文。

美式 LA 分三重

LA 在美國發揚光大，一般稱為「Liberal Arts Education」。該國有許多「Liberal Arts College」（一般譯為「文理學院」），開辦大學本科課程，不涉醫、法、工等「專業」。課程可以歸納為三大範疇，即：

1. Humanities（人文學科，可以理解為傳統中學裏「文科」的深化）
2. Social Sciences（社會科學，中學「社商科」的深化）
3. Natura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自然科學與數學，中學「數理科」的深化）

許多中學科目、大學本科課程，以至部份研究院的必修基礎課，都可以歸納為以上三大學科部門。有些學科三者兼而有之，例如醫科生的

診治知識主要靠「理科」，但是照顧病人的心理健康，以及教導一般人保健常識則無可避免需要「文科」和「社科」的知識輔助。學 LA 三至四年之後，理論上應該打好三大部門的基礎，畢業時通常會獲授文學士或理學士學位（或 Liberal Studies、Liberal Arts 的學士學位）。這樣就彌補一般學校文理分科過份鮮明的弊病。以近幾十年香港的情況為例，不知多少代學生被灌輸偏狹觀念，錯誤相信「文科女生」可以不懂數理，或「理科男生」可以不接觸文史。

美式「文理學院」畢業生的主要出路包括：中小學教師、銀行業、公務員、營銷人員、初級管理人員，以及多種「白領」工作。當然可以再修讀第二個學位，如法律、醫學、工商管理、工程、建築等等專業學位。這跟香港的習慣不同，中學畢業生從來都可以直接報讀這些專業學位。

「博雅教育」三缺一

香港嶺南大學是首間引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本地大學，前校長陳坤耀教授為這個「舶來品」起了一個全新的中文名，叫「博雅教育」。

常言道：「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命。」沿用傳統叫法原本無可厚非，但是香港執掌教育資源分配的社會賢達大多來自商界，他們對世界各地的教育制度未必有太大興趣去深入了解。陳教授當年曾經抱怨，決定香港各大學發展的「教資會」（全名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簡稱 UGC）否決嶺南大學開辦理學院的申請。這也難怪，人家不知「Liberal Arts」為何物，既然貴校的主力是辦「Arts」課程，那麼開「理學院」豈不是多餘？類似誤會在美國也發生過，所以有人乾脆加上「Science」，變成「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Edcuation」，務求消除誤會。

嶺南大學一步行差，相信以後要再爭取開理學院仍會荊棘滿途。現時嶺南大學有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和商學院，是為「三缺一」，少了「理學院」，有似兩足之鼎，這缺憾要盡速彌補才是。大學員生校友共勉之！

主流 GE 嘆平庸

「Liberal Arts Education」原本是最正宗的西洋「通識教育」，在香港既然被嶺南大學搶先移植，其他資格較老的大學當然不肯「附驥尾」。於是各校的「通識教育」都用了另一個英文名，即是平凡的「General

Education」（下文簡稱 GE）。90 年代初，一些本地大學陸續搞 GE，初期內容相當「簡陋」，只舉辦一系列講座，邀請社會各行各業的精英到校演講，每個學生出席指定次數，點個「卯」就了事，甚為敷衍。

當時有「通識通識，通通唔識」之譏。

「General」在此解作「一般」、「普通」，GE 應該跟「Professional Education」（專業教育）對應。如此一來，各大學的「通識教育」部門，其實在辦「非專業教育」，這才是 GE 的真實內涵。

大學裏面醫學院、法律學院、建築學院提供的就是「Professional Education」，畢業生獲頒相關「學位」（degree）之後，還要再考取認可專業資格，方可正式執業；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的課大多算「非專業」（社工系、心理學系部份課程可算例外）；理學院、商學院、工學院則一半一半。香港社會普遍認為醫生、律師、建築師、會計師、一部份工程師才屬「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他們的簽名可以具有法律效力。科學家、記者、教師反而「不似 professional」。

假如稍稍翻閱香港各大學 GE 的課程大綱、部門簡介，可以確認大部份 GE 課程都是按 LA 的模式設計，走不出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含數學）三分鼎立的大格局。

今天香港各大學的 GE 課，根本就是原來文、理、社、商等學院應該有辦的，所謂「通識教育」（GE）實在架牀疊屋，浪費資源。樹仁大學就不設「通識教育」部門，據知情人士所講，該校本來就不開「專業課程」，全部都是 GE，又何需另起爐灶，再立一個 GE 部門？

中學 LS 超英美

港式「中學通識教育」的英文名叫 Liberal Studies（LS）。

先談其「名」，按英語世界對這個 LS 的理解，一般指強調以「文科」、「文化知識」為主，補充「科學、專技或專業研習」（scientific, technical, or professional studies）的不足。

比如中國大陸，過去有許多非常專門的大學，例如「某某醫學院」、「某某中醫學院」、「某某工業學院」等，負責訓練單一行業的專才，這就有需要在校內另辦 LS 課程，以免畢業生在求學過程一面倒只涉獵本身專業的知識而忽略全面發展。

從這個意義去理解，「港式中學 LS」當然名不副實。

再談其「實」，現時這 LS 科分為三個學習範疇：

1. 自我與個人成長

含一個單元：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2. 社會與文化

含三個單元：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

3. 科學、科技與環境

含兩個單元：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

與「通識老祖宗」LA比較，這LS顯然是經過大刀闊斧的磨皮削肉，這裏的1、2、3，就是「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濃縮雞精版」。而第三個範疇更明顯「去數學化」，否則「文科生」可能要「暴動」。

何解？

新三三四學制要求學生在中、英、數、通識四科都「合格」才可以報讀大學本科課程。這是舉世罕見的苛刻要求，我們比較熟悉的中、台、英、美等地，考大學都沒有那麼難。因為人家都沒有「中學通識教育」這科。如果香港LS牽涉數學，「文科生」一般數學科比較弱，數學考了兩重，當然要抗議。

美國LA是大學本科課程，四年時間在「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與數學」三個部門都修了幾十學分，自然有基礎認識。香

港 LS 卻肢離破碎，中學三年只得約二百七十課時，其中九十課時還要用來做「獨立專題探究」，只剩下一百八十課時來學習三大範疇、六大單元。很有上世紀 50 年代，中國內地「二十年超英趕美」的氣魄。

這門 LS 可以怎樣適應 21 世紀香港年青人的學習需要？

有甚麼證據證明這樣的教與學適合香港的實況？

教學考核假大空

港式中學 LS 實在是個怪胎，設計者預期的「學習成果」嚇死人。現據 2007 年「課程發展議會」（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撮要如下：

(a) 探究當代議題，發展建構知識的能力，包括：

i. 個人成長和人際關係；

ii. 權利和義務；

iii. 中國改革開放；

iv. 全球化；

v. 公共衛生；

vi. 可持續發展，科技與環境的互動；

(b) 個人與自然環境、社會的關連，人類關注的議題；

(c) 多元身份、價值系統和世界觀；

(d) 價值取向，運用批判性思考能力等等，判斷和決定；

(e) 表達自己，看待他人的意見和價值觀；

(f) 探究式學習的能力；

(g) 自主學習；

(h) 欣賞不同文化和普世價值，成為盡責認真的公民。

因為原文用英文撰寫，譯成中文後甚為生硬累贅，筆者盡量刪節，免得讀者吃不消。如諸君要拜讀英文原件及中文翻譯，可到香港政府教育局網頁下載（http://www.edb.gov.hk）。

上列種種「學習成果」，求諸本地大學畢業生亦難，亦嫌陳義過高。如果一般大學生能夠一半達標，納稅人應該要額手稱慶。

現時中學通識科的老師，又有幾許能夠達標？老師也不能，如何「識教」、如何「適教」？

甚至我們議會裏面的直選間選議員，或者政府任職的政務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又有多大的比率能夠做得到？

一般傳統科目如物理科、地理科等，所有教師都學過、考過，而且

考得合格的成績。現實在這門 LS，由負責設計課程、設計考題、批改考卷，以至教授課程的教師，全部都沒有往績可考。

截至 2010 年 10 月，香港考評局發佈過兩批樣本試題和評卷指引，錯漏百出，差不多每題都有毛病（可參考筆者的部落：http://blog.ylib.com/samkspoon/Archives/Classification/0002）。

再看上文「批判性思維」一詞，也顯示翻譯人員完全不了解現代中國。在中國大陸「批判」是「對所認為錯誤的思想、言行進行批駁否定」（詳細分析可參考筆者的〈通識批判、批判通識〉，載於《百家文學雜誌》，2011 年 4 月）。實情是近幾十年來中國大陸任何人被「批判」，早就被認定犯了嚴重的錯誤。課程發展議會和考評局的專家都如此走漏了眼，又焉能帶領和引導我們的年青人認識「現代中國」？怎能適應「現代中國」的風俗習慣？

香港 LS 千瘡百孔，本文只從其中一個角度探討，可以預期這個科目最低限度要實行十年八載以上，才有修改或廢除的可能。如果真能達致上述一半的「學習成果」，設計這個課程的教育界先進，可記一大功。他們是：

黎樹濠先生　王國彝博士　朱順慈博士　李永良先生

李浩芬先生　許寶強博士　陳　岡博士　趙永佳博士
劉錫霖博士　潘林珍女士　繆惘光女士　蕭榮漢博士
關穎斌先生　羅天佑博士　李志雄先生　黃志堅先生
盧家耀先生

以上只包括「通識教育委員會」，轄下各「工作小組」成員從略，排名依中文版的次序。

如果這門香港 LS 最終仍要步「學能測驗」、「母語教學」的失敗後塵，可能是很多年以後才可以確認，那麼上列諸位就有責任向受影響的同學道個歉。

若要現在下定論，實在言之尚早，需要持續觀察。

走着瞧吧！

香港新高中視覺藝術科課程發展及考評的謬誤

黎明海（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學術執委 、前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視覺藝術科試卷主席及校本評核分區統籌總監）

香港於 2012 年舉辦首屆中學文憑考試，這個考試是推行多年新高中課程的一次重要考驗和檢視。打從 2003 年「三三四學制」改革諮詢開始，本地教育官員不斷推銷新學制是一次「拆牆鬆縛」教育理想的實踐，可讓學生「學會學習」，發揮潛藏的九種共通能力，迎接新世紀的挑戰。然而實際情況是自從 2005 年教育改革（教改）推出後，香港學子每年往外國升讀中學的人數持續上升。根據英國文化協會調查顯示，2011 年赴英升讀中小學的港生較 2009 年上升 21%，這就是公眾以行動向新高中課程投不信任票的明證。更遑論公眾常指稱本地教育官員當中，究竟有多少會願意把自己的子女留在香港的官津學校，把子女的前途「押」在他們強勢推銷的新學制和課程改革作「實驗品」？

然而中學文憑試的考期日近，考評的信度和效度備受批評。當中視覺藝術科（視藝科）自 2010 年 11 月 13 日有五人考評專家小組及兩名分區統籌總監，因不滿考評「指示不清」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官員「無理粗暴干預」考評事務，憤而集體辭職，揭開視藝科課程發展及考評的種種荒謬事項，引起視藝教育業界以至社會各界的關注及討論。

課程設計及其內容的謬誤

20 世紀 70 年代視覺藝術教育（當時稱為美術教育）常被詬病只着重技藝訓練，課堂教學活動不是藝術製作（繪畫、版畫、雕塑、陶瓷等媒介操作）和設計，就是手工藝的勞作。其時「放任」被誤以為是培養創意的最佳手段。所以 80 年代初時稱「美勞科」的教師均刻意「少講多做」，除了藝術製作主題的簡略介紹和分發所需應用的物料或工具之外，其餘時間就用來批改其他課堂習作或是清理案頭的文件。無怪乎「美勞科」，雖在五育（德、智、體、群、美）並重的所謂全人教育中，擔當美育使命，然而由於欠缺強制的課程綱要和教科書，又無具體而客觀的學習成就評核標準，故被當時教育界視為「閒科」或「術科」。

1982 年教育司署（即為現時的教育局）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頒行的中學「美術與設計科」課程指引，容許學校因應教師個人學養、學生學習興趣及學校環境設施，彈性處理課程綱要內的建議教學內容及提案，並自由選擇及編訂校本美術科的課程。當時的課程綱要總方向是「學校可以按照實際需要，自行試用各科的課程綱要。」（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中一至中三），1982，頁 iv）在總結美術與設計的教學方向，課程綱要框定：「這種創作能力的發展是不可以文字形容，亦不能

加以量度的……由此看來，美術實在並非一個學校科目，而是對世界作一種觀賞，也是一種生活的哲理。」（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中一至中三），1982，頁 3）又或是在中四至中五的課程綱要中寫道：「因每個學生在形象表達能力方面的發展程度各異，所以要劃一地令每一位學生或每一班級達到同一程度那是不可能的。」（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中四至中五），1982，頁 10）在高級程度的課程綱要則稱：「美術與設計教學本身就是一種藝術，所以教師一定要靈活和富有想像地使用本課程。」（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6，頁 8）當時課程設計是認同學生的個別學習差異，亦尊重以學校本位的課程設計，那是一種何等崇高和理想的美育願景，與今天事事要求成果評估、追求量化的度量，並向文字傾斜的視藝教育，實不可同日而語。當然這種彈性執行的原則，一方面為教師帶來可供自主發展的空間，同時也造成教學良莠不齊的現象。後來這種情況在 90 年代中葉，因着「學科為本的美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在本地積極推動，有了明顯的改變。

「學科為本的美育」把「藝術批評」、「藝術史」、「美學」與「藝術創作」歸結為美育的重要支柱，把雜亂紛陳的視覺藝術教學納入了一個可供「學」與「教」的軌迹上，也為課程設計和評估建構了一個可循

的模式。於是 1997 年的「美術與設計科」課程綱要提出「一如其他科目，美術是可以學習的」，並把美術知識、美術創作和美術史，設定為課程設計的三項核心學習範疇（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7，頁 6）。後來在 2002 年，保羅 • 鄧肯（Paul Ducum）教授更把「學科為本的美育」拓闊為「視覺文化的藝術教育」（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強調流行文化在視藝教學的重要性，教師的角色從課程的主導者變成了學習的促進者（facilitator）。因應美育趨勢和轉變，2003 年香港遂以「視覺藝術」取代「美術與設計」或「美術與勞作」，成為中、小學全人教育的一環。當中課程的轉變較明顯者乃置「藝術評賞」為與「藝術創作」並駕齊驅，成為視藝科兩項主要學習範疇。由是藝術評賞在短短數年間，忽然從「美術史」的學習範疇冒升為視藝科學習的焦點。

除了課程內容的轉變，教育局一改以往彈性容讓教師按校本需要來編排視藝教學，改為強勢要求教師必須按官方頒行的課程指引嚴格執行有關課程的編排。然而這種強制性的要求，假若是有一套完整而理想的課程指引作藍本，尚可談論長遠的視藝教學發展，可惜引以為據的課程指引《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3）及《視覺藝術：課程評估及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下稱《高

中課程指引》）卻千瘡百孔，其識見淺薄不堪。

查筆者早於 2005 年 7 月《文匯報》發表《香港新高中視覺藝術課程芻議》，已清楚指出新高中視藝科課程定位不清的缺憾。文中指出：「《高中課程指引》卻只因循放諸四海皆準的理念，強調所謂：『學生可以透過一個結合了視覺藝術評賞和視覺藝術創作兩個交錯纏結的範疇的均衡課程，來學習藝術。』……這些空泛的目標與小一至中三的教學有何差異？有何進階之處？由此可見，課程設計者對視藝科發展的識見是狹隘的——既無美術創作的深入研究，又缺乏美術評賞的學養融通。於是文件內只能不斷重複過往小一至中三文件內的所謂『美術知識、經驗與技能、價值觀的態度』的概念。」當年的課程編整既無對藝術評賞範疇作進深的建構，只是不斷強調和運用以學者費德曼（E. Feldman）理論為依據的單一評賞模式，於是從小學至中學的視藝學習，尤其評賞理念和形式變得枯燥乏味，未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無怪乎 2011 年 6 月「視藝教育關注小組」的問卷調查結果，68.2% 本科（視藝科）教師清楚反映課程未能鼓勵學生的創意發展。正由於當年課程綱要及指引粗疏淺陋、官員對有關視藝的內容認知模糊不清，致使科目發展凌亂無章、進退失據。

高中視覺藝術課程結構與小學及初中課程欠銜接呼應

細讀《高中課程指引》，文件開首概論指稱「高中階段的視覺藝術課程乃建基於2003年所公布的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頁1）。假若當局以此為建構課程的方向、目的或基礎，理應在文件內容多作呼應，以闡示有關脈絡，可是筆者發現除了這一關鍵句之外，文件內並無明確指示或扣緊有關視藝科在小學、初中與高中的關連。

《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文件若框定小一至中三為三個學習階段：辨析、運用、探究，則高中視藝學習理應為第四階段，明顯應建基於此三階段的學習成果，而建構有關教與學的理念、模式或重點。可惜《高中課程指引》內卻只有因循放諸四海皆準的所謂「兼重藝術評賞與藝術創作兩方面」（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頁1）等含糊不清的概念。這些空泛的目標與小一至中三的教與學有何差異？有何進深？雖云視藝學習大都以「螺旋式」建構課程，但斷不可高中仍舊「評賞」與「創作」並行，審美與態度一番便蒙混過關。

考評的謬誤

除了課程設計理念及整體銜接和推展為業界詬病外，視藝評賞及校本評核的形式及實施亦備受業界質疑。查視藝科的高中校本評核要求學生提交兩個作品集，當中包括（a）研究工作簿（顯示與藝術創作／評賞研究相關的藝術評賞及研究過程）20%；以及（b）針對主題的藝術作品／評賞研究（每一作品集包含三件作品）30%。當中考評指引一直被指欠清晰，例如，有前線教師指出有關研究工作簿的樣本頁，究竟可否作編輯整理？根據考評局刊行《視覺藝術：校本評核教師手冊》（下稱《視藝校本評核手冊》）（2009）第 4 頁，只說明：「考生須向考評局呈交 12 頁節錄自研究工作簿的資料（副本／影印本），連同 3 頁分別展示三件作品的圖像」，當中未有申明到底可否容許編輯增刪。但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官員屢次在公開場合，口頭要求教師對樣本頁不許作任何的編輯整理。然而考評局 2011 年 9 月發給業界教師的函件稱學生需繳交樣本頁，並不應於呈分後對樣本頁作任何修改，當中再無強調於呈分前可否作編輯。明顯地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官員多年來一直發放錯誤訊息混淆視聽。如果不是有官員越俎代庖，錯誤發放不盡不實的考評資料的話，就是本科考評標準政出多門混亂不堪，以致令業界無法掌握清晰標準。這種前後不一而造成考評的混亂應歸咎於負責的官員。

考評準則含糊不清訊息混亂

除此之外，業界對《視藝校本評核手冊》中公布的評分準則及有關描述亦存在異議。根據「視藝教育關注核心小組」2011 年 6 月 22 日發布有關《教師對新高中視藝科課程及考評意見問卷調查報告及建議》中顯示，「69.3% 教師表示不同意考評局提供的校本評核評分準則提供各項『成就描述』能準確地評核學生在校內的藝術學習表現」，然而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官員於 2010 年 11 月 13 日在一個考評局主辦的教師考評會議上，多番堅持高中視藝教師「務必遵守」該手冊內的「成就描述」來逐一評分。此粗暴干預考評事務引致五人考評專家小組集體辭職。可是教育局及考評局 2011 年 7 月 29 日就有關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刊登的報章聲明的書面回覆，卻仍堅稱「公布的評分準則及有關描述，已為學生不同能力的表現提出一套描述參考，以幫助教師評分的客觀及一致性」，盡現官僚意態，其罔顧業界訴求則於此可見一斑。

基於評核準則兩局標準不一、含糊不清，加上前線教師對校本評分準則及有關成就描述存在異議，故此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回應業界的訴求，於 2011 年 7 月 6 日提出「五分行動」，其理據為「在欠缺清晰和一致的課程及考評指引下，應給予學生校本評核成績最優等級，即五

分，藉此保障學生在本科六年中學學習成就」，藉此啟動視藝科考評的調分機制，促使考評局必須遣派調分員到校，對有關研究工作簿作完整而全面的評估。香港美術教育協會認為這對比只單憑樣本頁的調分評估更具考評的信度和效度，其實這種到校全面調分的機制，正是 IB（國際文憑課程）一貫校本評核的實踐。

其實對於這種無所適從的評核標準，業界師生已不止一次公開投訴其混亂情況，如 2011 年 7 月 8 日香港電台節目《自由風、自由 phone》內，有一位備考新高中的視藝科學生已明確指出考評標準不一，引起她對應試的惶惑不安。假若有關當局仍執迷不悟，引發師生家長不滿將一發不可收拾，亦將因此引發文憑試後大量的考評投訴。

藝評考核淪為看圖作文

除了對校本評核標準含混不清的投訴外，業界師生對筆試中藝術評賞的考核方式亦極表不滿。其實早於 2005 年 1 月筆者與時為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組主席余樹德，於《文匯報》聯名發表一篇題為《高中課改邊緣的藝術教育》的評論文章。文中早已指出課程欠缺時代與媒介的範疇，在浩瀚的視藝領域裏，要作考試的預備變得極其困難。查考評局在

2007 年實施的新高中視藝科樣本試題的「先導測驗」研究報告中，亦已明確提出公開考試的藝術評賞既沒有提供學習範圍，甲部試題又沒有提供作品的背景資料，根本無從作出課程文件要求的「分析、詮釋及評價」等不同層次評賞的水平，更無所謂具深度的藝評考核，最後藝評筆試只會淪為業界引為笑柄的「看圖作文」的兒戲考卷。

原來倡議評賞，不過是用有關學習來回應「語文」主導的本地教育政策的總方向。藝術評賞被顢頇無知的課程制訂者扭曲為發展語文教育的手段；在傾斜於語文發展的所謂教育政策中，創意、想像、美感經驗等都可拋諸腦後，評賞變成鞏固語文教育的一種工具。然而，教育局及考評局對研究報告反映的師生意見置若罔聞，仍堅持不會就考試範疇或形式作任何檢討或修訂，只暗示會在評核準則作出適應。這種削足適履以掩飾低水平的考評設計，實在貽笑大方，亦無法顯示視藝科水平參照的考核成果。雖然考評局曾表示會於本屆中學文憑試後，對各科的考評形式或制度作相應的檢討，但在已刊行或正在執行考評方式不可即時修改的原則下，這種荒謬的看圖作文將怠誤隨後數屆的視藝科考生。

視藝課程及考評謬誤的代價

新高中視藝科課程既無專業的規劃，有關官員歷年來對業界所提的意見置若罔聞，更置學生個別學習差異於不顧；至於考評準則含糊不清，為語文服務的所謂「藝評」筆試，又將變成另類的「看圖作文」。把本來着重創意思維、情感表現的科目，變成了一科鼓勵機械倒模、胡謅亂扯的「閒科」。若干年前正當新高中視藝科課程推行得如火如荼之際，一位當時即將退休的視藝科首席督學曾向筆者「預言」，本科在中學文憑試五屆之後（即 2017 年），應試人數將由其時八千多劇降至少於一千。

筆者但願他的「驚世預言」不會應驗。至於筆者近年知悉不少前線視藝科教師提早退休，更有數位患上抑鬱症及精神病，師生為顢頇官員的無知無能，正在付出沉重的代價。正如筆者 2010 年當眾辭任考評局分區統籌總監一職時，祝願「教師可以健健康康的進行教學；學生開開心心的繼續學習」，將是本地視藝教育業界之福。

參考書目：

(1) 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1982）：《中學課程綱要——美術與設計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三適用）》，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2) 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1982）：《中學課程綱要——美術與設計科課程綱要（中四至中五適用）》，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3)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6）：《中學課程綱要——美術與設計科（高級程度）》，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4)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7）：《中學課程綱要——美術與設計科（中一至中三）》，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5) 課程發展議會（2003）：《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6)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2004）：《新高中課程核心及選修科目架構建議諮詢初稿》，香港：政府印務局。

(7)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視覺藝術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名校傳說

陶囍（專欄作家、大學講師）

哪裏有人，哪裏就有名校，附送一籮筐的名校傳說。

2010 年 12 月，蘆葦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發表題為《名校教了我甚麼——女校生的反思》的文章，旋即引起熱議。我的觀察或有偏頗，但從網上的回應文章看來，最熱衷此話題的，若非系出名門的過來人，至少也是認識了三、五個出自名校的親朋戚友。

網上就有好幾篇出自傳統名校男生手筆的博文，豐富了無福消受的路人甲乙丙對名校的想像。當天我收到一個推介電郵，寄件人說：「很棒的文章！相信我們當中，不少人有過這樣的經歷！」真的嗎？至少同列為收件人的我就不是。即使真的有很多人經歷過這樣的學校教育，又如何？從來非議名校名不副實，例必一呼百應，但罵人也要本錢，出身名校的人批評名校是「有反省」，換了跟名校沒半點關係的，同一句批評就算沒被演繹為酸葡萄，也會得到「啊，那種傳統和文化，沒經過的人很難明白」的標準回應。那種微妙的身份認同，簡直與名校生共存亡，最終不管褒或貶，都只會進一步鞏固名校的神聖地位。

揭開那些傳說，反覆描繪的圖像是這樣的：在名校，求知靠自己，上學學的，乃應世做人之道，放長雙眼，回報是未來幾十年的人際網絡。

關於名校的種種故事，最終教訓要不是「不值一哂」，就是「不外如是」，甚至「不堪回首」。蘆葦說：「名校最成功的，是它大批倒模生產一個個典型香港人——實際、精叻、識上位、識表現自己。」

要大批倒模生產典型香港人？聽起來難過希望工程。為甚麼要這樣做？這樣做有甚麼好處？蘆葦小姐的結論難免讓人覺得，名校存心靠害，空談教育理念，苦心孤詣，為的是維持現行一切制度的穩定。

我沒有想得那麼灰。走入任何一家「名校」，你一樣會遇見有教育理想的好老師，也一定會碰到至少一兩位尸位素餐、誤人子弟的人之患。說到教曉人看懂眉頭眼額，不見得名不見經傳的學校就不來這一套，說不定有過之而無不及，分別只差在對「時務」的理解和領會。討論名校，擺出一副傲視同儕的嘴臉固然難看，但自我矮化也無補於事，往另一個極端走，把其他一眾「普通學校」加以浪漫化，更是天大誤會。平情而論，今日香港的教育困局，是否名校，都各有各的苦痛。名校底子有多厚，精明的父母不是不知道，但橫豎都是痛苦，博得入名校，再苦也是甜，起碼十年八年後，那個出身仍有一定的價值。傳統名校考不進，地區名校也是好的，至少可增加入大學的機會。餘此類推，名校的光環由是永不褪色。

我在一所被界定為「地區名校」的中學畢業，愚見認為那是一種同樣值得討論的學習經歷，因為這類學校的發迹故事，跟今日香港教育面對的困局息息相關。

上世紀 70、80 年代，新市鎮相繼落成，那年頭，願意山長水遠搬進偏遠公屋的家庭，十居其九是基層小市民。基層子弟除了家庭社經地位低，跟住在干德道的富家子弟，身體和腦袋構造完全沒有分別，大家都是人，一樣有人適應這樣的制度，有人不。不過干德道的小朋友在香港沒有書緣，大可赴笈海外開展另一段緣份，家在公屋的小朋友想爭取向上流動，就要過關斬將，用知識改變命運。

屋邨名校能夠在同期開校的同行間率先冒起，秘訣在於盡收該區學業成績最好的小學生。大家都是新校，照說都是白紙一張，大眾憑甚麼判斷學校好壞？標準一，看牌頭。歷史因素使然，某些宗教背景和辦學團體的學校特別有觀眾緣，他們在草創階段收到 Band 1 學生的機會看高一線。標準二，看業績。學校辦了幾年後，學生在公開試的表現是最佳指標。簡單一點說，這類學校的成名策略是收「好學生」，再想方設法培育他們成為制度認可的「好學生」。

我不厭其煩把好學生囚禁在括號裏，因為身經萬千考試的香港學生

都知道，學校儘管都在談德智體群美，但至少在中學階段，最後勝利屬於考上大學的一群。考試既然是一把尺，不能沒有統一標準，這些標準一旦離開了本意善良且目光遠大的課程文件，飛入尋常課室，自會被改裝重組，成為可死記硬背的標準答案。屋邨名校的必殺技，說穿了其實就是「操練」兩個字。操練方法不外五日一小測，十日一大測，平日放學固然要補課，長假期更是黃金檔期。個別老師會精製筆記，學生讀的是老師消化過的心得，後來坊間出現了「雞精書」，好端端的中史科，被約化成「遠因、近因、事件經過、結果和影響」的方程式，讀得人人心生納悶。如今千帆過盡，我們大可嘲笑這種填鴨式教育多麼缺乏批判獨立精神，但事實證明，我們當中，不少人都是這麼走過來，掙得改變命運的入場券，與此同時，名不見經傳的屋邨學校，憑藉騎人的大學入學率，成為家長趨之若鶩的「好學校」。

說到擁抱主流成功價值，我看不出傳統名校和地區名校的分別，畢竟大家坐的是同一條船。傳統名校的特殊優勢，在於既有過去的歷史和傳統，又有未來的人際網絡，這兩大利好因素，足以確保「好學生」的超穩定供應。地區名校的出色「業績」，卻不幸成了他們的「傳統」（或包袱），為了維持競爭力，學業成績只能上不能下，結果補課和測考頻仍，連同貢獻給一眾補習天王的時間，學生忙得透不過氣。叫不少傳統

名校生一世自豪的自由學風和多元課外活動，地區名校未必不想擁有，就怕顧此失彼，搞好了音樂體育美藝諸如此類，卻少拿了A。有時是巧婦難為無米炊，資源不足，有心無力。時日一久，外間還是很容易就察覺傳統名校跟地區名校學生的微妙分別——前者自報家門時自信滿滿，落落大方，以為全宇宙都應該知道學校的英文縮寫，後者報完長達十幾個字的校名，心虛膽怯，矮人一截。

三三四新學制下，不管是傳統名校還是地區名校，都得面對巨大壓力。過去預科這道關卡把部份學生篩選了，留下的是精英，入大學率作為其中一個最明確的「業績」，數字亮麗。新高中，人人直升到中六，一次大學入學試，立見真章。目前約百分之十八學生能升讀學位課程，全港幾百家學校，那十八個百分點會如何分佈？不少老師校長已經不住調整彼此期望，預告家長，提醒學生，前面條條大路，除了升大學外，人生還有其他選擇。人生當然有很多不同選擇，無奈在此地，很多選擇最終其實都服從同一套準則，信奉效率，鼓勵競爭，不重過程，只看結果……即使再多幾家直資學校、優質私校、地區名校，我們是否真的「有得揀」？

長篇大論老半天，說的還是要擺進括號的「好學生」，那些成績不好的學生怎麼辦？曾幾何時，有些學校所以聞名香港，正是因為他們

收的不是「好學生」。在大學入學率是百分之十八的前提下，考不上大學其實很正常！奈何大家都要跟着同一支舞曲旋轉，跟不上拍子的開始在課上找周公談心，那些壓根兒不耐煩跳舞的，悶得慌了就在課堂搞笑或搞破壞。在這些學校當教師的，當然也不缺純粹打份工賺份糧的普通人，但我認識不少特有愛心滿有熱誠的老師，甘願為這些被過早標籤的學子服務，他們一樣想方設法，為的是提高學習興趣，糾正性格和行為的種種偏差。我聽過不少叫人眼眶濕潤的感人故事——嬌小女老師在街上見到學生被圍毆，挺身而出，喝退大漢；中七學生的父親遇交通意外身亡，老師自發籌款成立基金，承諾照顧學生至完成學業；校長年年不動聲色自掏腰包，幫助家境困難的學生。這些義行，媒體不會報道，討論區沒人青睞，更不會被計入增值指標，但所謂春風化雨，所求的也不過如此。

適齡學童人口銳減，殺校縮班在所難免，首先陣亡的會是哪類名校？可恨的是，戰死原因不是不想教好學生，而是收不到「好學生」。我想不通的是，我們大可殺盡 Band 3 學校，但除非不再把學生分等級，這世上始終會有 Band 3 學生，他們是否只能在所謂「上移錯配」中，重複前人的命運？家有受不了港式教育的子女，又沒能力送他們放洋的家長，可以怎樣？

直至目前這刻，我還不敢說直資學校是否提供了真正有意義的選擇，抑或不過是在能力組別以上，多加了經濟組別的關卡。我所知道的，是過去十年八載的教育生態，愈來愈重視「市場」，說甚麼「錢跟學生走」，聽在領受過何謂師生情的我的耳裏，很是難受。情與義，值千金？在教育商品化的狂流下，很多滿載一代人的青蔥歲月的校園，將會成為歷史，無數人再無母校可歸。

當那一天來臨時，我們想起母校，會想到甚麼？有一年聖誕，我在一個派對上認識了一位年過半百的時髦阿姨，不知怎地聊起了她的母校聖路琦中學：「我哋唔同其他聖乜聖物，但係我哋都係名校！在灣仔，無人夠膽蝦我哋！」說時手舞足蹈，談到開心處，彷彿變回四十年前的飛女。另一次，我問一個剛升大學的女生在哪裏唸中學，她報上年年見報的預科書院名字，我奇怪，問她中一至中五又在哪兒唸書：「啊，間學校唔出名㗎！」

我常常記起這兩個小片段，告誡自己，母校雖然也有很多問題，又不能如傳統名校般給我更寬大的舞台，但我總是感恩，在這裏我遇過非常好的老師，有幸打好了學習的基礎，很多年後的今天，我有能力用另一種眼光檢視這段時光時，我沒有忘情。

（原載於 2010 年 12 月 19 日《明報》，今改寫）

另類洗腦
——從通識科的經驗看德育與國民教育

許寶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教育局早前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下簡稱《指引》），再一次惹起爭論。贊成者認為，1997 年後的香港，有必要加強德育及國民身份認同；反對者則擔心，這是政治「洗腦」工程，只許「唱好」國內發展，不容討論「六四」、維權，甚至可能會重蹈日本、德國法西斯的舊路——「禍延數代、後患無窮」。

面對質疑，除了創造出一個「開展期」，讓學校可實質上延後三年推行此科外，教育局還花費五億，一次過補貼每間學校五十三萬元，以銀彈為課程開路。

儘管教育局建議教師在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內容時，必須中立、抽離，不過，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仍然願意清楚表明反對設立這一科目的立場，理由如下：

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無關的科目

首先澄清一點，筆者並不反對認真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只是無法相信，在香港目前的教育脈絡下，加設這樣一個科目，真的能夠有效孕育

《指引》所羅列的各種正面道德價值，更遑論促進國民身份認同。相反，如果我們真的嘗試推行《指引》的建議，要求學校設科、師生教習，將很可能會產生很多不經意的負面效果。

暫不論它是否一項政治任務，差不多可以確定的是，本科的推出，大概與教育理念並無多少關係。正如前教育學院校長莫禮時（Paul Morris）教授指出，香港的課程發展，基本上是一種象徵性的政策（symbolic policy），也就是並不認真地訂定、釐清和貫徹官方的教育目標，只求避免批評、準時交差、完成任務。Paul Morris 與 Bob Adamson（2010：29）舉例指出，過去教育當局製作的關於道德、公民和環保教育的各式課程指引，由於與公開考試成績無關，大都被學校和教師漠視，只間中虛應事故。換句話說，在製作課程時，教育當局所關注的，更多是能否準時「交功課」，而非課程目標、內容、教學法和考評之間的連貫一致。於是，出現像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一樣「模稜兩可」、「面面俱圓」的指引（見許承恩：〈如何嚴守「中立」又教好正面價值？〉，《明報》，2012 年 5 月 4 日），自然並不奇怪。

不幸的是，這些「模稜兩可」、「面面俱圓」的課程指引，卻往往產生了不少負面的不經意效果，包括與課程目標剛好相反的教育成效。例如，以孕育學生正面價值觀為目標的課程，卻打造出「講一套、做一

套」的玩假心態；又例如，以培養批判思考和多角度視野為旨的科目，則產出了正反各打五十、贊成反對各列三點的考試套路。

新高中通識科的檢討

筆者正與一些教育團體合作，進行一項檢討新高中通識科課程的問卷調查，當中的一些初步結果，或許有助我們理解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可能產生的問題。

2011 年年底至 2012 年年初，我們向全港新高中通識科教師和部份中六學生，派發問卷，調查他們對課程內容的評價。2012 年 3 月，收回的問卷分別是六百四十三份（教師）和二千八百八十四份（學生），調查報告仍在撰寫中，並將會於稍後的時間發表。這裏先引用一些有趣的初步觀察，以作為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參考。

我們的調查發現，受訪的六百多位通識科教師，超過一半同意他們「花了很多教學時間於訓練學生的應試技巧」，只有約一成左右明確地表示「教育當局對新高中通識科的課程目標有清晰的指引」和「從教育當局得到足夠新高中通識科教學的支援」，但不同意的則有四成多。問卷邀請受訪同學用一至二十字來形容他們經歷的通識科及專題研習學習過程，出現頻率最多的詞句是：「不明白／不明所以／不知所謂／唔

知做乜」、「困難／辛苦」、「悶／煩」和「浪費時間」等負面描述，「不錯／好／有趣／正／有用」等正面評價，則相對少得多。

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較為相關的，是新高中通識科官方文件中羅列的其中一項教育目標——令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對於這項目標的檢討，受訪師生的評分是通識科各項目標中最低的，只有稍多於一成的教師和兩成的同學同意通識科能促進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卻有超過四成的師生不同意；此外，約四成師生認為，通識科的專題研習孕育了學生的馬虎交差心態，另三成師生甚至認為，專題研習培養了學生弄虛作假的風氣。這些不經意的教育效果，間接印證了在象徵性政策和考試主導的學校環境中，嘗試利用一個科目去孕育公民道德價值的虛妄。

不完全對焦的評論

如果當代香港的教育脈絡維持不變，依據《指引》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將很可能如上述的通識科經驗一樣，產生與官方宣稱的價值教育目標無關甚至相反的效果。在象徵性政策和考試主導下，學校師生大概不會太認真地教授和研讀課程內容，吸收當中蘊含的政治訊息，就正如國內推行多時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沒有在多大程度上減少國民移居歐

美、澳紐、港日等地的興致，亦難以消除網民大衆對官僚腐敗、貧富懸殊的不滿。因此，批評者所擔心的那種政治「洗腦」效果，或許不致於大規模出現。相反，評論的焦點，或許應放在象徵性課程的不經意效果，包括推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另類「洗腦」，例如鼓勵師生習慣於「講一套、做一套」的虛偽，又或因循於各打五十的「中立抽離」，以至窒礙思考的程式化考試套路。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配合當日教育局公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新聞，一些報章效法新高中通識科的試題樣式，向讀者提問：「多大程度同意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為必修課程」？並同時提供作答「貼士」，建議同學表述正、反觀點，並在支持科目能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培育國民身份認同感」，或反對「學科將成為政治任務，變成洗腦科」這兩種立場中，選擇自己的立場。這種千篇一律的提問方式和作答建議，顯然無法鼓勵同學因應香港社會和教育制度的具體狀況，進行認真的思考。剩下的，只是同學自己也不太相信，但卻能滿足考試（或制度）要求的「中立抽離」答案和處事習慣。

需要稍為澄清的是，筆者並非認為「只談成就」、「避談六四」的課程設計沒有問題，一個開放、沒有政治審查的課程內容，自然是十分重要的。這裏想補充的，是我們必須把課程置放在具體的學校環境和社會脈絡中，才能分析它可能產生的實質影響。

事實上，在傳媒和互聯網發達的世代，香港學生在電視、報章、網上接觸到有關「六四」、「維權」等資訊及評論，往往遠多於從學校獲得；此外，沉悶的學校教學，也難敵傳媒和互聯網多姿多采的呈現和發放形式。因此，如果官方想成功進行政治「洗腦」，恐怕必須更全面地監控大眾傳媒和網上活動。倘若政府提出的影響記者採訪自由的《纏擾法》和被稱為「網絡廿三條」的《版權修訂條例》獲得通過，其政治「洗腦」的效果，恐怕絕不比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低。循此思路，要有效對抗政治「洗腦」式的國民教育，在反對《指引》中政治偏頗的內容之餘，教育工作者還需要同時向損害新聞和網上資訊流通自由的《纏擾法》和「網絡廿三條」說不；而如果我們想減少象徵性課程所引起的另類「洗腦」效果，恐怕得「推倒重來」、「循序漸進」，徹底改革課程發展的制度和過程，放棄玩假的象徵性政策，依據民主和透明的原則，以專業的知識和認真的態度，尊重學校、師生置身的環境和面對的局限，重新訂定各項課程，包括通識和德育及國民教育。

參考書目：

Morris, Paul and Bob Adamson （2010）: *Curriculum, Schooling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疾首

我要做好呢份工

□□（一個隨時會離開教育崗位的前線工作者）

入行十年，我對教育工作越來越感到失望。

當初，我憑着一股對教育的熱誠入行，雖然沒想過要做到桃李滿門、人人都稱譽的名師，但也希望能作育英才，將知識灌輸給學生，為教育盡一分力。然而，十年以來，我發覺根本沒可能全情投入教導學生。這不是我不投入工作，相反，是我對工作太投入。

教好學生，並非壓力來源

每項工作都有壓力，教育工作自然也不例外。

要讓學生成才，是壓力；能否循循善誘令學生向善，也是壓力。古語有云：「教不嚴，師之惰」，教不好學生，身為教師的，總要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雖然學業成績不代表一切，但教師從旁指導學生，讓學生能在公開考試中爭 B 奪 A，順利升讀大學，似乎是教師樂意做好的份內工作。

當然，絕大部份教師是有足夠的能力教導學生。近年，新入職的教師，最低限度都持有大專學歷，並修讀了教育文憑。教師擁有專業學問，傳授本科知識，可謂應付自如，應該不會感到太大的壓力。可是，擁有

本科的專業知識，是不足以應付校內的工作。

在大部份教師眼中，工作壓力的主要來源，並非只為學生追求理想成績。超過八成的教師均認為，「朝令夕改的教育政策」和「繁重的非教學工作」才是壓力的來源。

的而且確，教師對本科知識的認識程度，與能否勝任教師的工作，完全是兩碼子事。畢竟，教師的工作是很複雜的。純粹在課堂上教授本科知識的時間，大概只佔教師整體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在擔任班主任的工作外，同時要負責課外活動、約見家長等恆常工作。這些在教書以外的工作，已令教師忙得不可開交。此外，再要兼顧其他大大小小的科組會議、趕進修時數、宣傳學校等工作，教師需要花大量時間，處理不少非教學的職務。如果還要兼任其他行政工作的，可謂忙上加忙了。至於原屬教師「本份」的改簿、備課等工作，卻變成次要的職責了。

因此，僅有本科大學學位的知識，又怎會有足夠的能力，應付教師的工作？

工作量大，工作時間長

教師的工作越來越多，根本沒可能做得完。

學生上課的時段大約是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但教師的工作時段較學生時間表長。在上課時段，教師固然要留守工作崗位，但在下課後，還要處理學生問題、補課、課外活動等工作，於是，能準時完成當天的工作，幾乎是沒有可能的。

隨着三三四新學制的開始，教師的工作量有增無減。除為新課程授課時間不足而要進行的補課，以及處理校本評核外，還有其他歷境學習等新課程工作。由於工作量大增，許多教師已不可能是五天工作制，幾乎已肯定成為六天工作，甚至是六天半工作了。有不少教師表示，每天可以在課餘只需工作兩小時而不用帶工作回家的，已經是輕鬆的一天了。

以此推算，教師的工作時間一般是每天十至十二小時；連周末的額外工作在內，教師每星期的工作時間可長達七十小時。這個工作時間，遠較政府規定每星期四十四小時的工作時間指標，多了約三十小時。

有團體對教師的工作時間作出統計，結果顯示：「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的教師，接近三成。」我相信，這個結果頗為接近事實。

教師要在惡劣的環境中營造愉快的氣氛

工作時間長，但教師仍要抽時間進修。

為了增進專業知識，兼要提高學歷來「保住飯碗」，不少教師在取得大學學歷後，仍要編定進修計劃。許多教師——尤其是年輕一輩，在放學後還要趕着上課。

本來本着終身學習的原則，上課學習與進修，本無不妥，可是，大部份教師在課堂上已消耗掉所有體力與精神，加上還有大量未完成的工作，就要匆匆忙忙抱着疲憊不堪的身軀趕着上課。在這種情況下，進修變成了負擔。又有一些教師，只是為了證書而進修，毫無學習動機可言。於是，進修變成應酬式的「無謂工作」了。

工作時間長，還要不斷進修，令教師在工作上獲得的快樂指數持續下跌。有教育團體用問卷，以自評的方式，訪問了來自七十餘間學校，共一千二百多名中、小學教師，藉以了解教師的快樂程度。結果顯示，有近三成教師的快樂程度在五分的合格線以下（調查以一至十分計算，五分是合格分數）。如果教師的工作環境沒有得到改善的話，只會越來越多教師感到工作不愉快。

而最諷刺的是：教育局一直強調要學生「愉快學習」，希望學生可

以輕鬆地學到知識。可是，教師在「痛苦」的環境中工作與進修，從未體會過甚麼叫「愉快學習」，偏要為學生營造「愉快學習」的環境。這實在是將學生的愉快，建築在教師的痛苦身上。

社會問題，由教師承擔

除了要維持學科的專業知識，教師在課餘還要進修其他專業學問。教師所進修的，並非屬於自己的興趣，許多時候教師只是為教育局回應社會的要求，而進修與學科無關的知識。

要知道，現在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不少人會歸咎於教育失敗，於是，大眾對教師的額外訴求也隨之而增加。當學生情緒有問題，導致悲劇發生時，矛頭馬上指向教師；學生有吸毒習慣，就埋怨教師未能察覺到問題所在；學生之間發生欺凌事件，又指責教師未能處理有問題學生。至於學生有校園暴力、行為不檢、沉迷賭博與上網、盜竊，甚至是涉及黑社會、援交等問題時，也會算在教師頭上。這些問題，是一位盡責任的教師能處理得到的嗎？

教師已做好了傳授知識的工作，但教師的「本份」越來越多，社會對教師的期望，也越來越高，結果，社會人士會對教師提出更多的「無

理要求」。

本來，教師不一定要處理這些複雜的工作，但最可悲的是，教育局最「樂意」做的，就是為教師提出承擔責任的方法，讓教師可以處理好這些非教學的工作。例如，當社會人士認為教師不夠「專業」時，就為教師開班增值。教師不認識毒品，遂推出禁毒課程；不知道怎樣開解情竇初開的青少年，就提供有關輔導課程；專門處理網癮、賭博等活動和工作坊，為數也有不少。這些安排，務求教師能跟上社會要求，成為「優秀而專業」教師團隊。

難道教師進修若干小時的課程，就可以解決所有學生問題？是教育局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是認為教師能做到「周身刀張張利」的奇能異士？還是教育局要將教師成為犧牲品，來滿足社會人士的要求？這些額外工作，令不少教師吃不消。

不用解釋也知道，學生問題是依然存在的，但教師為了教育局要回應社會的訴求，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以及無形的壓力。

教師壓力大，瀕臨「爆煲」邊緣

有調查發現，百分之五十九的受訪教師表示，教師工作帶來「很大

壓力」或「頗大壓力」，當中有六成的受訪者，因壓力過大而考慮轉行；又有半數受訪者指出，壓力過大而導致精神緊張；甚至有兩成的教師，曾萌生自殺的念頭。不了解教育工作的人，或許會覺得教師反應過敏，事實上，情況真的很惡劣。

教師不是不想教好學生，但在缺乏支援、時間之下，又怎能完成教師的「責任」？

本來，有不少投身教育事業的教師，是很喜歡教育工作，亦願意以教育為終身職業，不過，當理想與現實的情況相距太遠時，教師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決定轉行或提早退休的資深教師，離開這個千瘡百孔的教育界了。

入行十年，我一直希望能「做好呢份工」。然而，「呢份工」，應該要怎樣做，才算做得好？就算一個認真盡責的教師，可以一星期工作七天，每天十二小時，但也不可能完全應付排山倒海的工作。我想：「要做好呢份工，已經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

教育局沒有為教師改善工作環境，卻不斷為教師添加壓力。在這種工作環境下，教師要教好學生，似乎是另一個天方夜譚的故事。

不容思考的教育

盧浩元（社區工作者）

教育，是給人去發問問題，是去探索世界、探索社會。不論過去、現在、未來，教育也應去處理和思考，吸取經驗，當下實踐和提出社會願景。當然，這是很理想化的想像，現實上的教育也非如此，甚至相距很遠。

不知何時開始，香港的教育已變成工具，只是為個人在階梯上提升的工具；也不知何時開始，香港的教育已不需要、不容許我們去思考、去發問，只讓我們單向的吸收知識。教育逐漸遠離社會，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教育改革，改了甚麼？

過去十數年，香港教育經歷了不少「改革」，最重要的數項，是教學語言、學券制、副學士、三三四學制、通識、國民教育的硬推。基本上，全部都是退步的政策。這種種看似沒有關係的政策制度，其實是有一個將之串連起的政府政治目標。

教學語言的爭論，母語教學取向固然是希望學生對祖國語言有更多認識，也令能力稍弱的學生能夠較有效學習。當然，其原意的成效有待

商榷，但其實際運作是，將英文學校與中文學校區分，令學生、家長的集中點朝向精英教育，爭相競爭英文學校的學位，目的只為有更大機會「上位」，而忽略了思考學習和教育其實不應只是工具，更應是培育人去思考。

學券制、副學士都是教育市場化和商品化的產物，這亦令教育只作為工具的想法更植根於大眾心中。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教育成了大眾心中提升社會地位的工具，逐漸失卻了思考教育的本質和意義（筆者在另文處理社會階梯的議題）。這是政府樂意見到的事——社會穩定、各人也為自己的事務而忙碌，不去參與和關心社會，也不去對社會進行批判。

至於通識教育、三三四學制等，成效不彰是預期中的結果。推行通識被人嘲諷「通通也不識」，談到社會和世界大事，其實官方課程有既定一套標準答案，美其名是豐富學習，實質上只是再多一項背誦的科目。三三四中的「其他學習經歷」更是勞民又傷財而沒有用處的東西。那些交流學習，安排的全是一些「只看好，不看壞」的行程，不論是中國大陸的交流，或是香港內部、世界各地的交流，都是以精英式的風格去學習，完全不着地也不實在。那些義工服務更是越做越濫、越做越失

卻了其本質。當義工服務變成評分的一部份、當義工服務只是工具、當服務對象只是手段，其實已歪曲了對人尊重的基本價值觀。

自從回歸後，政府其實不希望那份源自英國殖民的自由、民主風氣蔓延，也不希望公民社會有良好的建立，從而令政府施政穩妥。思想控制，是防止公民社會建立的重要一步，政府就是要透過教育去做好把關工作，從基礎教育、大學教育與社會價值的建立，慢慢磨滅人的批判思考，令人們逐漸變得順從。

2011 年 5 月 26 日《明報》報道，一位老師在國民教育科的諮詢會上質詢教育局官員：「若學生深刻學習反思後，認為不為身為中國人自豪，老師應如何評估？」教育局官員竟回應：「一名學生由小一入學到畢業，或由中一至畢業，（卻）覺得成為這間學校的一分子……而不感到自豪，是否要想想中間發生了甚麼事？」教育局官員竟然有如此的思想，他言下之意，是指每一個香港人均需要為身為中國人而自豪，這種單一的價值取向和高壓要求，實是可怕。

國民教育科的硬推，背後存在十分多問題，相信大家在不同報道、團體意見上已經看到了，在此也不多作討論。這一連串的教育政策，實是一種「再殖民」，要「教育」學生一套標準家長式的愛國思想，只要

遵從中國式思想，便是好學生。人是回歸了，人心未回歸，這一點中國和香港政府也很明白，所以思想教育和再殖民是近這十數年越來越多出現的問題。

對學生的壓迫和小學式大學

香港的學生，很喜歡跟規矩及規則行事，需要按照既定的框架去學習，需要老師講課，需要測驗考試，需要被人安排好時間表，否則便會失去方向、失去目標。

香港的學生不喜歡真正作主，渴望被控制、渴望不變、渴望「吸收知識」，而不是去思考、去批判、去為自己作真正的規劃。筆者在大學時遇過一些同學，他們很不喜歡上課時討論，覺得很「吹水」，沒有學習成果，筆者估計他們的心意正是想由老師講課，由老師主導，被「灌輸」知識。當然，這只是筆者的猜測，但學生不願去作主是很真實的現象。

說實在，筆者認為功課、測驗、考試對於學生是一種壓迫，死記硬背、機械式的做十萬嘢功課，這是學習麼？學生能夠有空間去思考麼？相比英美等教育方式，香港的實在是太落後了。英美學校的功課、考試

較少不在話下，課堂討論氣氛更是熱烈。筆者在美國交流時，一個一百人以上的大課上，講課後的發問和討論環節，至少有三分二學生舉手爭取發言機會；在香港，如果見到三隻手已算是好了。當然，可能有人會說這是文化差異，外國學生較適應和習慣此模式，華人學生較內斂，容許我說一句，這種文化差異就是我們弱的地方，實不應容忍。沒有功課和考試，不代表不是學習。學生自主的學習，主動搜尋書本、主動去問問題、向社會發問，就是最重要的學習過程。

此外，不斷的專業化也是一個問題，如果專業化象徵着社會階梯的提升，學生只會視之為更重要的工具，被考試和專業資格規限了自己的生命，根本不是真正的學習。

另一方面，我也很討厭「灌輸」這個概念。灌輸有一種自上而下的施教意味，老師在上，學生在下，充滿權力和壓迫的關係。老師有權去控制學習內容，亦有權控制學生的「學習成果」（成績），學生所處的位置被動而且失卻了參與的空間。香港和傳統的華人地區亦是以「灌輸」為主要教學模式，根本就是習以為常，學生只能吸收，而沒有參與和思考的空間。此其實反映了社會和所謂的成年人不相信學生的能力，不相信學生可以思考和自主，仍是不斷施加控制。

反對壓迫和控制不代表不尊師重道，尊重其實是基於平等和接納，共同參與，關係平等，同樣可以互相尊重。筆者相信，學生絕對有能力去參與，在學習過程中，可以更主動而不是只處於被動位置，這個觀點在下文再加詳述。

價值單一的問題

價值單一，其實失卻了多元性（plurality）。多元性重要的地方，在於容許不同的價值、思想並存而不排斥。可能有人會認為賺錢是重要的人生價值，也可能有人會認為自由、民主、公義是重要的價值；有人會認為同性戀是有問題的，也有人認為沒有問題。這就是並存而不排斥，社會上有不同種類的思想是十分正常的，不應由某種價值或思想壟斷社會，同時間不同價值應互相尊重。互相尊重的前提是不能有前設，假定甚麼事比較重要，也不能刻意關掉非主流的聲音。香港講求「盲目的社會穩定」，不容多元聲音，不容批判思考，渴望社會進步的聲音被關掉了。

說實在，筆者不是反對人的欲望和賺錢意欲，但當資本主義的霸權令社會價值變得單一，在不同層面下滲入，其目的就是摒棄阻礙資本主

義的東西，並將之邊緣化。藉着精英教育、國民教育、揚善隱惡等等過程，使得學生不再有批判思考，不再擁有理想，只淪為資本主義下的一枚齒輪。

除了被價值單一化和價值壟斷外，「價值中立」也是一個荒謬的字眼。教育其實不能脫離社會和政治，因為教育從一開始就有令社會進步的理想。當「學者」、「教育高層」以「價值中立」為由不作道德判斷，越着迹去劃界，就越顯得假清高，因為道德底線其實沒有所謂中立，一些普世價值是必須持守的；而且，有些時候教育更應容許討論、辯論，各自以自己所相信的一套去互相交流，才是更應該做到的事情。

教育應有的社會理想

近年來香港、中國內地以至世界各地的大學，越來越變得職業、經濟導向，鼓吹功利主義，追求資金營運大學，追求大學世界排名等市場化風氣越加嚴重。資源和學生偏重於商業學科和「職業學科」，對大學生作為社會公民的培養、人文精神和內涵提升等越來越缺乏。再者大學變得小學式（上文已解釋），課程也由官方、教師所主導，學生沒有參與。其實很多現代的大學，甚至整體的教育，大多只在教授「知識」，

而不是教育「思考」，沒錯可能很多學生在不同地方也獲得很多成就，擁有一張漂亮的履歷表，但就是沒有真正的思考能力。

筆者認為大學，是社會和社區的縮影，理應是師生共治、有更平等的關係，也透過師生共治、學生自主，使大學教育更能全面地培育社會公民。學生更應在獲取社會大量資源後，回饋和貢獻社會，讓社會更公平一點。

現代社會已出現很多不同方面的問題：經濟不公義導致貧富懸殊；環境問題令全球暖化；政治不公平引起價值衝擊等危機，因此教育更負有很重要的責任——培育具反思能力的人和培育公義、憐憫和謙卑的領袖，讓社會更美好一點。

教育是充權的過程

教育其實是知識創造的過程，每人也是知識生產者，不只是教師、學者，甚至學生、社會上每一個人，包括工人、貧窮人、長者、殘疾人士也是知識創造者。參與式學習和對話式學習，是重要和進步的教育理念。

打破以往自上而下的教育關係，進步的學習應是以平等的關係進

行，教師是「啟蒙者」的角色，而不是單純的「灌輸」。啟蒙學生的思考，提供必要的資料、理論，繼而進入對話和辯論的過程。這些對話，是基於對社會事實（social facts）的理解和切入，同一個社會現象也可以有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意識形態，學生和教師可以有一個思辯的過程。

參與式學習和參與式民主的精神是相近的，強調沒有權威的介入，因為每個人也是專家，每個人也是平等參與。無疑有些人會擁有更多「學識」，但不等於他們比別人有更多「智慧」。因為每個人也有自己的獨特經驗和生活智慧，每個人的認知、理解和分析也有自己的一套，再者就是有這個平等的討論關係才能創造更多知識。

對人性的追求是這種進步教學的重要價值和理想。此追求是基於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和接納，欣賞和相信每一個人的能力和優勝的地方。更具人性的是，教育能使人對自身及社會的能力感和掌握力也有所提升，不再只是處於社會的被動的人，而是可以有能力影響社會的主體。這就是教育充權的過程。

青年的社會參與，是重要的教育和充權，思辯和行動應該結合起來才能推動思想的學習。社會參與，不只是流於表面的「其他學習經歷」，而應是深層的對社會的認識和關懷：如真正進入貧窮人和基層工人的生

活，了解並關懷他們的故事，也要深刻反思社會的貧窮狀況和解決方向；如真正接觸和了解性小眾、新來港人士面對的處境，而不是流於表面，只以傳媒或坊間資訊去評價他們；如參與更多學生自務運動，對學生自主有更多直接的體會；如與邊緣群體一同交流學習，共同創造知識……

也希望從中達至意識覺醒，對自由、公義、民主的最基本道德價值，有重要和深刻反思，繼而進行適切的實踐，讓社會更能進步。

教育的未來

的確，在這個冷漠、金錢至上的社會中，要去處理這些教育理想，好像有點不切實際，但我認為，至少這是我所相信的事、我所堅持的事；我也相信教育應當如此。在這數年社會運動的逐步建立，開始思考社會該當如何發展，為社會帶來了新的思想和觀念，希望這個方向慢慢與教育融合，讓學生能夠建立起真正的批判思考，參與社會，讓社會真的進步向前。

不可思議的廿一年
——遙遙無期的教學專業議會

施安娜（中學教師）

1986 年，六十三個教育團體組成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籌備委員會（下稱守則籌委會），1990 年 10 月，《香港教育專業守則（修訂本）》正式發給所有教育工作者，當時守則籌委會認為「只有守則而沒有執行機構是不可思議的」，並且建議立法成立「教師公會」，然而這種不可思議的狀況已足足維持了二十一年，香港的教師公會還未見蹤影。

尊重教學專業才是敬師

如果醫生是一個像教師的專業，外科醫生會被國家立法機關告知允許進行手術的時間；醫院行政人員會建議手術器械；病人的朋友會環繞在手術室的四周提供未經請求的建議，那些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從以前的手術獲得的資訊。

這是 1973 年 Myers 談教師力量時的比喻，意在指出教師需要自主權，正如所有專業人員有權管轄自己的事（Myers，2007），而不是由旁人在指指點點。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 2010 年 9 月 14 日在「向老師致敬 2011 ——敬

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上，讚揚教師的努力與承擔，並為學生付出無比的愛心與熱誠，他指出香港的學生亦在多項國際評估計劃中，表現超卓，「這些成果肯定了香港教育發展的方向，更證明我們擁有的是一支優秀而專業的教師團隊。」(1) 諷刺的是，2011 年 9 月新學年伊始，出現了不同教育團體的調查，指出教師面對種種壓力。教聯提出的是七成半受訪中、小學教師認為應增加人手，促請當局盡快落實「一校一行政主任」，以減少教師課節。香港小童群益會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一項調查發現，七成教師的壓力指數處於「高壓」水平，兩會指若不妥善處理此現象，將直接影響教師的健康及教育的發展。教育局對此種現象，有何回應呢？孫明揚在新聞稿中提出「尊師重道」是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即使古今為敬師而設的慶典形式有所不同，意義其實不變，都是為了彰顯教師育德樹人的成就。世界各地都有不同國家地區為教師行業設立教師節，可見教師的成就與貢獻普遍獲得認同和欣賞。(2) 口惠而實不至，光在敬師日上說我們有一支優秀的專業教師團隊，只是何謂專業團隊，若只是任勞任怨，對於不合理的情況只能委屈接受，這是專業嗎？教師的自主權在哪裏？談世界各地設立教師節，卻不談世界各國的教師組織，沒談一再拖延成立教學專業議會，這是敬師嗎？曾榮光早在

1990 年提出教師專業化，指出根據世界各國教師組織的發展經驗來看，一個有代表性及有實權的教師組織，是達致在重要教育決策中應有的參與權，可致力使同僚支配成為學校行政架構內的重要、甚至主要的支配形式。(3)

在英國的教學專業議會籌備時期，當時的工會領袖 Peter Smith 提出工會不可能合一，這是因着工會的不同文化，因應傳統、政策等，他指出若有一個組織代表校長教師，可讓整個行業獲益，這正是成立教學專業議會，而重建業界與政府的合作，責任主要在政府，這意味着政府願意分享權力、分擔責任 (4)，由此可見，香港政府的一再拖延，是一種分而治之的策略，是一種把權力視作比教學專業更重要的短視行為。

自 1982 年一個國際顧問團在「香港教育透視」報告書中建議成立一個「香港教師組織」，藉以提高教師的專業地位，至今幾近三十年了，根據教統會《第七號報告書》的建議，本港將在 1999 年成立教學專業議會，可是如今已是 2012 年了，雖然董建華政府的第二份《施政報告》，於 1998 年已撥款二千萬元，作為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經費，教育統籌委員會更於 1998 年 11 月就「成立教學專業議會諮詢文件」進行諮詢，可是只聞樓梯響，屬於教學專業的「教學專業議會」至今還是付諸闕如。(5)

1984 年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一號報告書》不贊成設立教師組織，

但建議編纂一份教學專業的「守則」，從而提高專業意識。1986 年，六十三個教育團體組成一個籌備委員會，負責草擬香港教育工作者專業守則，守則的初版於 1989 年 10 月面世，守則籌委會在參考所收集的意見後，作出修訂，《香港教育專業守則（修訂本）》於 1990 年 10 月正式發給所有教育工作者。守則籌委會認為，在擬定守則的同時，必須對守則的執行方法提出建議，指出「海外考察及本地諮詢均肯定地顯示，只有守則而沒有執行機構是不可思議的」，並且建議立法成立「教師公會」，作為教師的專業組織，負責執行守則，維持專業紀律。守則籌委會並對教師公會的特點、職能、成員提出建議，還建議分三階段開展教師公會的籌備工作，並在 1991 年邀請所有教育團體，選出工作小組，名為「香港教師公會籌備小組」（下稱籌備小組），建議了措施以逐步開展教師公會的籌備工作。1992 年守則籌委會與籌備小組向教育統籌委員會遞交了聯合意見書，提出成立教師公會的大綱。

教育統籌委員會未有接納守則籌委會的建議，改而在 1992 年的《第五號報告書》建議設立一個非法定的「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下稱操守議會），負責就如何提高教育專業操守向政府提供意見；擬訂應用準則，以界定教育工作者應有的操守，以及透過諮詢，使這套準則得到

各個教育界別廣泛接受；根據上述準則，就涉及教育工作者的糾紛或指稱行為失當個案，向教育署署長提供意見。至於可否設立法定的專業管理組織問題，則留待數年後再作檢討。從操守議會的職責可見，它是一個管束性的機構，重點在約束教師行業的行為，而不是一個發展性的機構(6)，勉強談得上與發展有關的是在於「就如何提高教育專業操守向政府提供意見」，畢竟所謂提高專業操守，並不只是規管，可是觀乎操守議會十七年來的工作，在發展方面並沒有顯著的成果，(7)甚至因着建立這方面的工作而受到阻撓，這在下文有進一步的分析。教育界要求的是有自我規管權力的教師專業組織，以確認教師的專業地位，和提高教育質素。港英時期，政府不肯分權可以理解，那畢竟是個殖民地政府，然而標榜為教師拆牆鬆綁、提倡教師專業的特區政府，雖然曾一度有意推行教學專業議會，如今卻改變政策，決不是一句為了要應付教改、或是「教師對諮詢反應冷淡」便能含混過去的。

目前教育界流傳的教育人員專業守則，是操守議會 1995 年 10 月的抽印版，雖然仍有提及當時守則籌委會建議成立教師公會，但細節不見了，當中略去了「只有守則沒執行機構是不可思議」的說法，也沒有了一些關於教師公會的構想，1990 年版本守則的第四章是建議執行方法，

指出根據收回的意見，獲最多支持的是設立教師公會形式的專業組織，且在諮詢本港其他專業組織時發現，各專業的典型做法，是由專業團體的有關機構負責執行專業，這些細節其實是重要的。可是目前的操守議會在其成立的背景簡介中指出守則籌委會認為，在擬定守則的同時，必須對守則的執行方法提出建議，並且建議立法成立「教師公會」，當中的具體數據、方式沒有了。操守議會談及其職權範圍，指出「研究了90年公佈的守則，認為在缺乏具體案例作為基礎的情況下，沒有可能擬訂應用準則，只能擬訂一套原則性的條文。」又認為「90年公佈的守則已是一套原則性條文的最佳藍本，而且經過了廣泛諮詢，得到了教育界廣泛的接受，在付諸實踐前，實難予以修改。因此，操守議會決定以90年守則作為執行工作的基本依據。」在1995年抽印本只印行守則第二、三兩章全文，把第四章完全刪去了，也即是刪除關於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資料[8]。更諷刺的是，1990年公佈的「原則性條文」，到了2012年的今天，仍沒有寸進，還沒有應用準則，這是整整的二十一年，可真的是不可思議。

當教育當局一再以業界未有共識、成立教學專業議會是政府的職責為由，拖延、阻撓推動成立教學專業議會，其實是昧於歷史的。正如籌

委會指出其職權範圍，並不包括組織教師公會，但籌委會認為有責任，把其在海外考察與諮詢活動中形成有關教師公會的若干設想向教育專業人士說明，且應建立一個架構，以便日後促成教師公會的籌備工作，明白如果不為教師公會的建立鋪平道路，將被視為不負責任。可是，2012年的今天，操守議會的「教學專業議會籌備委員會」雖然開宗明義指出功能在於推動成立「教學專業議會」(GTC)、制訂「教學專業議會」章程、研究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立法程序及聯繫業界謀求共識，這其實是秉承前人的工作，卻受到諸般阻撓(9)，當局以所謂的「業界對於成立『教學專業議會』有不同的聲音」，一再拖延，是無視以下的事實：1990年的守則是「經過了廣泛諮詢，得到了教育界廣泛的接受」（當中包括第四章談及的成立GTC）；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第二份《施政報告》，於1998年已撥款二千萬元，作為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經費；教育統籌委員會於1998年11月就「成立教學專業議會諮詢文件」進行諮詢，只是政府一直沒有向業界公佈諮詢結果；2001年11月，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進行意見調查，對象包括當時在香港各中、小、幼、特學校任教的全體教師及校長，回收問卷超過三萬五千七百份，是全體在職教師的百分之六十四。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的回應者認為應該馬上成立教學

專業議會。

關於何謂專業的文獻很多(10)，除了需要專業知識之外，其中不少談及參與者的氣節（integrity）和有一個自己的組織，有其行為與操守的守則。然而教育當局並無意設立一個屬於教師自己的專業組織。操守議會的成立，只是把專業等同於行為上的管束，而且是「無牙老虎」，離專業組織很遠，且非獨立自主；教師公會不只是一個管束性的機構，更是一個發展性的機構，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提供優質教育。提供優質教育，正如 Tomlinson（1995）(11) 所說，最有保障的是行內自覺，因為沒有人比行內更清楚怎樣才是最高的標準，市場和控管，無論單獨或並舉都不能保證教育質素的提升，教師在營建教育質素方面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因而提出成立教學專業議會，認為此乃教育專業不可或缺的，也可提高教師在社會中的地位。正如香港的選校問題，家長的選擇成了決定學校存亡的關鍵，正在於讓市場與家長選擇成了學校成敗的標準，教育專業的聲音未能彰顯。觀乎香港的教改以來，所謂拆牆鬆綁只是口號，表面談的是下放權力，可是間接的控制未曾鬆懈，教師的工作環境每況愈下，教師士氣低落，加上適齡學童人口的減少，引致惡性競爭，縮班殺校的危機下，更被迫不務正業，凡此種種，乃教育界的窘困，專業在哪裏？

誠然，如果當局認為教師對於教育成果影響重大，更應想方設法支持教師的學習和提升其教學質素，而不只是強調操守上的規管。操守議會 2001 年的全民意向調查中，最多教師同意確認專業議會的最終目的是為改善教育質素，而非為職業群體的私利；其次為同意成立專業議會，是為了實現教育專業自主，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教師肯定這兩項命題。此外，亦有超過百分之八十五的教師贊成立刻成立專業議會，並贊同即使政府未有行動，教育界也應自行籌組成立專業議會。（《教師專業意見研究報告書》，2002）(12) 由此可見，十年前業界已有共識，教統會於 1992 年的《第五號報告書》提及於數年後檢討可否設立一個法定的專業管理組織，轉眼已是 2012 年，1990 年的守則到 2002 年的調查結果，然而政府當局卻一再拖延，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說法，當局的重複與反覆，只是在消耗教育界的精力，浪費教育界的光陰，如今聲稱收集業界的聲音，又一次的重頭開始，究竟香港的教育還要等多少個十年？

守則籌委會在 1990 年已提出了民主程序，曾蔭權在任期間漠視民主，由拖延成立教育專業議會可見一斑。人走茶涼，曾蔭權政府把董建華時期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政策擱置一旁，如今曾蔭權政府的期限將至，下一屆的政府又會怎樣對待呢？

註釋：

(1) 《教育局局長在敬師日慶典表揚老師》，2011 年 9 月 14 日發表，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9/14/P201109120081.htm，2011 年 9 月 18 日下載。

(2) 《「向老師致敬 2011 ——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致辭全文》，2011 年 9 月 14 日發表，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133&langno=2&UID=104585，2011 年 9 月 18 日下載。

(3) 有關教師專業化的分析，可參考曾榮光（1998）和余惠冰（2001）的文章。

(4) Smith, P.（1995）.Teachers Unions and a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5) 施安娜（2011）。《教學專業議會與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何干？》，《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通訊》，第 26 期，頁 5-16。http://cpc.edb.org.hk/Chinese/download/Newsletter26.pdf，2011 年 9 月 18 日下載。

(6) 這裏可參考英國和蘇格蘭的教學專業議會，兩個議會除了有關規管的工作，更有研究及調查，用作推行教學專業議會工作的根據，也

作為向教育提供政策方面意見來源。

(7) 第六屆操守議會主席潘天賜在議會通訊中指出：五屆十年的議會委員，均以促成「教學專業議會」作為提高教育專業人員操守的主要目標，並且做了大量工作，……議會前期的工作，成功促使行政長官把成立「教學專業議會」列入了1997年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作為教育施政的主要目標之一，並且訂明於兩年內完成。在議會的持續關注和推動下，教育統籌委員會於1998年末發表了成立「教學專業議會」諮詢文件，事後教育統籌局卻以「教師對諮詢反應冷淡」為由，把成立工作無限期地擱置了。

(8) 當中提及操守議會決定重新印行守則第二、三兩章全文，以期現職教師均能人手一份，藉以提高業內人士的專業操守。其中的註四如下：教育工作者專業守則籌備委員會編訂之《香港教育專業守則》（1990年10月）全書共四章，第一章為序言，第二章為守則，第三章為權利，第四章為建議執行辦法。

(9) 詳情可看施安娜（2011）。《教學專業議會與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何干？》，《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通訊》，第26期，頁5-16。http://cpc.edb.org.hk/Chinese/download/Newsletter26.pdf

(10) 可參考曾榮光《香港教育政策分析：社會學的視域》第七章《建構一個專業的教育工作環境》、John Tomlins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the role of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s"。

(11) Tomlinson 在文中分析英國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重要性，認為此乃教育專業不可或缺的，Barber 的 Reconstructing the Profession 也有相類的說法。

(12) 該研究是對全港教師社群進行全民意向調查，並未作任何抽樣，問卷的回收率達百分之六十七，結果足以代表香港教師全民意。http://cpc.edb.org.hk/Chinese/download/teacher-survey/yureport.htm

參考資料：

(1) 教育工作者專業守則籌備委員會（1990），《香港教育專業守則》。香港：教育工作者專業守則籌備委員會。

(2)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2002），《教師專業意見研究報告書》，http://cpc.edb.org.hk/Chinese/download/consultation_paper__Chinese_.pdf。

3 施安娜（2011），《教學專業議會與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何干？》，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通訊》，第 26 期，頁 5-16。http://cpc.edb.org.hk/Chinese/download/newsletter15.pdf。

(4) 曾榮光（1998），《香港教育政策分析：社會學的視域》。香港：三聯書店。

(5) 余惠冰（2000），《香港教師公會的政策議論》。未刊印博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

(6) Donald A. Myers（2007）. Teacher Power Revisited. *The Clearing House: 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ssues and Ideas, May 2007, p239-242.

(7) Smith, Peter（1995）. Teachers Unions and a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 Mar 1995, Vol. 21 Issue 1, p55-58.

(8) John Tomlinson（1995）.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the role of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 Mar 1995, Vol. 21 Issue 1, p59-68.

(9)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ttp://www.gtce.org.uk/research/commissioned_research/teacher_survey/

(10) The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for Scotland, http://www.gtcs.org.uk/professional-development/research.aspx

通識教育之真與偽

陳志宏（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導師）

十餘年來每每大破大立的教育政策大裝修，早已讓教師、家長和學生都厭倦。上一次教改的餘波未了，新一波就會換個名字又再出現。「資源增值」、「母語教學」未敢遺忘，「三三四」如箭在弦，又有「國民教育」隨時候命，同場上映還有正冷飯炒作得熱絡的「通識教育」。

常說香港的教育政策就像是老牛腩麵店的陳年腩汁，幾度由行外人接手之後已被弄得色香味全無，苦了的是老夥計和老街坊。有關細數十餘年來香港教育政策的得失早有鴻文，暫不於此另詳。接下來要談的，是那個被翻炒得五花八門、真偽難辨的「通識」。

哪裏跑來的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本是大學教育之中的專有名詞，其意涵可有兩種層次。第一種是由古希臘博雅教育精神傳承而來，一種能給予人有教養、邏輯思維，對修辭、幾何，甚至天文都有所涉獵的教育。可以說，在歐洲中世紀以前，給予上層精英的教育仍未高度專業化的時候，這種既博且雅的教育就是高等教育的全部，只是後來隨着歐洲政教分離，及科學的出現，將大學的教育內容顛覆了。

到 20 世紀中期，自科學發展日漸滲透生活每一角落，在高等學府之中亦奠定了地位。在大學學問專業如雨後春筍的產生、大學教育走向了專業化道路的同時，整個世界慢慢出現了人文與科學兩種文化互不對話的局面。大學在追求日新月異學問的同時，卻漸漸遺失了追求知識、互通廣博的目標。大家也就意識到，一種能讓人貫通古今、橫跨學問的教育乃是必須。通識教育從此再被提上日程，並被多賦予了一種橫跨各個知識領域的意涵。

而這又跟香港所見的通識教育有何干？過往的香港在發展通識教育方面其實也沒有落後於形勢，就在香港仍只有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的年代，兩所大學在實現通識教育上就展現出兩種不同的特色。

港大繼承了英式大學教育的傳統，一個學生在教養、思辨、言詞及知識廣度的培養，都融入在整個校園文化之中，較少有形的通識教育課堂存在。這種無形的教育，也一度是英式大學引以為傲的地方。時至今日，港大的通識教育，仍保留着以氣息來薰陶學生的方法。

而中大則走上另一條路。由於中大立校之時是由三所書院或學院所組成，中大通識教育也就從各個書院的傳統開始，走上揉合儒家文化及美式通識教育的獨特之路。系統式的通識教育課程早在中大立校之初就

建立，除了有必修課的部份以供教育學生個人之修養與基礎寫作思辨能力之外，也有一個豐富的選修課程部份以拓展學生在新時代各個知識領域的視野。在這制度之下，學生約有六分之一的學分會用以接受通識教育課程，此等比重在今日香港的大學之間亦算數一數二。

還原通識

無論是以校園氣息薰陶個人修養，或是以系統的修課辦法去實現通識教育，其目標都是要成全學生的獨立思考及獨立的價值觀。成全的手段絕不能靠由上而下的灌輸，而是透過教師授予學生基本的表達方法及思考方法，讓學生擁有這些能力去表達思想。所以，在通識教育之中，學生坐着接受課堂並不是常態，更多的修成是在思考通悟的過程所得。這種過程或快或慢，因人而異。通悟越多，腦袋就能發揮最大的效能去承載最多的知識。一個擁有良好通識修成的人，就大概如古希臘的精英一樣，可以對不同學問的現象以簡單的道理去貫通。知識的結構在這些人的腦中，並不是以圖書館式的分類存在，而是一個多維度的知識的網。一個只接收而不通悟的人，其知識只會停留在資訊和常識的階段，不會到達通識的層次。所以，若光以字面去了解通識，就會很容易誤以

為「通識」就只是「通通識」，從而忽略了「通識」之中「貫通」的意義。

此外，既然通識教育追求的是一個知識點與另一個知識點的貫通，那就不難了解在實行通識教育之前，學生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常識，及一個能夠邏輯辯證的心智，所以常識是基本功，思考方法是招式，通識之網是思維上的修成。這條道路沒有捷徑，除非有人有能力用生物方法讓一個人的智力發展提早成熟。

見到近年市面上對通識定義的搬弄，從玩樂旅遊到金融衍生工具價格走勢都攀上了通識，新高中通識教育成效未現之時已產生一批通識補習專家，如此亂像不禁讓人搖頭嘆息。當下所見到香港通識教育的形勢跟原來的通識是否仍一致？中間到底經歷了一個甚麼的過程，讓原來屬於大學殿堂之中的教育理念走到中學甚至小學？而在實行這一步的時候我們的反省又是否足夠？

甚麼出了錯？

讓我們先檢視大學的層面，再到中學及小學的所謂「通識」，繼而到「通識」在香港社會的風潮。

在 2000 年之前的日子裏，香港各個大學的通識教育發展受資源所

限。上世紀90年代大學學制四改三，更使通識教育的發展空間被扼殺。但總體而言，各大學都在相近的通識教育目標中各適其適。若以此角度來看，當下實行的大學三改四該會是大力發展通識教育的契機。目前所見，香港各大學都增加了對通識教育的投入，擴充通識課程來迎接大學回歸四年制。

通識教育蘊含了人文精神的教育，所以一所大學本身的定位與立校的傳統都會影響其通識教育的內容取向。對於一些綜合型的大學，尤其是較有歷史的那幾所，要讓其通識教育精神與立校的傳統呼應並不困難，然而對於側重科學教育及應用技術的大學，建立通識教育就幾乎是由零做起的任務，這給予了他們額外的困難。可以預期各大學的通識教育將出現不小的差異，只要明白到他們的通識教育理念與資源分配，不難預計其質素。

那麼，若在資源充足、理念清晰的條件下，是否就容許我們對現今大學的通識教育樂觀？我們的大學管理制度又是否能將其理念實現？面對着日益商業化的大學教育，我們不難看出現在的大學通識教育已受制於市場的需求，自由放任的結果是鼓勵了知識性低的通識科目大量開立。一些沒有傳統包袱的大學，可以放任將通識教育的原有內容掏空，

填上能讓自己獲得更大資源的內容。一些職業導向、教導社交應酬技巧的課程也被放入通識教育的範圍內。一些用以把關的原則，如知性培育、人格培育可能拋在腦後，於是我們會見到紅酒品嘗、大學生理財課程等等名目都可以借通識之名在大學大賣。真正堅持理念的課程則被冷落，甚至在選課市場的規則中急急被淘汰。

商業價值與人文價值可以非常迥異，在經營一所大學時兩者的矛盾就更是明顯，若遇着大學管理人員偏重前者而忽視後者，那可以是一所大學的災難。大學通識之沉淪的一個體現，就是以「常識」當作「通識」去賣，隨意投消費者的意志所好，而當消費者也不在意這個問題，但求學校的名氣撈個畢業就行的話，這就會是整個大學教育的沉淪。

還有更多的影響

大學通識教育正面對大學商業化的壓力，艱難的發育之中，我們仍懇切地期待香港可以孕育出一個獨特的通識教育論述，好讓香港的大學教育可以在亞洲獨當一面。這個過程不需要、也千萬不要用甚麼行政力量去導引，因為人文學術的成果都不是由權力就可導引出來的。

可是，以教育當局主導的一套通識教育卻在中學出現了，在 2002

年起教育當局就着手準備中學通識教育，這可算是創國際的先河。中學通識課程的目標，是從大學通識之中化約出來。舉例來說，大學通識期望學生能夠綜合各種立場、獨立的批判思考，這在中學通識就被化約成「了解不同的立場」；在大學通識之中又會希望學生能了解自身及其他的文化，這在中學通識就被換成「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及對其他文化的認識」。還望大眾好好細讀這兩種通識的差異，以及大學通識被化約的過程。在文字上的差異可以不大，但在教育當局可以由上而下操作課程的情況下，中學通識就可以成為干預學校課程的有力工具。

從根本的結構來看，若果大家同意本文前半段有關「通識」是該以貫通各個知識點的解讀的話，那就不難看出教育當局化約通識理念的荒謬之處。

「通識之網」的最基本單元，至少是要兩個知識點加上一條連結的線。若果只有點而沒有線，「通識」就退回「常識」；獨立批判思考就退化成冷眼旁觀各打五十大板；溝通兩種文化就退化成擁抱自身文化。所以說，化約大學通識的結果，就是歪曲通識教育的理念，而這種謬誤，已成既定事實，只是在大眾對通識的定義乃至成效仍未清楚之時，鮮有人會去質疑問題的根源。

到中學通識的實施方面，就有更多讓人置疑之處，如果中學通識是要學生表達自己的價值觀，那麼一個人的價值觀又何以被量化評分？又如果價值觀是不被評核，只有行文與論證方式才被評核的話，那這些都不是已經可以透過語文科之中的議論文考核就可實現，又何以需要另設中學通識教育科？

在國際之間鮮見有中學階段的獨立通識科目，在大學就更加不可能是這個形式。中學通識在授課時的必然結果，就是一大班同學在茫茫參考資料之中，只會願意接觸由老師提供的資料，而與此同時，老師的選材，在茫茫書海之中，也只可以有時間接觸到教育當局所選擇的資料，一條由教育當局直接連繫學生思想價值觀的路線也就接通，而學生通往思想自由之路則是更加荊棘滿途，比過往學生在課餘主動接觸其他知識的可能性降至更低，時間都將要更多的花在教育當局提供的參考資料之上。

這種繃緊的局面再讓補習界獲得商機，補習文化繼續傳承到新高中通識科，通識天王已經應市，而跟通識教育科評分有關的學校外展活動，也變得非常蓬勃。遊學團、交流營辦個不停，家長對此唯有硬着的投入更多資源給子女，最後又苦了誰？

結語

通識教育並非甚麼新事物，也不可以從現代社會的需要去任意定義。可憑恃的只有那些歷久常新的經典問題，以及一套理性的思考方法去繼續融會當代世界的新價值觀。當下所面對的問題，就是對通識教育的任意解讀、任意化約，以及任意迎合商業社會需要所造成的局面，其結果必然是模糊了年青求學的一輩的求知路向。但願大家不要忘記通識教育之中，成全人格、貫通知識的大目標。年輕的學子們，也希望你們能看透並原諒你們的教育者仍有不足，只要忠於自己的興趣，不怕某些學問的艱難，要提升自己的智慧仍是你們手中可以掌握的範圍。

大學的生招牌與搖錢樹

張文光（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前會長）

從來沒有想過，政府資助大學的生招牌竟然成搖錢樹；從來沒有想過，資助大學的自負盈虧課程，竟藉學生借來的貸款轉化為滾滾財源。

大學近年積極開源，透過開辦自資課程，為院校帶來可觀的進帳。院校過去一年的「業績」，無論投資回報或盈利增長，均跑贏大市，比不少壟斷企業更賺錢。

外界一直盛傳，八間資助大學「私設金庫」，前教資會主席查史美倫透露：近年收到不少投訴，大學上課時突然多了一半的自資課程學生，擔心影響教學質素。她在離職前說：任內最後任務之一，就是處理八間大學開辦自資課程引起的帳目混亂，促請大學公開「私設金庫」的詳情。

我曾在立法會追問大學金庫的數額，政府被迫揭示 2010/11 學年的「業績」，八間大學單是自資課程的學費已接近五十億，總盈利接近十億，當中以港大和理大的收入最豐厚。早前被學生投訴的城大，盈利竟高達二億二千五百萬，其回報率接近24%，連不少大財團及壟斷企業，包括牟取暴利的兩電也望塵莫及。

其實，八間大學的實際收入可能不止五十億，部份兼讀課程的學費、「招標課程」、「不頒授資歷課程」和顧問工作等收入，還未完全

反映出來。對於自資課程近年大展鴻圖，向來甚少過問校政的教資會，開始流露不滿的聲音：「現時絕大多數的自資課程，實際上由與資助院校有密切或間接關係的社區學院或院校本身的自資部門開辦。所有自資課程中，約 80% 由公帑資助院校的附屬機構或部門開辦。這種情況在其他地區十分罕見，而且會有其他影響。」報告更特別提到，「各院校積極開辦自資研究院修課課程，進度令人印象深刻」。

教資會以「十分罕見」和「印象深刻」來形容自資課程的過度擴張，實在可圈可點。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有資助院校背景的自資課程，不用接受學術評審局的評審，不屬教資會的監察範圍，不一定要遵從母校嚴格的學術把關和申訴程序，形成一個「三不管」的缺口。

這些自資課程，以八間資助大學作招徠，由副學士、學士到修課式碩士，五花八門，各出奇謀，爭奪市場。由於十年經濟衰退，年青人要提升學歷，才可獲得僱主聘用，自資課程適逢其會，學生人數和學費收入，讓大學賺得盆滿缽滿。與此同時，涉及自資課程的投訴也愈來愈多，例如：但求開班賺錢，課程對學員的要求愈來愈寬鬆；推行大班教學，師生比例高達 1：100；為了降低成本，以低薪聘用外判兼職教學人員；為遷就國內生，課程強行改用普通話教學等。利字當頭，辦學理念和教

育原則彷彿已愈來愈迷失。

院校擴充自資學額的誇張程度，連教資會也看不過眼。前主席查史美倫接受《明報》專訪時，直指「自資課程收入由主辦部門保留，形成『小金庫』，有利用公帑賺錢之嫌，有院校的自資課程好賺錢，結果部門連課程收益都不上繳大學中央，做法不能接受」。

大學的盈利表現，既顯示大學自資課程生財有道，也反映教育市場的龐大潛力，不論學生的升學需求，或是職場的增值需要，自資課程確有一定的「市場」和「價值」。然而，大學在生財之餘，也必須取之有道，正如財團企業，也不能埋沒社會責任和良心。

當中，自資碩士生多在職人士，他們的負擔能力較高，所需的服務支援較少，多收碩士生更有助提高國際排名，院校自然懂得「投資」。此外，增加自資學位課程，可掩飾教育局長年沒有增加資助學位的「罪孽」，教育局因而不斷注資，向院校提供免息貸款，擴大自資學位市場。而受害最深的是副學士，無論供求還是質素，無論升學還是就業，副學士都是「市場失效」的最佳例證。

當前，副學位學生升大學的機會有如超級樽頸。08/09 學年，共有近 2 萬名副學位畢業生，當中能夠銜接資助高年級學位的只得

一千八百八十四人。即使政府承諾，將高年級銜接學額倍增至每年四千個，但樽頸仍是樽頸，學生升學前無去路，畢業卻是一身債務，苦不堪言。

為今之計，政府必須擴大和打通畢業生的升學銜接渠道，一是全面增加資助大學銜接學額；二是提供額外資助或大學學券，讓符合大學收生資格的學生，在本地或海外升讀具質素的自資學位課程。

此外，還要減輕學生的債務負擔。政府當年削減大學資助，將資助撥款變成學生貸款，再將貸款變成高息貸款，讓學生成為董建華六成大專生神話犧牲品。儘管政府已建議取消免入息審查貸款的風險利率，但畢業生收入不高，還款壓力依然沉重。因此，政府必須同時取消在學期間計算利息，特別是全日制學生，在學期間根本沒有收入；更何況，政府向院校提供的建校貸款也是免息的，為何對待學生卻要斤斤計較收取利息？

當政府撤銷風險利率後，還款利率即降至 1.674%，然而，經入息審查而獲批貸款的學生，仍要繳付 2.5% 的利息。這項自 1987 年將息率訂於 2.5% 的所謂低息貸款，經已名不副實，特別是低息貸款，原是為清貧學生而設，需要通過入息與資產審查，為何利息反而更高？

院校收取的學費也愈來愈高，賺錢愈來愈狼，學生不斷借錢兼付利息交學費，以為課程「自負盈虧」，學位「收回成本」，誰料大學竟「牟取暴利」，一年從中賺去十億，都是學生借來的錢，大學的道德何在？

大學享有自行評審資格，課程不受外界監管，大學的「金漆招牌」，它所頒授的資歷，向來是質素和信心的保證。對於八大自資課程的搖錢樹，藉剝削學生而累積的「大小金庫」，教資會不禁要過問，問公帑是否用得其所，院校是否「不務正業」，影響大學教學與自資學位的質素？公眾也擔心大學「變質」，自資課程長開長有，賺錢學位貨如輪轉，導致學歷的集體貶值。

大學以學術自主逃避監察，院校利用自資課程作搖錢樹，衝擊大學的「生招牌」，有損學位的公信力，而政府是自資課程的始作俑者，對大學牟取暴利，對學歷濫竽充數，竟然坐視不理，是繼副學士之後，上升至學士和碩士，再次自毀大學的長城，不負責任，愚不可及。

跨境學童是教育的未來炸彈

黃英琦（律師、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監）

問題才剛剛開始

跨境學童，是每天大清早從深圳過關到香港上學的孩子。2009 年，跨境學童（包括幼稚園及中小學生）有六千七百六十八人，2011 年已突破一萬大關，增幅最多的是幼稚園生，佔總學童人數的三分之一。跨境學童有不同類別，他們或是住在深圳的香港人子女；或是「單非」兒童，即父或母是內地人；或是「雙非」兒，父母皆不是香港永久居民。現時的跨境學童以港人子女或「單非」兒較多，但「雙非」學童已在上水一帶的學校出現。

大部份學童每天跨境上學的方法，是由專人帶領在羅湖過關後轉校車或港鐵到北區或元朗的學校；家境好一點的，有跨境褓姆車接送；而富裕的孩子就由兩地牌私家車送到學校門前。九龍塘有一所著名國際學校，每天下午時份，其校外和附近街道都停泊了不少裝有反光玻璃、擁有兩地牌的名貴房車，場面壯觀，這就是等富貴跨境學童下課的車隊了。

跨境學童在本年（2012 年）之前的情況不算太嚴重，學校還勉強可以容納。本學年的幼稚園 K1 生在 2008 年左右出生，那時仍不是內地

孕婦來港產子的高峰期。我估計三年後，即在 2014/15 的學年，跨境學童的數量會大增。有多少人？相信政府也難以準確估計，我們只確切知道 2011 年有差不多三萬六千個「雙非」或「單非」嬰兒在香港出生。三年後，他們和一些在深圳居住的港人子女都到了入讀幼稚園的年齡，如想盡早融入香港教育制度，家境也容許，他們一定會到香港讀幼稚園，之後升讀小學。只須十分一的父母有這樣的想法，到 2017 年，北區和元朗的小學就要增加約三千個小一學額。但這怎麼可能呢？假設每班人數三十名，兩區要共增設一百班小一。可是，北區和元朗的學校今年的小一學額已非常緊張和不足了，連本地家庭的派位也出了問題，較多小朋友未能如願進入心儀的學校就讀。

因此，跨境學童的問題，才剛剛開始，也是下任教育局長必須解決的問題。畢竟，我們都不會再對本屆（曾蔭權）政府有任何期望。

令人納悶的是，就算本屆政府決定提早「收爐」，教育局也不應令跨境學童問題更棘手吧。可是，保安局在 2011 年 9 月突然以路面車輛承受有限的理由減少簽發「禁區通行證」予跨境學童，令學校和家長非常不滿。有禁區紙的好處，是由專用通道過關，對學童的安全和準時到校有保障。禁區紙數量少，優先派發給幼稚園和初小生，年紀還小的高

小學生就要自己過關。在立法會，有議員就此作口頭質詢，獲孫明揚局長說以下的風涼話作回應：教育局的一貫政策，是「提醒及鼓勵有關家長應以『就近入學』的原則為子女選擇合適的學校，尤其是年紀較小的幼稚園及小學生。如其子女必須來港就學，家長應親自或安排成年人陪同子女過關上學……不應依賴禁區通行證的簽發」。

局長言下之意，是說家長強政府所難，是跨境有錯？難道跨境學童不是「香港的孩子」？我明白不少人希望取消「雙非」兒的居港權，但政策至今還未變更，在現行制度下，無論是在深圳居住的港人子女、單非兒或雙非兒，都是香港的孩子，有權在香港上學，家長也對他們能否在香港上學有合理的期望。

「跨境學童」現象是政策失誤

其實，有「跨境學童」這現象，本身已是政策的失誤。香港政府是內向型的，一方面說「融合」，另一方面卻不願意討論跨境議題，例如，在跨境學童以外，人口老化、長者的住屋和安老事務等，也必須從跨境的高度審視和研究。香港有不少老人家退休後在廣東省定居，但為了避免取消生果金資格，唯有數月回港一次，身體健康的當然無問題，但到

體弱時怎麼辦？這問題至 2011 年的《施政報告》才提出新措施，但新方案的申請看來仍要面對多重關卡。

內向型的政府也沒有為境外香港人服務的想像，政府的海外辦事處只是「經濟貿易辦事處」，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但近年的經貿辦要處理的問題已超越經濟貿易。2011 年日本大地震，東京的經貿辦就要負責把旅居日本的香港市民和學生以包機送回香港，當地人手不足，一支跨部門公務員隊伍要連夜啟程往東京作出支援。

教育局是「向內望」的表表者，沒考慮和設法支援住在香港「境外」人民的需要。大家看到香港有多所按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學制和課程教學的國際學校，就會明白這些國家擁有「跨境教育思維」。近一點，在上海和廣東省都有不少由台灣人設立的學校，「上海台商子女學校」及「華東台商子女學校」是兩個例子，學生用的是「銜接兩岸的教材」，並融入「上海特色的課程」，招收的是由幼稚園至高中、持有台灣戶籍證明的學生。

深圳現時也有六所民辦學校，以雙語授課並採用部份香港課本和課程，例如「深圳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是否應改名為「子女」了？）。該學校在 2001 年創辦，有約六百多名學生，八成為港人子女。不過，

這是社會人士明白問題的嚴重性而率先開辦的學校，與政府的整體教育規劃無關，學校也沒有取得香港政府的資助（唐英年仍是司長時曾到訪參觀，算是確認學校的存在價值）。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在 2010 年，被公司派駐內地工作的香港人有十七萬五千一百人，他們部份會攜眷同行，跨境工作已是許多人的選擇和工作的部份，住在境外的港人子女是香港的孩子；同樣來說，住在境外的香港長者，也是為這城市辛勞打拼一輩子的香港長者，教育資助和安老資助都不能欠缺對他們的安排。

若政府繼續視而不見，當住在廣東省的香港孩子回到香港升學時，教育局反而要為他們付出額外資源和作出特別安排，例如補習英語；老師也要思量如何面對能力差異大的「新來港」同學，把他們編在同一班會引起標籤效應，分散到不同課室又會令老師的教學增加難度，引起「本地」和「新來」之間的矛盾。

殺校潮窒礙了小學的靈活擴充

內向型思維不易改變，更可惜的是，面對六年後將會出現的大量跨境小一學童，靠近邊境的北區和元朗區，也因幾年前的殺校潮喪失了靈

活回應和擴充的能力。以量化主導的教育政策已把北區和元朗本來收生不足的村校殺掉，讓該區沒有能力在短期內提升學額，接收跨境學童。

「殺校」是教育局的惡行，殺校令教育政策更不得人心。技術官僚以成本量度公帑是否用得其所，一般官津小學的平均「人頭」成本是每年三萬多元，村校學生人數少，以每名學生計算的話，平均成本比市區高，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沒甚麼問題，但由 2002 年開始，教育局卻認為村校的單位成本太高，不符合成本效益，迫令近八十所村校結業，成千上萬市民失去了他們的母校和歷史。當年有校長絕食，有校友和家長遠道而來聲援，一幕又一幕的抗議和告別，未能打動只看數字的技術官僚。

殺校政策不僅影響已結束的學校，未被波及的村校也忐忑不安，老師放下教學本業，與校長自告奮勇過關到深圳的幼稚園派單張、辦講座。有校長憶述說，當年四處奔波，站在街頭推銷的情況，就像地產經紀，心裏不好受，但為了學校的前途，只好放下尊嚴，硬着頭皮推銷。收到跨境學童後，有老師要大清早到關口幫忙接送，更要為這些孩子調適課程，遷就上課時間，讓他們盡快融入香港的教育環境。

風水輪流轉，這些僅餘的村校今天非常受歡迎，被來自深圳的家長不停叩門，收生不僅絕無問題，學校已有人滿之患，但一百所村校只剩

下五分之一了，這廿所學校又能承受多少跨境學童？若當年教育局不是這般短視，看得見內地和香港的經濟互動如何影響教育政策，今天的情況就會不一樣。

那還有怎麼樣的辦法呢？教育局仍以拉上補下的掩眼法證明它在努力增加學額：其一是在幾所北區學校稍為增加小一班數，但每級多一班又如何？其二是向「鄰近校網借位」，協助跨境學童報讀他區的學校，但孩子過關後要乘車到大埔或屯門讀書，家長和孩子都辛苦，就與官員無關了；最後是考慮重開已關閉的村校。根據北區區議會文件，已關閉四年的石湖墟田料米業商會公立學校前校舍有十二個課室，關閉後校舍一直空置，冷氣機和設備仍可使用。有人建議重開，但談何容易！校長和老師已離開了，學校不只硬件，學校最重要的是有心的老師和承傳多年的文化。在一連串的殺校行動後，若村校重開，是引證了政策的荒謬、官員的笨拙，令人哭笑不得，也令人痛心。

他們一定會回來

現時居住在廣東省的香港孩子，一定會回香港上學，就算小學不回來，初中都會回來。父母都是香港人的學童，為的是銜接學制和期盼在

香港升讀大學；是「雙非」兒的，其父母大部份都要面對「超生」和違反生育計劃的罰款，孩子若在深圳讀書也得先付「借讀費」，動輒十數萬元。來香港讀書，交通費一千，書簿校服和午膳費等再一千，再加上補習和課外活動，大概每月只需三千元，很化算。

跨境學童有區域的局限，北區、元朗、大埔等社區將會承受最大的壓力，就算香港島的東區和南區有剩餘學額，也不能被「借用」，要跨境學童到南區上學？不可能的，除非是寄宿學校。

跨境學童需要的不僅是學額，還有配套的醫療和社工支援。新界的健康院、兒科病牀、社會福利署的家庭服務、學校社工等也要大幅增加。跨境學童也希望多閱讀，北區和元朗一定要加建公共圖書館和社區文化設施。今年是龍年，在香港出生的嬰兒將會破十萬大關，這是回歸後最厲害的嬰兒潮；換轉別的城市，政府或會認為這是人口的生力軍，能減輕人口老化帶來的社會負擔，在香港卻不是，大家只感到心寒。

要解決問題，看來真的只能在「源頭」想辦法：把香港的學校帶到廣東省，在「源頭」開設大量提供香港課程的學校，讓小朋友不用再跨境讀書，讓香港的老師、甚至已退休的老師有新的就業機會，讓香港的文化和核心價值能與珠三角融合，也不錯呵！

戰叫

香港教育大亂局
——由教改到新高中

梁德賢（中學教師）

1999年1月，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回歸後第一份教育諮詢文件《21世紀教育藍圖——教育制度檢討：教育目標》，啟動了香港教育改革的序幕。文件鋪排出一堆宏大的教育目標，都只是一些抽離情景脈絡的空泛口號，基本上沒有人敢反對，也沒有任何諮詢的功能和意義。

2000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確立了「終身學習、全人發展、學會學習、自強不息、創造空間、追求卓越」等教育理念和方向。

當時教育由羅范椒芬主政，連同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梁錦松，成員程介明與戴希立三人擔任大旗手，人稱教改三頭馬車。教改的主觀意念良好，其中叫得最響亮的口號是「世界變了，教育也非變不可」，羅列現有的制度如何不濟，強調改革代表着進步，使用慣常的手法，拉攏家長、過料傳媒，揭露個別學校和教師的不濟，羅織罪名，集合公眾的輿論力量，營造不改不行的既定事實，令教育界不敢反對和質疑。

當年政府只集長官意志，便強行推出教改，全力開動輿論機器，把教師描述為一個懶惰、不願意進步、維護既得利益的群體，並且形容教

協（即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辦學團體和教育署為阻止教改的三座大山，大有見人殺人、見佛殺佛的氣勢，所謂諮詢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教改的目標是香港要教出「樂善勇敢」的學生，意思就是學生要有「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創新、敢於承擔」的特質。十年過去，是時候檢示教改的各項政策，看看其成效，是否能達到當初目標。教改的具體改革，有三大範疇，分別是創造空間、改良教與學及增加學習機會。

師生的空間是否能創造到？

教改強調「拆牆鬆綁」，釋放教師學生的空間。但教改以來政策不斷增加，教師行政工作越來越多，完全沒有增加人手，師生比例長期偏高，不肯推行小班教學，誇大小班的開支，又說沒有學術研究證明小班的教學效能較大班高。在人口減少、民間壓力之下，政府才於 2004 至 05 學年，在全港三十七間小學開展為期三年的「小班教學研究」，開始在小學施行小班。事實證明，小班教學只需要增加很少的財政開支，便可以成事，以政府近年之龐大財政盈餘，實在是應付有餘。

由董建華到曾蔭權，都強調政府投放在教育的資源絕不手軟。可是歷年臨到學校的資源，都是一些量化的硬件，但學校前線最需要的卻是

減少老師教節和減少每班人數，釋放空間去讓老師關顧學生，政府卻不肯增加教師人手，反映政府覺得硬件資源比人材來得重要。

政府強調學校要向公眾問責和增加透明度，政府採用商界思維，以為增加資源，便可改善教育，於是每推出一項新政策，便要學校寫計劃書、參加推介講座、撰寫財政預算，更要採購招標，計劃完結後，還要提交財政和計劃報告，並且與其他同工分享，於是學校與教師便走上資源越多，工作量越大的惡性循環，工作沒完沒了。

教改又提倡走出課室，全方位學習。現時每間學校都會人有我有，主辦遊學團，由不同科目和組別舉辦，一年內甚至有幾團，教師花在此的心力難以計算。遊學團之前要報價、計劃、訓練，配合課程，老師又要設定選拔原則，以示公平公正，既要宣傳、招募，花在輔導學生的時間，反而少之又少，成效暫未見，但教師的付出卻超乎外間想像。

在學生層面，教改提倡，改革入學機制，在小一、中一及大學收生的關卡，免除無謂操練，減輕學生應試壓力。但現在學生的升學壓力又有否減輕呢？

在小學階段，學能測驗雖已取消，學生仍要應付幾個重要的考試。在小一及小六時，有「全港性系統評估」（TSA），要考核學生中英數

三科的讀寫講聽能力，而中文更包括視訊，即觀看電視片段的理解能力。小六學生畢業時，到中學註冊後，又要考一個「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俗稱 Pre-S1），此試亦會影響學生所讀小學之後兩年的派位情況。而學生五年級下學期一次及六年級上下學期的兩次考試，亦是計算派位的呈分試。

「全港性系統評估」及「香港學科測驗」由於決定小學的學生成績，即介定學校的服務成效，於是導致學校迫使學生作機械式的操練，其中補課有之，購買大量補充練習有之，學生正常的學習活動反而要讓路，學生在五、六年級已經要不斷操練和連續應考幾個試，學生的壓力絲毫沒有因為教改而減輕。政府又減少了升中派位組別，表面上將學校之界線模糊了，但卻擴大了學生的學習差異，不論哪一組別的學校，老師都要花更多心力去照顧成績追不上的學生。

政府自 1999 年，正式開展「融合教育計劃」，以協助輕度智障、視障、聽障、肢體殘障及具正常智力的自閉症學生，就讀於主流學校，讓這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與其他正常學生在同一環境中學習。這個政策，理念可取，讓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能融入主流學校」，但政府的配套卻仍未到位，放在學校仍有很多困難要解決，可憐很多學校老

師未必有培訓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經驗，於是又要每間學校派一隊老師去再培訓。而學校內，老師亦往往要為照顧一、兩個 SEN 學生而疲於奔命，忽略了其他的大多數學生。

香港政府對人口並沒有妥善規劃，當適齡學童減少，政府便簡單採取殺校措施來解決問題。問題是教育局的殺校標準單單以家長選擇為依歸，一些有教無類、努力多年、專教弱勢學生的學校，便被標籤為問題學校，政府殺之而後快。

其實專教弱勢學生的學校被殺，弱勢學生不會消失，他們便會流向 Band 2 學校，Band 2 學校的學生又會流到 Band 1 學校，於是出現校內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擴大，導致教師的課程實施和課堂教學，出現極大的困難。

有 Band 3 學校為求自保，花幾萬元在報章登廣告，去熱烈恭賀特區回歸祖國周年紀念；也有學校發動學生一人一信給溫家寶總理，以感謝國家十年關照之情，之後更廣招學生暑期回校，恭迎總理回信，教育異化至此，不禁令人搖頭嘆息。

縮班殺校令到校內原本穩定的團隊，失去互信。先是縮班，意味教師也要按比例削減，而哪一位教師先被削，又引來很大爭議。原本一般

辦學團體與教育局都有協議，便是遲來先走，即最遲入職的教師，便最先離開。本來一直相安無事，後來教育局容許學校校本自決，校長操生殺大權，於是校內人事動盪不安，製造白色恐怖，教師終日誠惶誠恐渡日。教育局為了能即時解決問題，唯有推出瘦雞餐計劃，計劃卻只令資深的教師得益，於是導致一大批有經驗的教師流失。

既然學校會隨時被殺，關係生死存亡，於是，有學校漸漸將精力着眼於宣傳，君不見自教改以來，學校外牆便越來越多橫額，有些簡直鋪天蓋地，打着一些內容空洞、語意曖昧的口號，甚麼「樂善勇敢」、「不放過任何一個學生」、「一切為學生、為學生一切、為一切學生」、「給我一個學生；還你一條棟樑」等等。

學校為了搶學生，奇招盡出，除了派老師到商場派單張、送校服、免費校車接送、免費借出手提電腦等外，亦有學校到為新移民學童服務的灣仔呂奇教育服務中心搶學生，也有派老師到鄰校門口搶學生、到深圳擺檔展銷等等，教師不務正業，情境難堪。

教與學是否有改進？

在教改中，課程改革是其中最重要的範疇，直接影響到教與學的效

能。箇中分為四大關鍵項目，分別是資訊科技、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德育及公民教育。

政府這十年來花在資訊科技的項目開支，的確極多。當時政策一出，便全民煉鋼，不理學校的發展步伐存在差異，便雷厲風行，下令全港所有學校馬上購買幾十部電腦，有些學校其實未有準備，空間亦不足夠，也要接收。一年後，有記者竟發現，有學校將未開封的電腦，囤放在廁所，浪費納稅人的金錢。此外，老師亦要全面接受培訓，獲取資訊科技的認證，當時業內沒有足夠的培訓人材，便外判予坊間的電腦公司。

此外，專題研習亦是教改假大空的經典例子。如今每間學校，小至小一、甚至幼稚園也說要有專題研習，可惜，學界暫未出現過似樣的專題研習。其實專題研習就是一項學術研究，需要一系列知識，包括命題、假設、資料搜尋的技巧、研究調查的方法、引用與參考書目的格式等等；學校和家庭也需要有資源配套方能成事，學生要用到電腦、打印機、大量文具、攝錄機，還要有時間、金錢去考察、訪問，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肯定會輸在起跑線上。專題研習要成功，首要是不能以考試主導，要讓學生和老師有時間、空間去慢慢考究，否則，只是空有形式，辛苦了家長。

專題研習又會結合全方位活動，強調走出課室，學生一窩蜂地去參觀、訪問，大都是虛有形式，要由老師全程指導。可惜大班教學，老師又不能關顧個別學生，學生沒有清晰的指引，連基本的專題研習知識也沒有，好像調查方法、主題訂立也有問題，藥石亂投，很多連一本參考書也沒有，胡亂在網上尋找資料，做着沒有意義的複製與貼上（copy and paste）。

筆者曾親身經歷一個笑話。某次到一間中學的開放日參觀，有一些學生的專題研習佳作展覽，其中一本以旅遊業為題的，竟有一大段法文的描述。原來學生慣了在網絡上尋找資料，有時甚至不去細閱資料的內容，便下載下來，而教師也沒有時間仔細批改閱讀學生的功課，就會鬧出這樣的笑話。

教改提倡從閱讀中學習，理念是對的，有很多中外研究，都證明有課外閱讀習慣的孩子，各方面的學習能力都會提高。但課外閱讀的前提是學生要有時間和空間去發掘自己的閱讀興趣，可惜教改後的補課、測驗和活動比以前更多更密，學生又哪有時間去閱讀課外書呢？學校為了交數，也往往只能舉辦一些量化計算學生閱讀量的閱讀獎勵計劃，未必能反映學生的真正閱讀成效。

這些年來，學界見到的，是課室內教學效能未有提升，相反的是新

政策和新要求不斷湧現，令到教師接觸學生的時間越來越少。

教改也令政府和辦學團體決裂。政府早於 1991 年推行「學校管理新措施」，美其名是給予學校更大的自主權，因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靈活運用資源，然而背後就是問責的旗號，動輒就以學校用的是公帑為名，需要監察。至 2004 年，法團校董會法例通過，強制辦學團體交出學校管理權，由不同持份者所組成的法團校董會管理，政府為此事不惜與天主教會對簿公堂，雖然最後慘勝，但與辦學團體的關係亦完全破裂。

政府又有自評、外評等措施來規管學校，引入商界的管理模式，全部都是量化的指標數字，乃對管理主義的盲目崇拜。難怪有學校去申請 ISO9002 認證，以此作為收生賣點。

教育局又不信任老師，強制語文教師應考語文基準試，並公佈合格偏低的數字，卻不分出應考老師和公眾人士的數字比例，從而得出老師英語水平低落的結論，以抹黑老師。

政府對教育質素要量化計算的，還有教師專業發展時數，由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於 2003 年提出「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要老師三年內，參加一百五十小時的專業發展活動。教師一時人心惶惶，於是又忙於進修，或不理是否有用，報讀教育局提供的專業進修課程，且時刻計算自己的時數是否達標。

以上種種措施，每一項都有良好主觀意願，可惜缺乏全盤考量，沒定緩急先後便一齊出台，導致教師身心俱疲，身心靈不健康。近年來已有多個報告顯示教師情緒病、抑鬱、精神健康出現問題，教師團隊士氣低落，極需要一個休養生息空間，讓政策慢慢着陸、讓經驗累積和分享。

學生的學習機會是否有增加？

延續教改的是新高中學制，是一次革命性的學制、課程與評核的大改革。新高中學制的規劃，純粹為精英學生準備入大學而設計，將普及教育延長一年，卻完全沒照顧大部份未能入大學的學生的需要。至今仍未見當局有為不同學習類型、不同性向的學生提供多元出路，而政府為非主流興趣學生提供的應用學習課程，學費高昂，學生自付，其認受性亦成疑。

新高中學制其中最大改變是引入通識科成為必修必考科目，以及各科不同程度的校本評核。新高中學制開展後，教師工作量大增，教育局又將各科課時計算錯誤，導致師生無法在正常上課時段內完成課程及校本評核，唯有在暑假及長假期補課，令師生疲於奔命。

新高中的科目大幅減少，由以前的四十二選修科大幅減少至二十四科，當中科目被大動作的重組和整合，例如科技與生活科乃來自以前的

家政、膳宿服務和時裝及成衣等科目；而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則由商業、會計學原理、英文文書處理及商業通訊發展過來。這些重大的改動，未見有甚麼學術依據，卻將很多老師以前累積下來的教學資源和經驗一筆勾銷。新高中可供學生報考的科目也減少至最多八科，一些傳統的科目例如中史、歷史及視覺藝術等等，都面臨應考人數大幅減少的命運。新高中學制只令香港的學生越來越單一，出路越來越狹窄，絕對不利本港培訓多元人材。

結語

由教改至新高中，教育政策缺乏整體規劃、通盤考慮，整個香港社會及教師隊伍已為教改付上沉重的代價，未見政府有撥亂反正之舉，受害的師生將更陸續有來，至今從未有人為施政失誤而負責。

高官、僱主、政客、校長會和家長會，都一廂情願地以自己角度出發，從利益、政策和資源考量，對教育指點發聲，唯獨學生和老師卻往往是最沉默的一群，沒有機會說話。近幾年，越來越多學生和家長選擇用腳投票，離港到海外升學。發展至此，香港教育制度就像一隻只為資本家服務的怪獸，不斷吞噬我們的學生和老師，製造一式一樣的所謂精英。香港的教育，會有曙光嗎？

摧傷教育風俗數例（上）：官篇

岑判文（香港人，幼稚園到大學本科教育都在香港）

香港的教育質素自 1997 年起大幅滑落，即使要簡評近一、二十年教育改革的功過，也要用上數十萬言。本文只評論一些對香港教育有實際影響力的人 (1)，已確認的「傷風敗俗」之舉。如有掛一漏萬，祈請讀者見諒。先談官。

董建華婦人之仁：摧毀機制、破壞公平

董建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1997 年上任，2005 年辭職。

香港回歸後整體教育質素大受摧傷，董建華用人不當，責任最大。還有一實例，可以說明長官意志怎樣擾亂社會習俗。所謂「婦人之仁」須要解釋一下。舊社會婦女沒有事業，富貴人家的主婦如不讀書，有可能成為無知婦人，一不知稼穡艱難，二不知民間疾苦，見小孩稍吃苦而肉痛，便成為敗兒的慈母。

董建華見中學會考放榜之後，學生（或連同父母和姨媽姑爹）為升讀預科而奔波勞累，仁心暴發，一聽有學生訴苦，便下令改制。結果，香港大部份中學被逼在數天之內完成收生。在此之前，成績優異的中五

畢業生有起碼一至兩個星期的時間，細心思考原校升中六還是轉到一家更切合自己學習需要的中學；而成績平庸的學生則要等待「塵埃落定」，才可以獲得原校或他校取錄升中六。「董伯伯」的「德政」，是犧牲了優異生的選擇權，讓平庸學生早點得到學籍，早點享受餘下的暑假。

一家企業的大老闆忽然有興趣過問一個小部門日常運作的小毛病，如果向下屬發問而問得蠢，只能得到蠢的解決方案。問題是「董伯伯」不了解當時中六收生程序背後的精神。因為其令尊「船王」董浩雲先生擁有龐大企業，「董伯伯」一出生就差不多注定了要當大公司的「董事長」，所以他不知道年青人離開校園投身社會時，也是優異生（包括成績和其他能力）先獲許多雇主聘用，他們「揀完揀剩」，才輪到平庸的同學。大學畢業生的情況亦如此。可以想像，當年董建華只問教育部門的官員：「有甚麼辦法讓升中六的學生不必『頻撲』？」而不是問：「為甚麼全香港中六收生起碼要兩三個星期？」以及：「有沒有好的辦法縮短收生程序？」

董建華問得蠢，教育部門便給他設計一個倒行逆施的新制度。於是，凡六科十四分的中五生，原校都必須在放榜當日取錄。這就徹底破壞了「成績優勝者先選校」的「公平競爭原則」。

「能者優先」卻從來都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一！

六科十四分大概是 2C4D（A 算 5 分，E 算 1 分），成績其實很平庸，未必有足夠能力應付預科課程。在幾十年前，這種成績還有可能要重讀中五，待取得更好的成績才有望升讀中六。成績特好的學校，根本就沒有足夠學額錄取所有達十四分的本校中五生。於是有個別高達二十分（約 2B4C 之類）的學生，就成為「名校遺珠」！他們在「董建華新政」之前不必「頻撲」，因為成績差的學校「虛位以待」，留位先收了外校的「優異生」，收生未滿才收原校的「平庸生」（十四分上下的那些）。在新制度下，原來的「優異生」反而要等「賣剩蔗」，他們錯在哪裏？只能說錯入「名校」而沒有名列前茅！

董建華立了「軍令狀」，教育部門的官僚一則為滿足長官的喜好，二則為免被人投訴，便用一刀切的辦法只算最佳六科，阻止學校按照傳統運用酌情權。比如說學生要報理科班，物理、化學等科的 ABC 必「值錢」，文科班則重視歷史、地理等科。董建華亦不知每間中學預科班的科目組合不同，比如有學生要修讀冷門科英國文學或心理學，就可能非轉校不可。新制度就限制了學生的選擇。董建華此事的失誤在於對難題預設了答案，如果他能花三數個小時，約見幾位中學校長和預科班教

師，請教一下，就會明白學生升中六要「頻撲」是有道理的。

在新的三三四學制之下，再無「中六收生程序」，董建華這一次婦人之仁的禍害便告一段落。

李國章防猜教師：追求數字、影響教學

李國章，2002 至 2007 年任教育統籌局局長，是實行「高官問責制」之後的首任。羅范椒芬是其前任，因為制度改變，由原任局長改為常任秘書長，成為李的副手。兩人基本上仍然執行梁錦松時代設計的教育改革。羅范椒芬的一些具體過失，下節再談。

教育改革有許多令教師喘不過氣而徒勞的「虛功」(2)，各種措施的背後精神可以總結為：「信不過校長、信不過教師。」因而要加強管制監控，用的是 X 理論 (3)。

於是有種種防猜教師的措施。

其中一項是「學校增值」（School Value Added），即是為各學校計算一個「中學會考預測平均得分」，然後再拿「中學會考實際平均得分」比較。二者相差之數，就是「增值」。超標的是「正增值」，即是學校教得好；不達標的是「負增值」，即是學校教得不好。這樣，校長和教

師還可以奉行當局大力宣傳的「求學不是求分數」？常言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公開考試的成績不是教育的全部，中學教育的整體成效，絕不可能在學生唸中學的那幾年之內完全測知，這種急功近利的評估辦法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作為官員政績的證據。這說明當局講一套、做一套。如果有學生蠢到相信當局「求學不是求分數」的鬼話，他們很快會被淘汰，甚至失去接受下一階段教育的機會！

又有「校外評核」（External School Review）。一則，因為信不過學校，便找外人來「指指點點」。二則，有了評核，就有大量數據。既可以用來糾繩校長，即使將來要吹噓教改的成效，又有材料來寫文章。這門「功課」可以說是傳統「視學」的無限擴大。基本上，學校裏面發生過的任何教學活動都要有數據紀錄，細如圖書館借出過幾多本書都要「上簿」。這些措施都屬「不務正業」，教師將幾許精神心力耗費在「應酬」這些新的「課外活動」？怎可能不影響正常教學？

羅范椒芬批判老師：抹黑背誦、鼓勵卸責

羅范椒芬，2000 至 2002 年任教育統籌局局長，後改任新制的常任秘書長至 2006 年。

羅范椒芬是政務官出身，香港的「AO 文化」有一個特色，就是

「AO」甚麼工作都會得做，就是不會認錯、不會道歉。在此只談論她在2000年「批判」(4)昔日的西史老師，指責老師上課時要學生背書，因而令她不喜歡這個科目。

這番言論第一個錯在於否定背書的作用，且不談背書對語文學習的幫助(5)，在此略談幾個必需能背書的行業。香港許多小朋友發演員夢、歌手夢，請問演員要不要背熟台詞對白？歌手要不要背熟曲詞？甚至如餐廳的侍應是否要記熟餐牌的內容？所以，能背書肯定有用。但是局長「批判」老師，再加上當局宣傳「愉快學習」，便令許多原本「不大聽話」（指不聽師長教誨）的學生，有「充分」理由拒絕背書、拒絕用功記憶課堂學得的知識。結果是我們的中小學生腦袋內記得的知識越來越少，很多都變成「無料之人」。

第二個錯誤是支持一些學生的乖張觀念。有不少學生會將自己要學習的主要科目視為「甲老師的科」、「乙老師的科」。如甲老師對我不好（或教得我不明白、或講課太悶等等），我就放棄「甲老師的科」以示抗議。這樣，學生就將自己放棄研習某個科目的責任，完全推到他們不喜歡的任教老師身上。

王永平善於承旨：隱瞞數據、杜絕投訴

王永平，1995 至 1997 年任教育統籌司，1997 至 2000 年任教育統籌局局長。

董建華在回歸後鹵莽地推倒舊的中六收生程序，王永平解釋新程序「盡量減省學生和家長的焦慮及奔波」，那麼他可能沒有試圖向行政長官解釋舊制的精神。

王永平從問責局長退休下來之後成為「時事評論員」，市民似乎忘了回歸初期的「母語教學」之亂，是由他負責領軍執行。

「母語教學」的精神沒有錯，但在設計執行時則以方便行政部門為主，便犧牲了學生的學習和知情權。為杜絕學生和家長投訴不公，最佳辦法莫如隱瞞資料。1997 年推行「母語教學」時，教育當局其實給了所有小六學生一個「標籤」。人分三等，號曰：「適宜用英語學習」、「可以用英語學習，但用母語學習更佳」、「不適宜用英語學習」。第三等當然要去接受「母語教學」了。但是問題來了，你取消了升中試，沒有考核過每一個升中生的英語讀寫聽講能力，憑甚麼給學生這個「標籤」？一旦給這「標籤」烙了印，整個中學期都不能洗脫呀！而且一個少年學生是否適合「用英語學習」，不是簡單的「非黑即白」，也不可

能中一被判「不適合」之後，就「不適合」到中學畢業。此外，還規定中學必須收到 85%「適宜用英語學習」的新生，才有資格全科用英語授課。這意味着平均一班四十個學生就要有三十四個「適合」的學生，另外六個「不適合」也不打緊。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數字又有甚道理在？

附帶一提，通識教育科弄到滿城人心惶惶，王永平「時事評論員」又生一計，建議評分只用「合格」和「不合格」兩級。假設考核公平，這條「屎橋」當然對優異生不公平，但亦可以杜絕投訴，從傳統「AO 文化」出發，亦屬上算！

小結

香港在回歸之後，不斷有官員憑一己的長官意志推動所謂「教育」，於是產生許多毛病。其一是用商人的營商思維來審視新政策、新制度的成效，於是有董建華指令縮短中六收生程序，以及李國章、羅范椒芬要求學校編製大量文件和數據，叫教師疲於奔命。另一是香港政府的 AO 文化，慣性為行政方便而任意「一刀切」，例如「六科十四分」、「平均 85%」等，都是「唔理好醜、求其就手」。

官方如此不專業，教育改革焉能不越改越差、越改越亂？

註釋：

(1) 晚清名臣曾國藩《原才》有云：「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筆者中學時代讀過這篇短文，印象深刻。

(2) 借用物理學術語 virtual work，比喻浪費時間精神心力而無實效。

(3) 管理學上的 X 理論（Theory X）認為人的本性懶惰而不進取，需要管理者強迫才有工作原動力。Y 理論（Theory Y）則認為人普遍願意承擔責任和自我監督，管理者應要下放權力，才可以讓員工充分發揮才智與能力。

(4) 「批判」在此用不按一些香港人的粗淺理解，以為是 criticize 的中譯，而是中國大陸通行的意義：「對所認為錯誤的思想、言行進行批駁否定。」一般用法，凡被批判的人，已被先驗認定犯了嚴重政治錯誤。

(5) 讀者可參考潘國森：《甲級中文》（次文化堂，2010 年），73-134 頁。

摧傷教育風俗數例(下):民篇

岑判文(香港人,幼稚園到大學本科教育都在香港)

摧傷香港教育風俗的人不盡是正式的政府官員,這些「教育罪人」可能沒有領公務員的薪水,姑且歸類為「民」。

梁錦松打殘名校:力主抽簽、殃及家長

梁錦松,1997 至 2001 年任「教育統籌委員會」(簡稱教統會)主席,其後轉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主理香港教育政策時未算政府官員,可以算是「民」。

教統會名義上只負責向「教統局」(及其前身教育統籌局、教育及人力統籌局)提意見(1),實際上教育當局只是「奉命行事」,「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梁錦松可以說是回歸後教育改革的一位「總設計師」,不少毫無道理的政策都是他領導的教統會弄出來。例如,他們否定以公平的辦法,處理小學生升中時學籍分配的制度,以為:「香港實施九年普及義務基礎教育,所以並無真正需要在小六升中一的關口設置一個高度篩選性的派位機制。」(2)

梁錦松等人無視全香港所有中學的差異,也扭曲了「升中試」的另

一個功能，就是讓「優異生優先選校」以及「優質學校優先選生」。

為了消除香港所有中學的差異，梁錦松掌管教統會時曾經多次表示要「打殘名校」！還當著我面直言不諱！

香港回歸前的所謂「名校」，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傳統名校」集中在市區，除了官校以外，主要是天主教區或其他基督教會辦學、有耶教(3)背景的學校。這類名校知名度高，吸引成績優異的學生報讀。還有「新興名校」，多數不在市區，全港的知名度不高，但因為努力提高學生在公開試的成績而成為所屬學校網內的名校。

「名校」為甚麼要打殘？第一個大原因是意識型態的問題，因為大量傳統名校都有耶教背景，這些學校有許多校友都是政務官（AO），現時香港政府高層的基督徒比率偏高(4)。「教會名校」在港英時代較多能夠成為名校，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們的教師團隊中有大量外籍傳教人員，於是英語授課有明顯優勢。第二個大原因是「傳統名校」比較「不聽話」。因為在舊的「市場機制」下，「名校」容易收到優異生，總體成績好便經常抬槓，對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唱反調。有些時候，連官校也不聽話。第三個原因恐怕是打殘了「傳統名校」之後，中學之間的差異收窄了，學生和家長爭取進「名校」的誘因就減到最低。

「打殘名校」其中一個辦法是「源頭治理」，減低名校收取優異生的比率。首先每間名小學自行分配的學額減少，交給中央分配的加多。升中時又設關卡，小六生成績級別「五改三」，官方的理由是減輕「標籤效應」。在五級時代，頂尖的 Band 1 中學基本上只收學校網之內成績最好的 20%；改成三級後，Band 1 生變為成績最好的頭 33%。再有削弱校長收生的酌情權，引入「世襲制」⑸。第二個辦法就是推行《校本條例》，天主教教區為此與香港政府訴訟多年。

「打殘名校」是不成文的政策，但「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有「名校」乾脆改「直資」來逃避當局的控制，結果不少「名校」大幅加學費，受害者主要是成績優異的清貧子弟，他們原本應有的「優先選校權」⑹ 就這樣給剝奪了。

清貧優異生慘被「奪權」，只能逆來順受。中產家長不服，不得已要將爭奪「名校」學籍之戰，提前到小一。可是改來改去，小一收生仍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公開，不單止對學生本人不公，家長也承受很多不必要的壓力。手頭上沒有統計數字，家長為年幼子女選小學、中學時投入的精神心力、時間金錢都難以估計，既影響了香港年青家長的生活質素（包括心理和生理的健康），也浪費了龐大生產力（包括影響工作

以及個別家長放棄事業，全職照料子女的學習）。亦有經濟較寬裕的家長選擇「跳船」，將年幼子女送到外國留學或入讀香港的國際學校。過去在「升中試」的年代，一般小學生到了小五才開始準備應考，大抵由幼稚園到小四這幾年都沒有甚麼功課壓力，即使升中試偶一失手，還可以參加個別學校的「收生試」，並無「一試定生死」這回事。現在用不透明的「抽簽法」，小孩由幼稚園升小一已經全家動員，家長和子女在漫長的中小學歲月都寢食難安。

在梁錦松幻想中的世界裏，香港每一間小學、以至每一間中學都沒有分別，所以他鼓吹就近入學。既要所有小學都「均質」（homogenous），難怪念念不忘要「打殘名校」了。這是「董建華式長官意志」的變種，以為這樣對學生好，就不顧一切盲目行事。這樣的施政方針，是為「左傾盲動主義幼稚病」！

程介明樂道兒惰：怪獸家長、諉過課程

程介明，語言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主席，教統會當然委員。

商人田北辰是「語常會」的前任主席，任內大力鼓吹「普通話教中

文」（普教中），田北辰侃侃而談「我手寫我口」，是典型的「周日司機」（Sunday driver）教揸車。現在「田規程隨」，繼續硬銷「普教中」，必定重創香港的「國文教育」。(7)

2002 年，程介明對傳媒說其兒子上中國歷史課時睡覺，以此作為「中國歷史科最沉悶」這個論斷的佐證，此話一出，輿論嘩然，更被批評為「孤證不立」(8)。

一個學生對個別學科提不起學習興趣以致於上課時睡覺，背後的理由和滋長問題的環境都因人而異，也一言難盡。

學生覺得課堂沉悶，沒有學習動機，要「辯證論治」。有可能是智力未逮，那就可以退學；有可能是程度太差，那就要降級補底；有可能誤交損友、染了不良嗜好，那就要先行根治藥癮；有可能是「養不教，父之過」；有可能「教不嚴，師之惰」等等、等等。

有許多學生討厭數學科，亦有學生討厭英文科，難道就不學嗎？或者合併科目嗎？

我卻說中學的中國歷史課最易，肯定不必以英文授課。若記心好，中文寫作水平不壞，要取得好成績，簡直易如反掌。

再退一萬步說，天資卓越、耳聰目明的資優生，因為父母給他的條

件好，當然容易「愉快學習」。人生在世，許多事情都可以按自由意志選擇，親生父母是其中一項不由人挑選的。父母給的「本錢」不多，讀書也好、學手藝也好，只能將勤補拙，加倍用功。

鼓勵學生諉過於老師、課程、教材，香港的教育質素怎能保持？程介明本身是個教師，犯這樣的錯，過失當比梁錦松、田北辰那些實際教學經驗不多的商人更重。

「獅子山下」的奮鬥精神又從何說起？

張文光不務正業：當局助惡、失憶旁觀

張文光，前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席（1990-2010 年）、教育界功能組別議員（立法局時代 1991-1997 年，立法會時代 1998 年至今）。

說到近一、二十年的教育改革，張文光是「當局者」，還是「旁觀者」？

如果我們認為他的意見不受教育當局重視，他是偏於「旁觀者」，只負輿論監察之責，不過教育改革千瘡百孔，亦算失職；如果他的意見與教育當局相近，又或者大力支持新政策，就偏於「當局者」了，與前文所列官僚同罪。

名義上，張文光對教育政策的意見，有數萬教協會員支持，當局自不能輕視。而且，許多教改政策背後的理念和精神，正與張文光的一套相應。否定所謂「操練文化」即是一例(9)，殊不知「熟能生巧」，中小學幾個主要科目如中文、英文、數學等，其實都要學生多用功努力，才能夠有進步。

張文光對教育資源分配的理念，偏近「抽簽派」，否定公開考試的積極意義。全力消除所謂「標籤效應」，跟梁錦松沆瀣一氣。廢除「標籤」，就要取消考核，但是取消了考核，又可以怎樣分配資源？學生選校、學校收生都是分配教育資源。

為免「受害學生」找麻煩，當然要用王永平的辦法，即是「隱瞞數據」，例如張文光以教協會長身份說過：「打穩母語的根基，對學習外語也會有幫助，會考成績單也取消了作答的語言標籤；而升學方面，大專中英語文水平都不能有所偏廢，通過一些短期的銜接課程，應可應付到大學各學科所需的專科英語，沒有必要過早地揠苗助長，糟蹋了中學時期好好學習的時機。」(10) 刻意隱瞞學生在中學階段用甚麼語言學習各主要術科（指物理、地理等等理科或文科的主科），最終對學生沒有好處，因為現時香港各家大學都以英語作為主要教學語言，到了大學階

段才語文「補底」，必然會影響教學成效。

由此可見，張文光盲目支持「香港式」扭曲了的「母語教學」，他有份開出空頭支票，硬說「香港式母語教學」不影響英語學習。而所謂「銜接課程」、「應可」如何如何，亦有似江湖郎中賣假藥。

今時今日張文光對教育改革的失誤指指點點，則其偽善更甚於一眾官僚！

有不少家長指責香港的教師只顧私利，從來只見教師遊行示威為自己爭取權益，如加薪、升遷、減工作量等等，卻不曾見過有教師為學生的權益上街。香港教師整體形象如此，張文光亦有責任。

張文光反對教師「語文基準試」，也盡顯「工會領袖」的意識，絲毫沒有真正專業人士的視野。如果筆者是「教師工會領袖」，一定會這樣回應教育當局：「要考核中學教師的語文水平嗎？很好，這就交給我們『教師工會』全權舉辦！我們組織、我們評審、我們監督。」

君不見香港的律師公會、大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醫學會、工程師學會等等，都是自行發牌，把行業的監管權抓住牢牢不放嗎？

張文光放棄為中學教師樹立專業地位的契機，則連當一個工會領袖也不稱職。

小結

參與「改革」香港教育的各界精英（包括商人、官員和教育界權貴），都有本事堆砌一大堆數據，好去證明他們向學生、教師和家長硬銷的改革絕招是何等神效。現實卻是近一、二十年香港學生的平均表現卻如江河日下。以中國語文科的改革為例，我們只要每年看看考評局的報告，就知道「典型平庸中學生」的中文寫作能力，已經比他們父母求學時期的小學生尚且不如。如果大家只看數字，中國語文科的合格率沒有大跌，考獲優等的「狀元」仍在，不過這是「級別貶值」（grade inflation）的結果。

近年「香港式」教育改革的缺失，在於掌握改制大權的人太過勇於推翻傳統（如梁錦松否定考核、羅范椒芬否定背書、張文光否定操練等等）。他們不理會一個制度總是因應當時的實際環境和需要而製定，修改舊制度時應要了解舊制度的背景，才可以找出不足之處。即使我們的「教育改革急先鋒」真的認為，自己一個腦袋遠勝過去無數人年復一年累積下來的實際教育經驗，也不必急於一時，稍不順眼都抹黑醜詆和「推倒重來」。否則，「香港式」教育改革只會如本文所舉的數例，成為一次又一次的人禍。

註釋：

(1) 見該會網頁「職權範圍」，http://www.e-c.edu.hk/tc/reference/index_c.html。

(2) 見《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年 9 月，第 10 頁。

(3) 耶教指廣義的基督教，分為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即一般香港人理解的基督教）以及東正教（在香港基本上「缺席」）。

(4) 基督徒在此指信奉基督的人，包括天主教徒、基督新教徒（包括英國國教聖公會），據非正式統計，現時香港司局級官員約有七、八成信奉基督。

(5) 報讀小一的新生如果父母兄姐曾在該校就讀，可以加分，故民間戲稱為「世襲制」。

(6) 在梁錦松本人就讀中小學的年代，這是學生的基本人權。

(7) 田北辰「我手寫我口」作文法的毛病，可參考潘國森：《甲級中文》，有專章評說，在此不贅論。

(8) 見 2000 年 5 月 9 日《明報》「論壇版」〈教育改革者的言行身教〉。

(9) 教統會的《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三番四次指責「操練」。

(10) 見張文光《為母語教學開拓新天地》，載《教協報》第 346 期。

香港教育如何解除教科書的束縛？

黃英琦（律師、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董）

教科書太貴；教科書太平庸；教科書教壞小朋友；教科書迴避敏感歷史；教科書把複雜的事情太過簡化；教科書不利教育和教學法的改革創新。香港怎樣才能解除教科書的束縛？

教科書是標準化教育下的產物

根據陸鴻基博士的《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開埠初期的學校大部份只是在榕樹下授課的鄉村私塾，老師的「教科書」是《三字經》、《千字文》，孩子長大一點，就要背誦詩詞歌賦和讀四書五經。

至 20 世紀戰後，那是物質匱乏的難民年代，大家都窮，但從內地南來的學人對教學充滿熱誠。沒有足夠學校嗎？華人商會宗親會支持辦學、空間不夠，孩子坐在天台小學的課室孜孜不倦學習，有沒有教科書並不重要。不夠專上學院？已故錢穆先生與幾位學者在深水埗桂林街創立新亞書院，只有簡陋的課室，學院在極艱難的環境中營運，老師與學生同住。學生讀的，是錢穆先生的中國通史和唐君毅先生的哲學概論。

教科書變成主角，是由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政府為適齡學童提供九年免費教育，統一學制和課程，並興建大量學校。教科書（還有考試）是政府全面介入教育，要求教育「現代化」和「標準化」下的產物。

當教育由政府主導後，教育局負責課程發展和質素保證，轄下設課程發展處和課程發展議會，由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以至資優教育，皆訂定了各樣的框架和內容，各有學習目標、學習領域、課程綱要。教育局不負責教科書的出版，只保留審批權；於是，教科書由市場主導。在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即是由出版社操控香港百萬學生所學的知識和內容。

課程標準化（知識被割裂為應試科目）、學制規範化（三年幼稚園六年小學六年中學），再加上教科書的市場化，除了令學習變得標準和單一之外，也扭曲和矮化了老師的角色。在教育發展史中，老師的熱誠和能力最重要；老師也需要很大的自由度，因材施教；但在教科書主導下，出版商卻成了半個老師。

教科書對家長造成沉重的壓力

在香港的本地學校，「教科書」相當神聖。書單一出，家長就要蜂

擁到書局買書。學生忘記帶教科書會被罰，弟妹用哥姊讀過的舊版教科書也不行，會被班主任罰。近年教科書多了插圖和頁數，用粉紙印刷，學生的背包愈來愈重，但「教科書帶不齊」被學校視為嚴重問題，於是家長幫孩子執書包時要戰戰兢兢。這是心理上的壓力。近年教科書價大漲，對家長的荷包是極大的打擊。

香港有小部份學校堅持不用教科書，堅持按學生程度整合課程，不跟隨教科書的大隊，也不靠書商提供的教材，值得我們尊敬，但它們是少數，一般主流學校不是這樣。

不是所有學制都把教科書放在如此高的位置。香港的國際學校學生大部份不用買教科書，如有科目需要教科書（如美國歷史），就由學校代為購買，每年借給學生使用，學生不准在書上寫筆記和塗鴉，期末交還學校，如有損壞才要付款。

有了教科書，老師的功力可以很一般；不用教科書才能鼓勵教學法的創新。一位朋友的女兒在國際學校就讀，成績好，老師沒有讚賞她，反而挑選她作為小助教，要求她協助較弱的同學，更讓她教半節課，讓她建立同理心，懂得易地而處，明白老師的位置和困難。

教科書令課程平庸和缺乏自主

有了教科書，老師依賴，許多新的教學法都放棄不用，只需依書直說就可以了。而教科書最壞的是質素參差和平庸，甚至教壞小朋友。

身邊的家長朋友總愛投訴教科書的內容。例如幼稚園高班有一套「節日故事」的課本，在《新年》一書，課文無聊低俗，不提新年的傳統，竟無厘頭介紹有「意頭」的新年菜色：「吃了芹菜，勤勤力力；吃了蝦，哈哈大笑；吃了魚，年年有餘」，這不是導人迷信？接下頁，題為「節日萬花筒」，課文是「花車巡遊和煙花真好看」，簡直是電視主持的口吻。難道新年就沒有其他值得教五歲小朋友的事？除夕一家人整整齊齊團年，大年初一全家要向長輩拜年，究竟是怎樣的傳統和意思呢——這話題總比「好意頭餸菜」少一分「騎呢」吧！

到一年級，孩子學的中文已非常深，且中文教科書往往聚焦在應學習的生字和句子而忽略其內容和價值觀。請看以下課文：「媽媽削蘋果，削了一個又一個。她吃蘋果心，片片果肉留給我。」明白了，原來港孩是這樣煉成的。除了父母的溺愛，教科書也強化了港孩的霸道行為。課文以小女孩第一身出發，從她口中娓娓道來，媽媽讓她全吃蘋果肉，似乎變成最天經地義的事。課本解釋說，這一課展現「母親對女兒的愛」。

我不同意，太迂腐了吧？今天香港重視的是「感恩、尊重和分享」，我會這樣改寫課文最後兩句：「謝謝媽媽為我削蘋果，我把一半果肉留給她。」

這不是個別例子。在中文教科書中，常出現意識和價值觀令人費解的情況。這些教科書的特點是文字不美、內容牽強、觀點平庸。若要孩子學好語文，為何不取材自優秀的兒童文學？最要命的是，課文在學習過程中擁有崇高地位，學生做習作，老師要同學默書，都以這些奇怪課文為主。

到高中了。新高中通識科的發展令人憂慮，通識教科書的毛病是自以為是，簡單的把複雜的理念對立化，不利少年人對事情的深入理解，建立批判思考。且用「保育」作例子：教科書談保育，往往把「發展」和「保育」看成勢不兩立、絕不能共存。若要保育，發展就必須有所犧牲。這當然是超錯的觀點，是曾蔭權政府無能，政策傾斜地產，香港的發展才會被扭曲至「不惜一切代價破壞歷史和環境的發展」，保育之路才會如此舉步維艱。換着別的城市，發展是有限制的，保育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部份。

還有比通識更壞的，是歷史教科書可以扭曲及淡化敏感歷史。在民

進黨統治下的台灣，教科書刻意「去中國化」；在殖民地年代的香港，教科書迴避談國共關係。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教科書如何描述六四事件？美其名是由「出版社自決」，政府尊重出版商，但實情是出版社懂得「自我審查」。常用的歷史課本這樣描述六四：「中央頒布戒嚴令，並調派軍隊進京，六月四日凌晨，中央下令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展開清場行動，驅散聚集的學生。持續五十多天的事件暫告一段落。」內文粗淺交代後，沒有提及不同人士對這宗歷史事件的解讀和看法。

如何取代教科書？

教科書主導學習實在過時。

自從陳維安副局長在四年多前上任後，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為教科書找出路。教育局成立了工作小組，開過無數次會議，最後卻敵不過書商的傲慢，小組作不了驚天動地的建議，只求落實教科書和教材的分拆定價，卻遭來書商的白眼。書商不放政府在眼內，拒絕配合政府建議。談了十年的教科書問題，仍未解決。弱勢政府，莫過於此。

教科書由市場主導，書商每年總有百般的加價理由，教育局近年改學制改課程，更成為理所當然的藉口。然而陳維安副局長統領的工作小

組研究如何降低教科書售價，只是個偽議題。政府有怎樣的板斧可干預或介入售價？當教科書用粉紙精裝印刷，有太多無謂插圖，效果是教科書比舊版厚，但課程卻沒有因此更豐富；面對如此浪費、明「恰」消費者、又與環保意念背道而馳的出版策略和行為，政府又如何保護家長？

問題核心，在於教科書這行業的特點：消費者無選擇。擬訂書單的是學校，付鈔的是家長。當學校確定書單後，教科書就是「指定」學習內容，家長沒有議價能力，也不能選購類近的教科書或讀物。

在政府仍未高調與教科書商對抗前，學校與書商的關係密切，書商為學校提供各種好處，大型的包括安排老師學習營和為介紹新書而設的盛宴。書商各出奇謀籠絡校長和有決策權的老師，愈在這方面花錢的書商生意額愈做愈大，熟悉學校的人脈關係，而新出版社根本沒有機會進入市場。這樣的風氣十年八載後，小學和初中主科教科書已被數個出版商壟斷，書商可除時提高售價。因此，教育局要解決的，不是把課本和教材分拆（這不是問題核心），而是如何重新調校書商和學校之間互惠互利和互相依賴的關係。

怎樣打破這種關係呢？有心就可以。已有開明學校為同學集體訂購二手教科書，並要求老師盡量棄用教科書，改為自備教材。我認為教

育局也應考慮向學校增加撥款，鼓勵學校自製課程，或促成學校與非牟利團體合作，參與教科書的編印，讓教科書的內容自由多元，價錢也更合理。胡蘿蔔與棒子並行，教育局必須禁止學校收受任何贈品或免費教材，如被發現，應有嚴厲的罰則。

以上都是可行的建議，但陳維安的小組卻在考慮應否由政府招標出版教科書。這更荒謬了，自政府對免費教育作出承擔的四十多年來，從未介入教科書市場，為何現在要這樣做？香港需要「官方教材」嗎？

教育如何面向 21 世紀？

教育局要思考和帶領改變的，還有一個範式轉向的大議題：在互聯網年代，教科書早已落伍，教材早應該電子化，只是學校不願改變，出版社也沒誘因附和改變，香港的教育仍未進入 21 世紀。世事瞬息萬變，一本教科書載不下所有內容，香港的教育要回應 21 世紀，與時並進，實在是刻不容緩。

今天的中小學生是在互聯網長大的第一代，他們幾歲大已在電腦看光碟，每天同時在真實和虛擬的兩個世界遊走，怡然自得。他們在網上交友，懂得用網上資訊學習，但也會從網上吸取不良資訊。21 世紀的

教育不能再靠教科書，要同時思考「電子化」和「人性化」。

我一向對芬蘭教育非常讚嘆，不單是芬蘭學生的語文和數學能力特別強，而是芬蘭老師相信人人可教，不會嘲笑學習緩慢的學生，遇着能力較弱的孩子，老師會請全班同學一起協助他。在人性化和平等（及非教科書主導）的學習環境下，芬蘭教育較少出產「失敗者」和「零分生」，不會像我們如此勢利的看待教育。

其實，香港的教育發展也曾經是這樣的：老師充滿熱誠，老師與學生亦師亦友，願意「教好」學生。只因幾十年來的教育政策太僵化，由政府全面介入開始，我們經歷了學制的規範化，課程的標準化，以至讓教科書變成主角，由出版商主導，才會造成今天的局面，扼殺了多元、扼殺了質素，也扼殺了人性。

教育大零落
——看庸官如何治港辦學

史亦書（社會觀察評論員）

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個人成就與讀書成績，當然沒有絕對關係，但從小用功學習，裝備自己，待時來運到便可把握機會，扶搖直上，擠身社會上流，努力學習是投資未來的不二法門。這是一代傳一代的人生智慧，也是悠悠千載流傳下來的經驗。可惜的是，今天香港教育不斷被社會各界質疑批評，問題多不勝數：學生因壓力而走上不歸路，家長徬徨無助，慘不忍睹；老師應付課程改革以外，還要處理行政工作和課外活動；校長天天望着收生人數、公開試成績及校本評核報告等，長年累月戰戰兢兢地辦學……

香港教育改革不斷，卻愈改愈糟糕，這幾乎是全香港的共識。回歸前後第一大改革是1998年「母語教學」，由王永平及余黎青萍在一片反對聲中落實。全港大部份中學，因此被分類為「英中」及被認為次一等的「中中」。因為母語教學硬性規定教學語言，「中中」學生只能在英文課內接受英語訓練，英語訓練便隨即減少。即使學校為學生提供一些課餘英文班，但其英語能力普遍下降，已是不可挽回的事實。

香港大部份行業的英文要求，並沒有因為回歸而減少。「被母語湊

大」的畢業生紛紛踏入社會工作，未符合要求而被老闆埋怨，自然難以避免。其實，這政策本來已受各界反對，可是官員力排眾議，非做不可，受害的無非是莘莘學子。他們當年無可奈何被派往「中中」，畢業後又得忍受指責，還要在工餘時間補鐘學英文。這種「雙輸」局面，難道沒有官員考慮過嗎？

值得一提的是母語教學的兩位舵手，在強推政策後兩年內，先後被調離教育部門及自行請辭，二人捨身實現爛政策，所為何事？縱觀歷史，語文政策大都是管治者的「巧手菜」，由秦始皇霸政、滿清入關、英殖時代，都證明語言有助管治。這種不顧社會現實需要的語言教育政令，從哪裏下達香港，恐怕已無需明言了。

母語教學至 2008 年推行十年，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指社會各方面對母語教學有很多意見，於是宣佈「微調」，也就是間接承認母語教學失敗。如果在十年前，也就是余黎青萍女士收到二千多封反對信的當天願意煞停，或至少推出較有彈性的「微調版」，也許十年來數以十萬的香港學生便因此得救。

事實上，回歸以來教育改革步伐從來沒有停過。1997 年梁錦松上任教統會主席，翌年隨即發表影響香港千萬學生命運的《第七號報告

書》，我們只需要稍作對比，便可察覺此報告書其實是日後教改的藍圖。

如果宏觀地看教改政策，我們不難發現它有濃厚的企業管理色彩，這與梁錦松經濟及管理學的學術背景似乎大有關係，當中「校本管理」則是最明顯的例子。政策指明香港所有受資助的中小學，需要自理大部份行政工作，包括自行分配資助用途及教學方向。驟眼看來，像是當局願意下放權力，讓教學更具彈性，本來可喜可賀，但歷史往往是諷刺。實情是政策推行後只改善教育當局的運作效率，全港中小學的教學質素卻未見顯著改善。新設的法團校董會令學校行政成本上升；日常教學、輔導及課外活動已經使老師喘不過氣來，校本管理後再給老師加上一大堆行政工作，教師們的壓力有多大，怕已超出大家想像。

2003年教改措施陸續實施，新學期開課一星期已有兩名教師自殺，到教改推行六年，總計共十位教師先後自殺。2006年，教育界紛紛指責教改令老師壓力大增，羅范椒芬卻指「若教師自殺與教改有關，豈止兩個教師（自殺）」，這番言論最後引致過萬名老師上街抗議，要求羅氏下台。

校本條例，不只為老師帶來新的工作壓力，更因為條例使學校得到自治權，而令校長校董紛紛據校為王，政府派下來的錢要用在哪兒，沒

有規定，最後是用來多買一部新電腦放在校長案上，抑或多聘一個低薪教學助理幫忙影印，全都掌握在法團校董會與校長一念之中。最重要的是新聘任合約教師沒有公務員制度的保證，能否獲續約留下只能等待校長聖旨，致使他們終日為工作擔心，不敢觸犯龍鬚，怕校長二話不說抽起合約。

教改政策出台期間，剛巧遇上香港出生率偏低問題，殺校縮班成為全港學校不能避免的現實。除了一向公開考試成績驕人的名校外，各中小學為求收生人數達標，紛紛出招搶學生。有學校外牆掛滿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橫額，宣傳學校成就，諸如「天台 war game」、「X 區聯校水運會 N 連冠」、「全港最多制服團隊學校」等等，統統為了吸引學生家長替子女報讀。學校奇招盡出，分散教學資源，各家長若希望子女得到優良專業的教育，怕要多祈福、冀校長專心教育本務。

此外，教改以減少學生標籤效應為名，使中學五個 Band 改成三個 Band（Band，指收生組別：「第一組別」學校，是在升中統一派位，收取的中一新生皆為區內成績最好），使學生成績分級少了，代表教學需要照顧更多學習能力不同的學生。本來，每間學校都有積累多年經驗，有相應教材及人手編配照顧學生，但一下子多了程度不同的學生，要細

心評估因材施教，都更花功夫，因此不論是教師或學生都注定要投入更多時間精神，教學成效當然不容樂觀了。

香港一向以「精英教育」為方針，從基礎教育開始，透過多次公開考試，選出少數精英，加以培育。理論上，他們大都能成為香港上層社會人士，在各行各業領導普羅大眾工作。雖說淘汰制的考試制度能選出精英，卻只能證明他們有能力克服這種考核，不能證明其他。但不少出身基層的學生也因為「讀得吓書」而「升呢」，靠的無非是刻苦用功應付考試。可是今天已沒有升中試、沒有學能測驗，連會考也取消了，升學過程中也就減少了個人能力的參照。

加上當局推行「就近入學」、「一條龍辦學模式」，學生就讀哪一所學校，已經不大參考學習能力。「一條龍辦學模式」使個別學校連結起來，「幼稚園－小學－中學」成為直通車，學生在報讀幼稚園時，同時決定未來十多年的人生。傳統名校集中在中產以上的社區，在「就近入學」原則下，學生要在統一派位中進入名校，便要舉家遷往名校區一博，否則要自行申請，入讀學費貴得令人咋舌的私校或直資學校。事實上，香港不少名校都紛紛轉為直資學校。它們退出校網統一派位，換言之已篩走了經濟能力不足的基層學生，這顯然是有違能力為先的原則。

這些基層家庭沒有關係更沒有資產，子女打從入學一刻已經被編入低組別學校，即使天份再好也只好勉強完成基礎教育，錯過人生中最好的學習階段。香港教育或多或少，在結構上已淪為「貴族教育」與「基層教育」的對立，社會流動管道愈收愈窄。由此看來，未來的貧富懸殊因着這種教育制度只會愈加嚴重。這種不理社會現實、不關顧各階層需要的教育政策，都顯示主事官員的庸碌。

從殖民地時代至今，教育當局往往沒有在政策推出之前充分衡量利弊，卻只會在政策推出時作「獨立思考」力排眾議，令香港教育的最終用家，也就是學生家長們在教育制度討論中，從來缺席，沒有半點權力。當天李國章以個人意志，強迫香港教育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併，分明反映香港教育政策沒有足夠的民主參與，往往是閉門造車，長官意志。又例如 2007 年曾蔭權豪情萬分指「香港發展金融業可以養活一千萬人」，也反映政府一直自恃「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只會食老本，不思進取。曾班子至 2012 年初春已是夕陽西下，政府在換屆前，也沒有意思擱下「國金」這金漆招牌，為香港未來打下穩固而寬闊的基礎，仍然劃地自限，故步自封。

本來可以為每年萬千畢業生帶來更多出路，已經探討多年的「六大

產業」沒有寸進。幾個高官自己辦事不力，引致教育政策失敗，毫不知恥，卻拉長口臉，勸年青人北上尋找機會。高官不理民怨，不顧現實需要，卻堅持勇往直前，當然是落得個車毀人亡的悲劇結局。再過數年，香港畢業生怕要到內地二、三線城市，跟廣大同胞爭個頭破血流，拚命找來一份低技術工作，在北方驀然遙望獅子山。

按道理，教育政策應該相應社會整體發展而制定，培育足夠人力資源供應城市發展，一切改革應該使社會變得更好，香港人才在教改後應該更出色，更合老闆心意。港英政府時代，教育體制內沒有港人的聲音是無可奈何，可是教改是港人治港的產物，今天學生被責怪不成才，就連最基本做人做事都被認為是力有不逮。商界不收貨，投訴學生競爭力不足，教改沒有為港貢獻，這就如派一張不合格的成績表予教育官員。明顯是掌教育大權官員的錯，若他們一個二個非低能庸才，肯定是有心靠害香港，折磨學生。

教育改革詞彙

陳雲◎批註（文化評論人、香港嶺南大學助理教授）

【流暢力】

產生多量意念的能力。

解說

思想暢通，如晨早屙尿。流暢是產生觀念的速度，不是甚麼多量意念。

【變通力】

變更思考方式、改變做事方法、擴大思考類別、或從不同角度看同一個問題的能力。

解說

這是放棄成規的勇氣，或改換思考模式的能力。

【獨創力】

在思考和行為上表現出獨特、不依循的特質，是產生不尋常意念或問題解決方法的能力。

解說

這是最重要的判斷力。

【精進力】

在原有構思上加添新觀念，增加有趣細節，或精益求精的能力。

解說

改善成果或修訂事情的能力。

【對問題的敏覺力】

敏於覺察事物，能夠找出問題的核心，發覺問題的缺漏及關鍵的能力。

解說

洞察力而已，甚麼敏覺力，又是自製新詞，標奇立異。

【界定問題】

包含：⑴ 確認「真正」問題；⑵ 找出問題的重要面；⑶ 澄清和簡化問題；⑷ 找出問題中的問題；⑸ 提出問題的其他定義；和 ⑹ 全面性界定問題等能力。

解說

界定問題，就是用清晰的語言寫出問題而已，何來如此複雜？

【視像化】

運用幻想和想像，將事物展現於腦海中，並在腦中將所顯現的影像和意念加以處理的能力。

解說

只是幻想力、想像力而已，講到好似超能力、神通力。

【類比思考】

借用某情境中的意念而運用到另一種情形的能力；或將某一問題的解決方法轉用到另一個問題上的能力。

解說

中文叫比喻，觸類旁通、舉一反三。

【轉換】

將舊有事物變作新用途、看出新的意義、新含義和應用性；或將物件或意念轉變成另外一種的能力。

解說

變身、變形而已。

【屬性列舉法】

一種著名的創造思考策略，是針對某 -事物列舉出其重要特性或屬性，然後逐一提出改變或改進。

解說

好似從量變到質變的做法。

【分合法】

分合的本義是將顯然不相關的要素聯合起來。分合法利用類比與隱喻的作用，協助思考者分析問題以產生各種不同的觀點。

解說

即是聯想囉。

【情境學習】

強調學習知識與技能的應用性，「在哪裏用在哪裏學」。

解說

就地取材，活學活用而已。

【九種共通能力】

教改中改良課程及教育法，九種為：協作能力、溝通能力 、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運算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

解說

這九種能力有重疊之處，而且範疇不同。例如協作與溝通類似；解決問題能力太籠統、會包括創造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有演算能力，但語文能力就丟棄了。

【四個關鍵】

教改中課程改革目標「學會學習」下的四個關鍵方法，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運用資訊科技學習。

解說

第一項與其餘三項，屬於不同範疇，而「四個關鍵」的語言不完整，應該是四個關鍵 XX 才是。

【拔尖保底】

為照顧學生（特別是中學新生）能力差異，「教改」提倡措施增加資源，幫助有需要的精英或底層成績者，例如增加副教師及教學助理教席。

解說

精英學生提高程度，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大陸叫做「拔尖」，即是拔高尖子，或將有潛力的學生拔高為尖子。尖子是共黨的妖精詞彙，中文叫精英，拔高是提高。拔，也有拔除、拔出的意思，尖子被拔除了，也是拔尖。精英是人中之精、人中之英，不一定要尖，大智若愚，精英也有樸拙的，毫不尖銳的。尖子有削尖腦袋往好處鑽營的意思，正是大陸社會中的精英觀念吧。至於保底，文學界本要矯正為「補底」，底子不好的學生，補底。保底則有驅使教師擔保，學生要有基本成績，學生天份不同，這是強人所難，勞役老師，也不符合教育理念。

【終身學習】

政府指出社會轉型，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終身學習，自強不息」的改革口號下，鼓勵「全社會動員」，齊齊終身學習，於課外及工餘時間在正規或非正規學校持續進修。

解說

「活到老，學到老」，這格言說的是生活體驗或閱讀心得，但不是在學校學到老。終身學習學位貶值及技術價值消散的現象，不斷學，只能保住職位，卻不能憑專業資格取得好職位。

【一條龍】

指有相同辦學理念的中學及小學，以加強九年免費教育下，課程連貫性。

解說

這也可以是教育產業化、集團化及世系化的徵兆。學生減低轉校的衝擊是好的，但學校生員的多元化減弱，會削弱學生的人際交流能力，不容易欣賞其他階級、地區及學校培養出來的人。

【校本管理；法團校董會】

校本管理旨在給予學校有更大的自主權，提倡學校設立法團校董會，因應學生需要，讓學校、老師、家長及校友都有代表，參與決定學校的發展計劃及運用資源的方法策略。

解說

除非不接受政府資助，否則校董會的成員組成，容易受到政府擺佈，變成幫助政府推出愛國教育、大陸洗腦交流團之類的黑手。

【直接資助計劃】（簡稱：直資）

為提高已有相當高教學質素之非官立學校的教學質素，政府按學生人數比例直接資助學校。學校可自主決定學校發展政策、課程及學費。

解說

這是教育自由，也是學校貴族化、世系化的助力，除非出現平民化的、很多獎學金的高質素直資學校，否則這種資助方法只會妨礙階級流動，製造階級壁壘。

【三三四】

教改中最重要之學制改革，指由舊制「五二三」改為新制「三三四」，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學。舊制之會考及高考遂合併為中學文憑試，初中升高中無需通過任何公開考試。

解說

中學會考有長遠歷史，是可靠的香港學歷，不應該改為中學文憑試。初中升高中不必考試是合理的。大學四年制，也是回復正常，對於程度一般的學生，三年制的培育時間不夠，也不方便選系、中途轉系或出外交流。

【專題研習】

學生常稱之「做 project」。為配合九種能力，減少考試主導對學生之影響，政府提倡學校採用多元評核方式及探究式學習方法，專題研習成為其中一種重點的教學及評估學習方法。

解說

原意是鼓勵學生獨力做研究調查、然而這需要高質素的教學支援，教育局不加經費，又令老師疲累，結果很多學生的專題研習都是抄襲拼湊，做不到培養學生獨立研究能力、產生知識的效果。

【目標為本】

1995 年開始推行，以「學生為本」、「因材施教」為大原則，以「情境

學習」為教學特色，而且老師需要對每個學生進行全面而深入評估，以了解學生的能力差異及學習態度等。因為政策投放資源不足，而且難以配合傳統教學模式，故此備受教育界質疑。

解說

這些又是隨便抄襲海外經驗的例子。要做到這種高標準的教學效果，必須提升學校環境質素及教師品質。要平民學校做到類似貴族學校的成就，一、兩間偶然可以出現，但整體而言，多數會引致教學品質下滑，令教師與學生無所適從，形成挫敗感。

【學習領域】

即「八個學習領域」：「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數學教育」、「科學教育」、「人文教育」、「科技教育」、「藝術教育」及「體育」。

解說

科學與科技教育應該合併，不能分開的，或者將科技教育改為技術教育，即是傳統工藝也是技術教育，不一定要先進科技，特別是資訊科技，令學生全面學習各種技術。其餘的都是香港教育界的常識。

【學習經歷】

即「五種學習經歷」：「德育及公民教育」、「智能發展」、「社會服務」、「體藝發展」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解說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類似枚舉各樣事物之後的「其他項目」，是理性分類的失敗！社會服務已經是與將來就業有關的經驗嘛！真的是：多此一舉。

【七個學習宗旨】

2002 年課程發展議會發表《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它們分別是「健康生活方式」、「廣闊的知識」、「學習技能」、「語言技能」、「閱讀習慣」、「國民身份認同」及「責任感」。

解說

夠了！又重複「學習領域」與「學習經歷」的內容了。此外，這些枚舉出來的項目，很多是互相蘊涵的，列舉的人連很基本的邏輯思考能力都缺乏。例如責任感不宜單獨列出，應該放在道德教育、公民教育或人格培育之內。單獨列舉責任感，那麼仁愛心呢？該往哪裏放？當然，我明

白教育局將「責任感」與「國民身份認同」並列，是叫學生做個勇敢承擔政權剝削的中國人吧？

【求學不是求分數】

2004 年教統局的電視宣傳片，創建教學新文化《評估篇》以「求學不是求分數」為口號，籲家長不要只關注子女的考試成績。

解說

求學是為了長知識、學做人，學校的分數是衡量學術成績的，是求學的重要成效，當然，即使是學術成績，很多學生是滯後的、後來才發力追趕的，但一時一刻的成績表始終是參考的標準，不可輕忽。學術成績必須公平及全面評估學生的能力就可以了。教育當局這句口號，成為教育界的笑柄，說明教育當局連自己的教育觀念及語文能力都未能掌握。口號的問題出在「不是」，要寫「不單是」。對於那些中文差勁的教育官員來說，用英文講，應該不是 not，而是 not just。依照常識，口號應該改為：「求學不限於求分數」、「求學不單是求分數」、「求學比求分數更重要」之類。

【其他學習經歷】

是新高中課程的特色之一，讓學生的百分之十五課時分配於：德育及公民教育、藝術發展、體育發展、社會服務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解說

課外活動的正規化及評核化而已。學校和學生不積極參加課外活動，搞到要用成績來強逼，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NET】

以英語為母語教師／外籍英語教師。

解說

引入若干外地英語老師是應該的，可以令學生學到地道英文，並且接觸外國人（包括在外地成長的華人），但不應成為主力，始終香港要有信心接納自己培育的英文老師，也要有信心建立港式的英文腔調。此外，聽聞有學校不接受英語國家出生的華人的申請，帶有種族歧視色彩。

【教學助理、副教師】

教育界新職級，並非正式教師，多由大學畢業生擔任。

解說

這是正名的嚴肅問題。教育必須同工同酬，為了應付教師的行政及管理工作，學校應該聘請更多文員及行政助理，而不應貶損教師的名稱，聘請教學助理、副教師之類。中、小學不是大學，教師在入職的時候不應該分級。聽聞現在已經有「教學助理支援」的職位了！恐怖。

【校本評核】

當局認為校本評核可減少依賴公開考試成績，因為公開試成績受不同客觀條件限制，或未能全面反映考生的真正能力。政策希望由任課教師，在較長時段內對班上學生表現進行評核，以提高評核的信度。校本評核也旨在為學生及教師帶來良好的影響。對學生而言，參與有意義的活動，激發學習動機；對老師來說，評核有助達成課程宗旨，肯定教學實踐經驗，並為教師日常評核提供系統架構和加強評核的重要性。

解說

校本評核只適用於那些學校普遍有悠久傳統、師生比率適中、校網穩定而升學學額競爭不大的地方，才可以容許老師評核學生而達到公平與可信。香港不是這種地方，勉強為之，只會令外界先對某學校打量一下，

決定其評分是否中肯，否則便要打個折扣，再看校本評核的成績如何「換算」過來。公開試是必不可少的，很多大學依然以公開試為本，再用公開試成績來衡量校本評核是否公允。然而，在課外活動、非學術的學習經驗及成就來看，校本評核是必須的，也惟有靠校本評核，學生才可以得到成績的全面估量，否則一到了公開考試時期，學生就不再參與課外活動和交本校的功課了。

【殺校】

全港中小學持續收生不足，教育當局以「一刀切」形式，指令新學年每班學生不及特定數目，便需要結束辦學，是為「殺校」。

解說

學校平均分佈的網絡是按地區平等而設的，只要符合營運的效益，就不應將學校解散。學校也承載幾代人的記憶及地區的風貌，不能輕率解散，生員數目稍低的學校，應該將之轉化成另類教育模式的學校，如小班教學、環境生態教學等。這個「殺」字，也顯示教育局毫無仁愛心。

【小班教學】

2009-2010 年度，教育局開始於公營小學逐步實施小班教學，限定每班學生人數不得超過標準班額的一成。

解說

來得太遲，而且也應該維持一定的彈性，視乎學校自身的教學實踐而調整每班的人數。

【質素保證視學】

配合優質學校教育政策，視學評估特別針對學前教育及基礎教育，旨於協助學校自我完善。

解說

這是正常的政策。

【全人發展】

目的為學生有更均衡的學習經歷，令學生更有興趣更有能力，以達至持續學習及終身學習。

解說

這是用錯中文，或者過分期許。老師要盡力施教，但才情是受到資質和環境局限的。「全人」是學術及人格完美的人的意思，「發展」也是用得太爛的詞，應該改為「全才教育」。學校傳授各方面的才能，但學生是否成為全人，就看學生自己的造化了。

【沉浸課程】

指學生學習語文時，置身於地道語言環境，感受當地人的文化及日常生活，學起來事半功倍。

解說

源於 20 世紀 80 年代的外語學習理論，近年在香港流行，與遊學團之類的富貴玩意結合，例如上北京參加普通話沉浸課程。

很唏噓，香港最好的教育，
或説是教育精神吧！
原來，是倒退五十年，
在六十年代的山邊木屋天台上，
方能體現。

——彭志銘

附錄

香港特區教育凋零事件簿

1996 年

- 教統會於 1995 年 12 月中旬發表《第六號報告書》，以「提高語文能力——整體策略」為題，定出「母語教學」政策。
- 《報告書》更指出香港語文教育長遠目標，中文科應該以普通話授課，俗稱「普教中」。

1997 年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梁錦松改任為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主席，負責統籌香港教育事務。
- 回歸後教育統籌司改稱為教育統籌局長，惟仍然由王永平擔任，負責執行香港教育政策，回歸後首項最大的教育改革為「母語教學」。
- 「檢討職業先修及工業中學教育工作小組」發表報告書，提出學校可自行選擇除去「職業先修」及「工業」字眼；又建議學校繼續提供若干實用工藝科目、並需同時增加商業及科技科目。
- 《九年強迫教育檢討報告》指多年來的小六學業能力測驗（學能測驗）有礙學生學習，建議以「學習能力評估」取代。
- 教育署署長余黎青萍公佈對個別學校授課語言意見，遂令全港中學分成「中中」及「英中」兩大類。

1998 年

- 教統局發表《第七號報告書》提倡「優質學校教育」，提議容許學校行政、財政及人事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性，並有更強的問責性；提出「質素保證機制」，措施包括校內自我評估及校外評估，以量化指標評估學校教學；設「優質教育發展基金」，鼓勵學校提出改善教學計劃，強調學校撥款應更符合公平、效率及成本效益等原則。
- 《報告書》又建議教育署精簡架構，增加香港教育成效。同年，教統局發表《教育署檢討諮詢文件》，指教育署表現未符理想，政策推行亦欠成效。
- 教統局發表《與時並進善用資訊科技學習五年策略 1998/99 至 2002/03》，希望學生能掌握並迅速處理資訊的能力。當局隨即向學校提供大量資訊科技設施，並指示學校在編訂課程及教學也需要作出配合。
- 母語教學正式推行，第一批「中中」學生誕生。
- 羅范椒芬接余黎青萍，任教育署署長。

1999 年

- 教統局先後發表名為《廿一世紀教育藍圖——教育制度檢討：教育目標》及《廿一世紀教育藍圖——教育改革建議》的諮詢文件，初步提出香港教育需要因應社會轉型而改革，是為「教改」先聲，政策以《七號報告書》為藍本。
- 「終身學習」、「學生為本」、「全方位學習」等口號綱領自此不絕於耳，經過第一輪諮詢後，又有「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及「敢於創新」等辭湧現。

2000 年

- 教統會主席梁錦松發表《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報告書，「教改」正式開始，當局定出各教育階段在課程、評核及銜接機制的改革方向。
- 是年羅范椒芬接任永平任教統局局長；張建宗接任教育署署長；港大、科大、浸大亦於同年更換校長。
- 董建華政府鼓勵院校開辦副學士，以達六成高等教育普及率。
- 「毅進計劃」推出，成為其中一種持續進修教育。其主要對象為未能

升讀中六的中學畢業生及早年失學的成年人。

- 2000 / 2001 學年，正式取消「學能測驗」（香港學業能力測驗），小六升中派位不再以能力為參考，改以「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分別以兩輪派位方式：首輪為不受「校網」限制的自行收生階段，次輪以「校網」為基準，學生選出三十間心儀學校，進行統一派位。

2001 年

- 課程發展議會發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諮詢報告，提出往後十年基礎教育之課程改革，提出「七個學習宗旨」、「五種學習經歷」、「四個關鍵」及「八個學習領域」等發展綱領。
- 升中派位組別由五個減至三個，當局表示，希望最後取消所有組別，以減少標籤效應。
- 第一次教師語文能力評核試（「基準試」）開考。
- 教統局宣佈副學士學歷等同高級文憑。

2002 年

- 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宣佈，只有具專上教育程度者才能註冊為檢

定教師。

- 李國章上任教統局局長，羅范椒芬改任常務秘書長。
- 李國章表示，希望中大與科大於 2005 年合併。
- 新高中學制計劃出台，將通識科由選修科改為必修科，中學由七年制改為六年制。

2003 年

- 縮班問題製造超額教師，新學年開始前超額教師可接受教統局面見評級，推薦至學校。
- 教育署被併入教統局。
- 2003/04 新入職幼稚園教師必需修畢職前合格幼稚園教師文憑。
- 教統局網上公佈一百一十所中小幼特視導報告，點名批評個別學校。
- 教統局向立法會提出削減大學經費，幾間大學先後罷課，八間大學校長聯署抗議。
- 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建議現任教師於三年內完成一百五十小時進修或教學研習。
- 沙田一間小學花五百萬教育署撥款興建一觀光式升降機。

- 教統局決定將官立夜校外判予民營機構，首兩年學費不變，其後則由辦學團體自行決定。
- 新學年一星期內，兩名教師自殺身亡。

2004 年

- 教改後舉行首次退思會，前線教育人員指教改步伐過快。
- 《2004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校本條例」）在立法會通過，全港津貼學校必需於 2010 年前成立法團校董會。
- 「全港性系統評估」開始實施，首屆對象為小學三年級學生。成為全港小學的「成績表」。
- 行政會議通過成立跨界別的資歷架構及相關質素保證機制。
- 首屆「香港校長研討會」召開，「教改」成為聲討對象，有與會者指當局以商界思維控制教育界，是外行領導內行。
- 上水建德公立學校被勒令來年停辦，校長以絕食及全校罷課抗議，家長申請法援要求司法覆核。
- 經過多間學校罷課以及「反殺校千人集會」後，教統局為殺校設上訴機制，並指通過視學評估的學校可在新學年再度招生，又鼓勵收

生不足學校合併。

- 李國章指教育界為「小班教學」提議之目的，若只是保住學校及教席，做法不能認同。十八區小學校長聯席會議，支持非殺校重災區的沙田區試行「小班教學」抗衡李國章的「保飯碗論」。
- 教統局的電視宣傳片，創建教學新文化《評估篇》以「求學不是求分數」為口號，呼籲家長不要只關注子女的考試成績。
- 教統局「肥雞餐」出籠，所有正規教師達十年資歷而未到正常退休年齡者可申請，是年有五百零八宗小學教師申請。

2005 年

- 教統局公佈新高中學制將於 2009 年實施，四年制大學課程將於 2012 年實施。
- 增加教資會之非本地生所佔學位，由百分之八上升至百分之十。
-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事件，香港鉅富李嘉誠名下基金會向香港大學醫學院捐款十億，十一天後港大建議將醫學院冠命名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並獲港大校務委員會一致通過，引來各界討論及反對，最後經過一輪諮詢後，定翌年元旦正式易名。

2006 年

- 政府與天主教就「校本條例」提呈法庭。
- 教改六年共十位教師自殺，羅范椒芬指「若教師自殺與教改有關，豈止兩個教師（自殺）」，過萬名老師上街抗議要求羅氏下台。
- 教統局撥三十四億為教師「減壓」，後來委託調查報告指教改與縮班是教師之壓力來源。
- 政府推「學券計劃」，資助學前教育學費，惟私立幼稚園學童不受惠。
- 羅范椒芬與廉政專員黃鴻超調任。
- 樹仁大學成為香港第一所私立大學。

2007 年

- 李國章及羅范椒芬涉干擾學術自由，強迫香港教育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併。特首曾蔭權成立「2004 年教統局不當干預學院學術自主」的獨立委員會調查。
- 孫明揚接替李國章；教統局改稱教育局，其人力資源職能改由勞工福利局負責。
- 語常會提議撥款兩億推「普教中」。

- 本地大學紛紛增收本地生學費，同時增設非本地生獎學金。
-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條例》頒佈。

2008 年

- 「資歷架構」和「資歷名冊」於 2008 年成立，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重組成素質保證機構；質素保證局成立，為教資會轄下非法定機構，配合質素保證計劃。
- 教育局宣佈「微調」母語教學，取消強制劃分「中中」及「英中」。

2009 年

- 新學制「三三四」正式開始，是年中一新生成為首批將於中六面對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
- 《施政報告》（2009-2010）提出教育產業為香港六大優勢產業之一，要提升香港的區域教育樞紐地位。報載，非本地學生中，約九成為內地生。
- 教育局將新界四幅土地分別給予四間國際學校團體，其中傳統英國貴族學校哈羅學校（Harrow School）、選址屯門掃管笏，將是全港第一所寄宿制國際學校。

2010 年

- 教育統籌委員會發展香港教育產業。
- 審計署發表報告，指不少直資學校賬目混亂。部份名校被指有豐厚盈餘卻每年調高學費及雜費，更有學校被指以學校盈餘投資股票基金，總值超過七千萬。
- 最後一屆會考放榜。
- 孫明揚考慮重推「肥雞餐」，希望解決縮班與超額教師問題。

2011 年

-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文件出台，被指為盲目愛國、忽視人權的「洗腦教育」。
-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沙石論」，令各界更憂慮國民教育「教喜不教憂」。
-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參加港大百周年校慶活動，疑有港大學生被警方禁錮，整個保安安排被指是影響大學言論自由。
- 同年港大校長徐立之宣佈翌年將不會續約。
- 維時六年的「校本條例」司法覆核案結束，終審法院駁回天主教區

之上訴。

- 曾蔭權於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十五年免費教育」。
- 將於 2012 年在屯門正式開學的哈羅國際學校，首批定價六十萬的優先入學權益相關債券售罄；英基轄下學校增加下學年學位，家長可自願性購買「優先提名權」，定價四十萬。

2012 年

- 2011/12 學年有不少學校繼續縮減學位，全港共減少約六千八百個學校。然而荃葵青區學校卻出現學位不足的「減凸」情況，於是教育局放寬該區減班學校之收生限額，約四至八名。
- 教育局為打擊利用虛報地址報讀學校的問題，於小學統一派位報名前，即自行派位階段，派員抽查報稱住址為九龍塘區的家庭，是次行動共發現兩宗虛報個案，涉事學生於此階段若被校方取錄，亦會被取消學位。
- 由於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於 2011 年末，堅拒承諾未來三年內不增加大學學費，於是立法會財委會否決該局之撥款提案。2012 年 1 月教育局提交新文件，並表示於未來四年將不增收大學學費，以換取立

法會支持大學經常性開支撥款。

- 首屆中學文憑試於 3 月開始，首份試卷為中文卷的卷一「閱讀能力」及卷二「寫作能力」。各界焦點卻是第二周的通識科考試，報載不少補習社推出通識科試前精補班，皆全部爆滿。
- 中學文憑試必修科之一的通識科於 4 月 2 日開考，其中一條必答題目問及「政黨政治」。不少被訪學生認為題目屬於大冷門，擔心影響升讀大學機會。亦有學生指作答時「掩住良心」支持建制派政黨，以免被評卷員視為偏激，影響得分。翌日，考評局指學生政治立場不會影響得分。另外，同年末代高級程度會考的通識科（選修科）考試則問及溫家寶提出的內地政治改革，有被訪老師亦指內地政治題目是考生的弱點。
- 2011 年 4 月，教育局長孫明揚宣佈所有學校不可向書商索取教師用書、教材及學材，以防學校與書商利益輸送。翌年 5 月，教育局復又宣佈學校可索取教師用書，書商紛紛指政府此舉破壞協議，又指製作教師用書成本高，稱不會向政府妥協和讓步。教育局及書商就新學年教科書及教師用書的定價爭議不斷。孫明揚向書商施壓，表示政府會出資五千萬，協助推動電子教科書發展，建立新市場。他

指政府計畫新學年在多間學校作電子書教學試點，以減少未來對書的倚靠。

- 是年 5 月，政府公佈（新）毅進課程將於 6 月接受報名。學員修畢共六百小時的課程後，學歷相當於包括中英文科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五科第二級的程度，符合報讀一般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要求。
- 教育局於 2010/11 學年，向每所受政府資助的中學提供三十二萬元一次過為期兩年的「通識教育科課程支援津貼」，旨在新學制初期，配合學校在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所需。然而，教育局在 2010/11 學年完結時，並無意延長「通識教育科課程支援津貼」，令不少學校擔心新學年通識科的教學質素會受影響，不少通識科老師更指自己承受很大裁員壓力。教育團體及教師先後多次發動遊行請願及向教育局發聯署信，要求教育局繼續發放有關津貼。是年 5 月，教育局長孫明揚以大部份學校未完成善用津貼為由，宣佈將有關津貼使用期延長一年，並指學校如有需要，可向該局申請額外增撥津貼。

香港本土

《八十後運動》
林匡正◎著

《英治時代》
吳志森◎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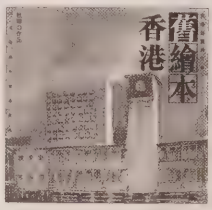
《夾縫》
林匡正◎著

《恆仔的日與夜》
彭志銘、劉思航◎合著

《香江騎呢錄》
吳昊◎著

《狗臉的歲月》
李葦◎著

《拾香紀》
陳慧◎著



《香港舊繪本》
杜琛◎著

《香港，你還剩下多少？》
林沛理◎著

《思索香港》
龍應台◎編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補購

本人現購買

《八十後運動》	_____ 本（每本港幣64元）	《狗臉的歲月》	__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英治時代 》	__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拾香紀》	_____ 本（每本港幣44元）
《夾縫》	_____ 本（每本港幣70元）	《香港舊繪本》	_____ 本（每本港幣44元）
《恆仔的日與夜》	__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香港，你還剩下多少？》	__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香江騎呢錄》	__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思索香港》	__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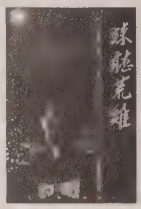
_____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文化專書

《蘋果掉下來》
梁麗娟◎著

《九評地產黨》
陳雲◎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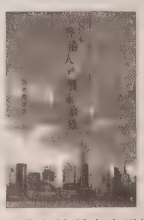
《竦聽荒雞》
司徒華◎著

《掌故筆記》
韋基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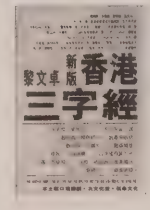
《香港大崩壞》
林匡正◎著

《次文化語言》
彭志銘◎著

《打橫嚟講》
彭志銘◎著



《香港人的質素衰敗》
馮智翔◎著



《新版香港三字經》
黎文卓◎著

《大仇富》
全港市民各界代表◎著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蘋果掉下來》	_____ 本（每本港幣64元）	《次文化語言》	_____ 本（每本港幣64元）
《九評地產黨》	_____ 本（每本港幣86元）	《打橫嚟講》	__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竦聽荒雞》	__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香港人的質素衰敗》	_____ 本（每本港幣52元）
《掌故筆記》	__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新版香港三字經》	_____ 本（每本港幣52元）
《香港大崩壞》	_____ 本（每本港幣94元）	《大仇富》	_____ 本（每本港幣78元）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香港教育大零落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次文化堂

多倫多大學利銘澤與宓惠存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2020 年轉贈

次文化堂

香港人的書

《九評地產黨》

《大仇富》

《恆仔的日與夜》

《香港大崩壞》

《九評政府黨》

《夾縫》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CoLibrì
COVER SYSTEM ©
Made in Italy
03-12 STD
8 032919 991409
www.colibrisystem.com

香港未來棟樑的前途

李童（退役教育工作者、現半職家長）・梁麗娟（大學講師）・馮偉才（嶺南大學社區學院講師）・盧浩元（社區工作者）・陳志宏（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導師）・劉思航（教育工作者）・張炳良（前香港教育學院校長）・林本利（教育中心創辦人、前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戚本盛（教育工作者）・潘國森（文化評論員）・黎明海（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學術執委、前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視覺藝術科試卷主席及校本評核分區統籌總監）・陶囍（專欄作家、大學講師）・施安娜（中學教師）・張文光（立法會教育界議員、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前會長）・黃英琦（律師、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監）・梁德賢（中學教師）・岑判文（香港人，幼稚園到大學本科教育都在香港）・史亦書（社會觀察評論員）・陳雲（文化評論人、香港嶺南大學助理教授）・許寶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小思序言

他們有心裏話要說

一群香港教育工作者的諍言警語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SCB 569 $108
ISBN : 978-962-992-295-5
Printed in Hong Kong

CUHK Libraries
004796478

ISBN 978-962992295-5
10800
9789629922955
www.subculture.com.hk
www.次文化.香港